

# 炎黄春秋

**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

**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

**对《共产党宣言》的补充和修正**

**清朝北洋舰队两次访日**

第 **9** 期

**2004年**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 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

● 金 凤

27年前，即1977年4月16日下午，一个8年不给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仅因为他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发出许多真知灼见，竟然被戴上“恶毒攻击”的罪名，在“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四人帮”已被打倒半年之后，不幸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王申酉的冤案1981年便得到平反。在平反的前一年秋后，人民日报社两位副总编给我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赶赴上海采访收集这位“张志新式”人物的事迹，准备公开报道。

我到上海后和当地的报纸、电台、新华分社的记者们合力投入了这项艰巨的采访。由于王申酉已死，而采访需涉及的人大部分都是当年与处理王申酉一案有关联的人，收集资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访问了王申酉读书的华东师范大学领导，拜访了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法院和所在区委的诸多单位负责人以及王申酉的亲友。还观看了当时关押王申酉的牢房和宣判他死刑时的体育场……

经过曲折艰难的采访，我们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除各种所谓“罪行”的记录和判决公文之类的材料以外，最主要的是他自14岁开始就坚持写的八大本日记，还有他写给亲友的表达他



王申酉

政治观点的书信。尤其珍贵的是他写给女友而未来得及投递的一封六万多字的长信，这封信在最后审判他时算是对他判罪依据的所谓“全面供词”。

上海采访后我写好了稿子。因为种种困难，这稿子迟迟不能与世人见面。

2001年8月，看到了《王申酉文集》。我手捧这本横跨两个世纪终于得见天日的书，心中感慨万端。二十多年前赶赴上海收集王申酉事迹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现在我又写此文，真诚地向读者介绍这位二十多年前为了苦苦求索和追求

马克思主义真理，科学地剖析当时社会弊病，发出忧国忧民心声，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爱民赤诚之心的年轻人。让人们知道他、敬佩他、怀念他、学习他。

**他十四岁时就咬破手指用鲜血在日记上写道：“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

1945年，王申酉出生在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九口之家全靠父母每月9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过得十分清贫。

他五岁上小学，从小喜欢读书。除了做功课

之外,经常从黄埔区图书馆借读中外名著。他尤其爱读《牛虻》。看了将近十遍。牛虻那坚毅如钢的性格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深深地感染了少年时期的王申酉。他还爱看一些大科学家的传记。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等。崇拜他们自我奋斗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1959年8月5日,才14岁的王申酉咬破手指,用鲜血在他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写下“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这样纯洁的誓言。

1962年秋天,17岁的王申酉以480分的高分考进上海市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他是他的工人家庭和所有亲戚中第一个大学生。他在日记中又写道,要“像科学家一样用孜孜不倦的个人奋斗,以极顽强坚毅的辛劳换取无穷尽的科学成就,一切为了人类的幸福,从而也享受着丰硕的劳动成果(是他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中极小有限的一部分)”。他立志将来“以科学家的身份,将毕生的精力与才智贡献于全人类,以取得社会对我的信任和报酬”。

大学学习生活紧张艰苦,王申酉除了学好正课之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在古今中外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同学们都叫他“怪人”。他们不明白,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什么要看这么多文学、艺术的书籍?王申酉在日记中回答:“一个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外对其他领域一无所知的人,是个盲目的人,我一定要用人类最美好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

由于读书多了,王申酉的视野也比一般大学生开阔。1963年11月3日,18岁的王申酉在日记上全文抄录了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38年8月10日写给五千年后人们的那封著名的《致后人书》。

这位科学巨人用短短几百字概括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成就和主要的社会问题,寄希望于几千年后的人们。希望那时的人们能找到一条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道路,王申酉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

1964年10月16日午夜,他躺在床上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他激动得在心中高呼:“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升腾起来了!”他满怀希望地准备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

## 大量削减专业课和外语课的“教改”使他沮丧;他不肯交出吐露心灵自由的日记

正当王申酉怀着激情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时候,北京传来高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声音。上海华东师大和全国大学一样搞起了这样的“改革”。专业课被砍掉一半,外语考试也取消了,而政治学习的时间增加到每周十个小时,劳动的时间也增加了。

面对这样的“改革”,王申酉想不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样做对系统的不容间断的科学知识的掌握有什么好处?”“不要读书,不要科学,还搞什么建设?中国如此会被引向繁荣富强吗?”他十分苦恼。

然而,他不能说出来。因为当时“白专道路”的棍子随时可能劈头打下来。他只能在日记中偷偷倾诉:“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学搞得一塌糊涂,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他还感慨地说:“这种改革总算来晚了两年,要不然(我)五年的大学等于白念了。”他沉痛地写道:“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担心,担心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民族的衰灭……”

不久,他终因不安心到工厂劳动受到严厉批评,还被迫写了检讨。

这时他从翻阅旧报纸杂志上了解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一些情况。他感觉到解放后十多年的建设方针并不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失调,“反右派”、“反右倾”的思想压抑,直接造成以后三年的举国灾难。导致这一切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个人崇拜”更是致命伤!他思考的问题更多了。

1965年秋天,王申酉随学校到崇明岛参加工厂“四清”。当时许多同学都想借此机会要求入团,而入团是要经常向组织上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表现的。王申酉讨厌这种做法。政治指导员几次找他要他说出“真实思想”,王申酉都没有照办。后来他们知道王申酉喜欢写日记,就提出要他把日记交出来,王申酉大吃一惊,“他们怎



么会知道我经常写日记，又怎么能把日记交出来呢？”因此，被他拒绝了。可是天真的王申酉哪里知道，他的日记已经被同室住的学习班长偷看过了，并把其中对“教改”不满的话偷偷摘抄了，汇报给团组织并上报到校党委了。王申酉日记中还有一些用英文代替亲友名字的地方，他们怀疑是“反革命小集团”的代号，也向上面汇报了。

校党委派人查阅了王申酉的家庭、亲友和中学同学的档案，没有发现“反革命集团”的任何痕迹。一位政治指导员不肯罢休，一次次找王申酉谈话，要他交出所有日记，企图从中找到他的“突破性材料”。经过思想斗争，王申酉决定：宁可不入团，也不交出日记！王申酉伤心极了。躺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场，这是他最早受到的思想压抑的伤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2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的广播，他感到一场残酷的斗争从天而降，而且“将席卷文教界，也许将涉及更多方面”。

果然不久，他从报纸上看到彭真、吴晗、邓拓已遭到批判。他在日记中写道：“难道彭真、吴晗、邓拓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说我终日忧心忡忡，以为我始终在为个人考虑，我实是忧国忧民啊。”

“中国共产党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与世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20岁的王申酉发出沉重的叹息和思虑重重的疑问。

### 他预言：“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

1966年6月23日，王申酉从崇明岛回到华东师大。学校已经停课，校园气氛一片混乱和狂热。

他走进物理大楼，想找个地方写他的日记，但所有室内空间都被大字报塞满了。偌大的师大，偌大的中国，似乎成了大字报的天下。王申酉在日记中说：“这种大字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使中国富强，难道非要这样搞不可吗？”

他只好躲到学校对面的长风公园去写日记。他在日记上写着：“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啊！”

他走进学校图书馆新开辟的一间名为“锄草室”的屋子，里面放着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等书，一些同学在这里狂热地批判所谓“毒草”。王申酉看了一篇又一篇邓拓写的《燕山夜话》，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心想这些好文章怎么可能是“毒草”呢？于是在日记上奋笔疾书：“对邓拓等一些人的看法是，我想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

7月13日，他又在日记上写道：“现在报纸上更神化了，什么‘无限敬仰’、‘无限崇拜’，为什么不说不‘无限迷信’呢？……言必称圣旨，看必是圣旨，听必是圣旨，到处是圣旨。中华民族今后将是怎样的呵？”他预言：“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

1966年8月4日，华东师大一百多位教授在校园里被批斗，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吃泥土和毛毛虫。不久，物理系教授姚启钧跳楼自杀。王申酉面对这一切心头十分苦闷。

1967年1月，王申酉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他认为张春桥是“牺牲了上海许多群众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去的政治骗子”！

这一年，全国各地武斗升级，形势愈来愈乱。一天，王申酉回到家里，拿出报上批判爱因斯坦、牛顿的文章，愤慨地对弟弟说：“这样的伟大人物，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巨人竟然受到批判！可是全世界都不会忘记他们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还说江青“这个女人本来不准干预政事，如今被放出来发疯般地害人，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弟弟吓得说不出话来，他却坦然道：“我估计，百分之七十的人希望改变现状，结束这场革命；百分之二十的人无所谓，随大流；百分之七的人见风使舵，死心塌地要干到底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

在这样天下大乱的环境中，王申酉感到万分的孤独和无聊。他在日记中感叹：“这样无聊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早些回到科学研究的希望落空了，整整两年大好光阴沦到汤里去了！”

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看书，默默地思索，默

默地写日记。他写道：“几十万大学生，几百万中学生，几万万小学生在虚度光阴，更有几百万工人和几万万农民在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上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一致的。”他焦虑国家的命运，对当前的现实极度不满：“十年前划了几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这一次，历史开了玩笑，几十万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帮无赖、流氓、小人反而上了台！”

他的哥哥劝他不要再写日记了，倔强的王申酉不听。

哥哥的话不幸言中。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王申酉被“隔离审查”，抄家。他多年节衣缩食买的几百本书和一些无线电零件，直至他从14岁开始写的日记都全被抄走了，当作“反革命罪证”。“造反派”的皮鞭打得他满地翻滚，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他在白纸上写了几百个“天地难容”……这一年，华东师大几百个学生被点名批斗，成百学生被“隔离审查”，三十多个学生被迫跳楼自杀！

1968年1月29日，春节除夕。王申酉被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牢房。同牢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赵贵泉，他们很快成为知己。王申酉向赵贵泉学德语，赵贵泉向王申酉学英语。王申酉在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和英语，现在他又掌握第三门外语德语。

1969年4月，他被释放回校，监督劳动。王申酉决心自学自然科学知识。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他认真攻读无线电专业知识，又顽强地自学第四门外语日语。

1970年，全国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王申酉受工宣队点名批判，说他学习业务是“走白专道路”，学习外语是想“里通外国”！他所有的自然科学书籍，英、俄、德、日书籍和辞典被全部没收。而且勒令他不准再看业务书和外语书籍，只能学“毛选”和好好劳动。

王申酉气愤地写了《我的自由》《大学八年思想小结》和《我头脑里真实想的东西》三篇材料，交给工宣队。文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毛泽东、鲁迅关于学习和掌握人类知识的名言，反复申述他想学习一点有用知识的愿望。工宣队却认为他这是猖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一打三反运动”。被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留校监督教育。此时，他的同班同学毕业分配了工作。而王申酉仍继续留校，并再次被宣布为“敌人”。

**马克思的《资本论》像一盏明灯。他说：“我将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0年11月9日，王申酉又被送到苏北大丰干校劳动。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干校生活极端枯燥，除了吃饭、睡觉、劳动之外，闲极无聊，大家只能玩一种叫“争上游”和“工兵掘地雷”这样的扑克牌的游戏。就是玩这样的游戏，王申酉也没有资格参加，他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就是思维。思维是最残酷的法西斯专政也难以禁止的。而这恰好是王申酉的喜好。他不愿意把大好时间浪费在那毫无意义的游戏活动中。他在日记中写道：“做学生追求点知识；当工人追求点技术；当教师多追求点传授知识；当学者多追求点学术研究，为什么是罪恶？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干校有一个图书馆，有不少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但很少有人光顾。只有王申酉看上了这个图书馆。他利用图书馆里社会科学书籍目录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决计研读这些书，从中探索“这个社会的本质”。

他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实现他的读书计划的呵！白天，他拼命劳动，避免“监管小组”找他的麻烦。清早，他比别人早起一小时，在田头默默背诵德语单词，希望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中午，别人都午睡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他也不休息，到阅览室看书。晚上，放下饭碗，带着书和笔记本钻进一间堆杂物的小屋。小屋里堆有不少霉烂的土豆，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王申酉把烂土豆扔了出去，在屋里清理出一席之地，这就是他读书的天堂了。他开始攻读《资本论》一至三卷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埋头读书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回宿舍睡觉时常常是半夜时分。

王申酉从阅读《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中,获得一生从未有过的巨大精神享受,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他了解到,社会的发展决不是一团乱麻,决不是凭任何伟人的个人意志能操纵得了的,而是有它内在的固有规律。他了解到,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如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等,它们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根源。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到了与其他一切活动相比具有决定性的高度。在王申酉艰难探索的人生道路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多年摸索的黑沉沉的夜。

《资本论》他看了两遍,还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即使回上海度假期间,他也每天都在黄埔图书馆度过。

然而要真正掌握《资本论》中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以此来观察分析现实世界,必须占有丰富的经济资料。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年代,只有《参考消息》偶尔还透露一些外部世界的信息。可是王申酉连阅读《参考消息》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只能从偶尔接触到的《参考消息》上摘录一些资料。

一天深夜,他正躲在蚊帐里,靠手电筒的微光摘抄《参考消息》上一些国外经济资料。被“监管小组”的人发现了,没收了《参考消息》不说,还把他放在枕头里的资料和书架上的书、笔记本都抄走了。第二天被拉到干校操场接受批判,硬说他“学习马克思著作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

这场风波给王申酉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带来了困难,他们不让他看这些书了。王申酉被迫转移目标,他想不让看这方面的书,就看马克思主

义哲学著作和历史书籍吧。于是他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史简编》、《哲学史讲演录》《世界通史》《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等。他全身心投入这些经典著作,探索革命真理,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连干校领导都说:“阅读室的书让王申酉一个人包了。”

在干校还有两个所谓“反动学生”,因为他们参加过“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坐过监牢,后来也被发配到干校来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他们“看破红尘”,准备过“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王申酉不同意他们的生活态度。他避开“监管小组”约他们谈话,给他们开了一张学习马恩著作的读书目录,劝他们认真阅读,必有收获。从此,这三个被流放的大学生就经常聚在一起,学习探讨一些社会问题。

一天,王申酉和小黄一起割草,休息时听到高音喇叭里正在广播“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什么都好办了……”王申酉听后不以为然。他对小黄说:“这话不对。要发展中国经济,必定要搞工业革命,还要改变现有的经济体制。我想,农村公有制不变,可以按目前的生产队为单位,上缴一定的粮食指标,允许生产队用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进行自由贸易。各生产队可以竞争,这样农业可以上去。工厂要由厂长、经理



王申酉(前左)和他的兄弟合影(1975年6月)



负责,进行成本核算,按各厂自己的盈利自定工资、奖金,进行竞争。这样,工业也能上去。一定要重视运用价值规律……”王申酉所说的道理,正是当时被批判的。可是,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异,这些设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农村和工厂所进行的改革是多么吻合呀!而他这个话却是在1971年“文革”那动乱年代提出的,是一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我们现在难道不应该钦佩他的先见之明吗?!

在大丰干校一年零七个月时间,王申酉阅读了千百万字的马恩著作,写了一百多万字笔记,还抄了二十七万字《世界通史》和五六十万字的《马克思传》。他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刻苦学习,他从内心深处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竭力以它为武器考察社会问题。他彻底抛弃了过去那彷徨、动摇、苦闷甚至悲观的世界观,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对小黄说:“如果允许的话,我将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四人帮”覆灭前他预言:“‘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来到了!”**

1972年6月,父亲中风瘫痪,王申酉被批准回上海照料父亲,被安排在学校绿化组劳动。

他家离学校十几里路,原来他一直住在学校宿舍,这时他名义上已毕业,学校不再让他在宿舍里住了,他不得不天蒙蒙亮起身,步行十几里赶到学校。一天繁重的劳动下来,再拖着疲惫的身子步行回家,已是万家灯火,晚上实在没有精力再看书了。走投无路的王申酉被迫在学校宿舍楼楼梯下,一个只有四平方米的堆放清洁工具的三角形暗室安身。自己安装了一个三度光的小灯,用一张破席子铺地,晚上,就蜷伏在微弱灯光下,孜孜不倦地坚持读书。

绿化组的人都把他当作“危险分子”,离他远远的。只有一位中年女工对他颇为同情。王申酉看她有一副好心肠,就大胆请她帮忙从学校图书馆借几本书。因为学校图书馆已没收了他的借书证,他自己借不到书。他神色黯然地对她说:“没书读,比不吃饭还难受。”女工见他戴了政治

帽子还念念不忘看书,足见他有抱负,不像“反革命”,就慨然应允了。

她利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熟悉的关系,按照王申酉开列的书单,把一些外文版的马克思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一次次送到王申酉手中。

一次劳动休息时,王申酉对这位女工说:“你知道吗,我成天想的是我们国家的前途和许许多多受迫害、受屈辱的人的命运。”女工听了,不以为然:“你考虑这么多干什么?你苦还没有吃够吗?”王申酉神色肃然地回答:“我有我的理想和信仰。我个人算不了什么,我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还对这位女工说:“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过:‘追求伟大事业的人必须全力以赴,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而规律又能给我以自由。’我追求真理的自由谁也剥夺不了。”他还对她讲了许多真正的革命道理。这位女工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新鲜深刻的见解,暗暗佩服他,小声嘱咐他以后不要随便乱说。谁知一天晚上,当这位女工把王申酉要的书送给他时,被保卫科的人盯上了,把污水泼到这两个无辜人的头上,任凭他们抗辩、申诉都无用,女工被定为“帮凶”,王申酉的罪名也更加重了。

1974年5月27日,他被再次发配到师大在奉贤县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这里劳动条件更加艰苦,王申酉一天要劳动九个小时,星期天也不能休息,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和思考。

1974年秋天,王申酉随干校的教师到金山县营房大队一个生产队生活半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生产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调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实际对这个生产队作客观分析,判定生产队的经济性质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整个生产队的经济交换,百分之八十发生在生产队内部。社员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几百个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几百亩土地上,只能作简单再生产。王申酉断定: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不来个根本的改变,农村经济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他还认为,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上侈谈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简直是笑话,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报纸上连篇累牍批孔老二,王申酉一眼看穿江青一伙不过是借这场丑剧“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他对朋

友说：“他们自比为法家，这一点倒比对了，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法家子弟、封建余孽。但法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在两千年前对中国历史有进步作用。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溃灭，对当前社会早已失去进步意义。拾起历史上那么陈旧、腐朽的帽子往头上戴，还丝毫没有自惭形秽，实在是少见的丑闻。至于还给自己脸谱上涂上几笔马克思主义的油彩，那就更滑稽可笑，更无耻可恶了。”

这一年，邓小平出来重新主持工作。王申酉十分庆幸。他认为小平同志学识渊博，光明磊落，为了全党全国人民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魄和实干精神站出来主持工作，短短一年就打开局面，中国眼看有了一线生机，中国人民眼看能从灾难中解脱出来，他真高兴啊。可是不久“四人帮”又借“评水浒”为名，大作文章，意在批判周总理，再次打倒邓小平。这一伙魔鬼的诡计，实在是计穷智尽了！

1976年1月8日，广播中传来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正在奉贤干校“改造”的王申酉听到后呆住了。他一向说自己“不流泪只流血”，但那天晚上，他把枕头哭湿了。

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神州大地上空乌云滚滚。王申酉这时被调回上海，安排在师大防空办公室搞“深挖洞”的工作。他深深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常常独自在人民广场上徘徊、思考。他在一家新华书店发现柜台里藏着周总理遗像，立即买了一张，挂在自己的书桌边，常常满眶热泪地凝视着总理遗像。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王申酉极其兴奋，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上写道：“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史册，激励今后世代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奋斗到底！”

1976年七八月间，“四人帮”又发出对所谓“三棵大毒草”的围剿，国内人人自危。王申酉写信给他在内蒙当工人的弟弟说：“周围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已到了我不能容忍的地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已降落在我们这个勤劳善良的民族身上。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都应正视这个现象，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压在人们心头的话总有一天会奔放出来，‘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这是王申酉在“四人帮”覆灭前夕对中国政治形势所作的预言。他的预言很快为不久后发生的惊人事变而证实。

## 一阕甜蜜、忧伤的爱情奏鸣曲

在王申酉不幸、短促的一生的最后阶段，命运为他演奏了一阕甜蜜而忧伤、深沉而悲壮的爱情奏鸣曲。

1976年6月，一位可爱的姑娘悄然走进他充满忧患的生活。她身材颀长，面容姣好，初中毕业后进了工厂，是无线电厂一名女工。她也喜欢读书，关心时事，希望找一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她的理想伴侣。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姑娘由介绍人（王申酉的中学同学）陪同，来到东台路口和王申酉见面。王申酉衣着朴素，一件白色两用衫，一条蓝色布裤，眉宇间自然透露出一股英气。

姑娘知道王申酉是师范大学毕业生，知道他暂时在校办工厂劳动，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分配工作。但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深谈。

王申酉却想试试姑娘的志趣和胆量。他笑着问她是否知道复旦大学一位名叫胡导钧的学生（胡导钧曾因反对张春桥，被定为“五一六”分子，遭到批斗）。姑娘点点头说，这个人很有胆量，敢反潮流！王申酉紧接着说：“你是否害怕和这一类人来往呢？”姑娘不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尽管她是同情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的。在伴她回家的路上，王申酉执拗地问她：“假如我像那些人，你害怕吗？”姑娘壮着胆子小声回答：“我不怕！”王申酉开朗地笑了。受到姑娘回答的鼓舞，他约姑娘三天后在老西门见面。

三天后，在老西门，他兴冲冲来了，给姑娘带来两束洁白、芳香的栀子花，还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勇敢的革命者为了寻求真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女朋友把他最喜爱的栀子花撒在他的坟墓上……当他们感情发展更深一层时，王申酉问她：“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我落难了，你会跟我吗？”姑娘心里掠过一丝恐惧，他为什么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过经过了几次交往，特别是



她收到王申酉那一封内容深刻、文辞优美的情书,她深深地被王申酉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高尚的情操吸引住了。她毅然回答:“我会跟你的。你现在不也在落难吗?落难的你本不该交朋友的。”姑娘调皮地说了一句。王申酉笑着说:“我就是要在落难时找朋友,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第三次见面,他给姑娘带来芬芳的白兰花,又推荐姑娘看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者及遗产》。他还给姑娘带来他从德文翻译的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支的名著《往哪里去》的译文。他告诉姑娘,这本书写的是罗马帝国暴君尼禄残酷迫害原始基督教徒以及他最后灭亡的故事。他很喜爱这本书,一面看一面随手翻译,把译文送给他心爱的姑娘。

王申酉多年追求的理想伴侣,似乎在这位姑娘身上朦胧出现了。他们谈恋爱,不是在花前月下,而是奇特地安排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每次,王申酉急急赶到阅览室看书,姑娘也从工厂匆匆赶来,坐在他身旁默默看书。图书馆关门后,两人才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谈。他们谈彼此的爱好、志向,谈看过的一些书和当前的时局。

他们仅仅游了一次虹口公园,在鲁迅墓前停留很久。王申酉十分崇拜鲁迅,背了鲁迅许多诗。当他背到那首著名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时沉重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听到那一声惊雷的!”

他们情感、思想的交流,更多是靠“笔谈”。王申酉与姑娘相识70多天,他给她写了13封信,好几封都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这些信是王申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说理透彻的政论,是他抒发个人胸怀志向优美动人的散文,有的还是关于音乐的专论。

7月10日,王申酉在第三封信中叙述了他的世界观以及对理想伴侣的愿望。他说:“我十分低微,绝不敢狂言追求什么伟大的事业。但我总感到人应当凭信念活着,应该追求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为此我不但需要耗费自己的精力,而且必须求得自己终身伴侣的理解和同情。当然我并不要求对方分担同样沉重的负担,作出巨大的牺牲。我只要求在我全力以赴追求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时,你会对似乎漠视你的幸福的情况抱原谅的态度。如果要求我有完美的健全的学识,使人生有价值,又要求我沉溺在琐碎的小事中,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

王申酉从心底希望他心爱的姑娘能透过他身上的污泥认识他平生的价值。他对姑娘说:现今“这个社会专门压抑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我在较全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从原先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理解现实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正在顽固地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的悲剧完全是社会的悲剧,绝非是个人的悲剧。”

学校保卫组的人知道王申酉有了女朋友后,竟赶到姑娘的工厂,当着姑娘和厂里同志的面,污蔑王申酉是“反革命分子”,政治反动,道德败坏,五毒俱全!这对姑娘是晴天霹雳。她犹豫了,退缩了。

王申酉发现姑娘情绪不正常。在他追问下,姑娘才告诉他保卫组的人对她说的话。这对王申酉是沉重的当头一棒。他悲愤地说:那些人为什么要那样昧着良心作弄我,坑害我?他想,既然问题已闹到姑娘单位去了,他将对姑娘彻底谈谈自己的世界观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让她对自己有个透彻的了解和选择。

9月5日,王申酉和姑娘见面时,相约9月11日再见,到时他要把一封长信交给她,让她看后作出正确的抉择。

9月7日、8日、9日他连续用三个晚上写这封信。11日这天他正在伏案疾书时,被一个一直监视他的人扑上来抢他写的信。王申酉气愤地说:“我写给女朋友的信,怎么能给你看呢?”他急忙把信撕碎,丢在自来水池里。那个人见抢不到信,便哇哇直叫:“抓反革命!”就这样,王申酉仅仅因为给女朋友写了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又一次被“专政”了。9月11日下午4时,押解王申酉的吉普车向普陀区拘留所呼啸而去!那时“文革”刚刚结束。

##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供状”

警车飞快越过上海闹市区,驶向普陀区拘留

所。当晚即开始审讯,紧紧围绕着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展开。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情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高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在1976年?”

答:“我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中国有了希望,我的思想是和他完全合拍的。1976年批判邓小平以后,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这在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上都讲了……”他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都给公安局当作“罪证”收缴了,在内蒙做工的弟弟也被关了起来。

一个多月20次审讯,预审员反复要求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而王申酉认为这不是攻击,他是讲真理,讲人所共识的客观事实。

1976年11月18日,办案人员要王申酉重写一遍给女友的那封没有写完的长信内容,作为一份他全面的“亲笔供词”。

原来的那封信已被他丢到水池中毁掉了。再重复写这封信时,他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手头也没有马恩典籍可供翻阅,一切全靠他惊人的记忆力,全靠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靠他多年生活的观察积累和深入思考的透彻分析,他下笔一泻千里,从11月18日到23日,6天中写了6万多字。

王申酉在1976年9月7日至9日用三天工夫写给他女朋友的这封长信分八个问题。除了他谈到与女朋友的结识及双方关系发展前景的问题外,主要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他的世界观;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毛主席的看法;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

这是一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剖析当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求建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很有价值的宏篇论文。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却被当时的审查者们当作王申酉“恶毒攻击罪”的

罪状供词拿出来。

王申酉这份“亲笔供词”全部复述了他在写给女朋友信中的内容,是他十年探索、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联系社会实际形成的真知灼见。

当时万恶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他满怀希望他的命运会有根本的改变。他给父母写信,要求他们用他的工资代买《资本论》1-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传》《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书送来,还准备在牢中再次攻读马恩著作。谁料想竟无人理会他的正当要求,连这封家书也被扣压。他日日地兴奋和期待着。他万万没有想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个人迷信”“极左思潮”仍然紧紧禁锢着当时执政部门一些同志的头脑。凶险的命运在等着他!

## 六分钟决定他的命运,他不幸倒在我们自己人的枪口下

1977年年初,北京传来中央文件和通知,再一次强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者,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

1977年3月,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五一”节前要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要求法院上报案例。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人员立即到各区、县选择公判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选中。“全面专政机器”飞速开动。

时间紧迫,连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顾不得了。按规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诉后,法院才能受理审讯、判刑。可是,王申酉一直关在公安局,并未移交法院审讯。为了赶在3月20日前向市委上报公判案例,3月8日,市、区两级法院审判员联合突击审讯王申酉。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安局的起诉书。普陀区公安局的起诉书是在3月9日才正式送到区法院的,而在头一天法院却已开始审讯。

3月8日、9日、10日、16日上午,普陀区法院和上海市高级法院联合提审王申酉五次,围绕“攻击罪”整理出了“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反右派运动”、攻击“反右





#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

● 孙 郁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与文学的发展史,是两条不同线。认识每一条线,都不能孤立地看,参照起来,就可以窥见一些问题。在这里,把鲁迅和陈独秀对比起来,就可以摸到一些线索的。不过,打量这些线索,也该扩大一些眼界。比如陈独秀的命运,何以会如此,他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坐标。在这坐标里,我们环视周围的环境,是也有惊人的发现的。

我有时想陈独秀的苦运,也连带记起他的学生、曾做过共产党的高官的张国焘。张氏生于1897年,1916年10月到了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到北京几个月后,陈独秀才出现在校园中,任文科学长,论辈份,张国焘自然属于学生。他虽不在文科,是理工预科的新生,但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最先拥护的人员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算是发起人,后来因之而被捕。和陈独秀一样,由新文化的倡导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张氏晚年曾著有《我的回忆》,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章,资料很是可贵。比如记叙陈独秀出狱的文字,就画出了当时的氛围,陈氏的英杰式的仪表跃然纸上: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



陈独秀

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再没有回到北大。

陈独秀与张国焘,按天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的环境却让他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而转向政治。这一转向和胡适的政治热情不同,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了学人身份,甘愿做一个革命者。把五四的文化风潮,从书斋转向社会的内部。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沉重的现实不会让这样的学人沉到书本的深处,他们急于改变一种社会现状,革命才是重要的。《新青年》的另一类人如周作人、钱玄同就没有类似的冲动,他们觉得梳理旧物,引进新学,大量翻译域外学术,培养新的文化土壤,似乎更为迫切。历史的轨迹后来是这样的,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前者,惟有京派的几个少数人,却恪守了学术的园地。一向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读书

人,还像孔夫子所说的,有献身社稷的悲壮。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过陈独秀,他后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去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而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

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它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彼此有着相近的血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的巨大引力,是别一民族与国度无法相比的。

陈独秀最初组建共产党,就已意识到像国民党那样的党魁制是有问题的。解决它的办法,应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经过五四民主之风洗礼的他们,在思想深处就一直有着读书人的特点,存在一个基本的底线。问题的复杂性是,当他们投身于自己钟情的事业的时候,周围布满了种种陷阱,有时不得不被推向一种两难。背后是共产国际,身边多稚气的热血青年,以及各类机会主义者。在严峻的事实中,便不免有权力之争、党风之变。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感到“权力、组织、一致、领导”存有非人性化的因素,他们自己也在制造着这些东西。选择的悖论,是五四后知识界普遍碰到的问题。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多次暗示了此一点。后来所以脱党,走了另一条道路,有着十分深切的原因。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有些描写十分精彩。



个性与气质飘然于纸上。顺着他的思路,当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境况。张氏每每写到这里前辈,都有敬重之笔。偶有批评,语气亦十分中肯,没有漫画的笔法。这些印象都是自然流露出的,显然无雕刻的痕迹,解读的过程里,可以嗅出别一类文章中鲜见的气息。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大概就可以托现出来了。

在张国焘的眼里,陈独秀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他不太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于承认,是有气魄的。建党初时,其身上还有些民主作风,让人有一种信任感。此后中国革命一波三折,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农民运动中的流寇问题,使其渐渐感到早期设想的蓝图,已多难实现了。革命正在向相反的路途滑进,荆棘日多。不仅陈氏不能适应,张氏也苦楚难排,多积淤于胸。此一体验,后来的几代有知识分子色调的党内人士,都有一点的。《我的回忆》对陈独秀的把握,是建立在书生的基点上,并无政客的一面。张国焘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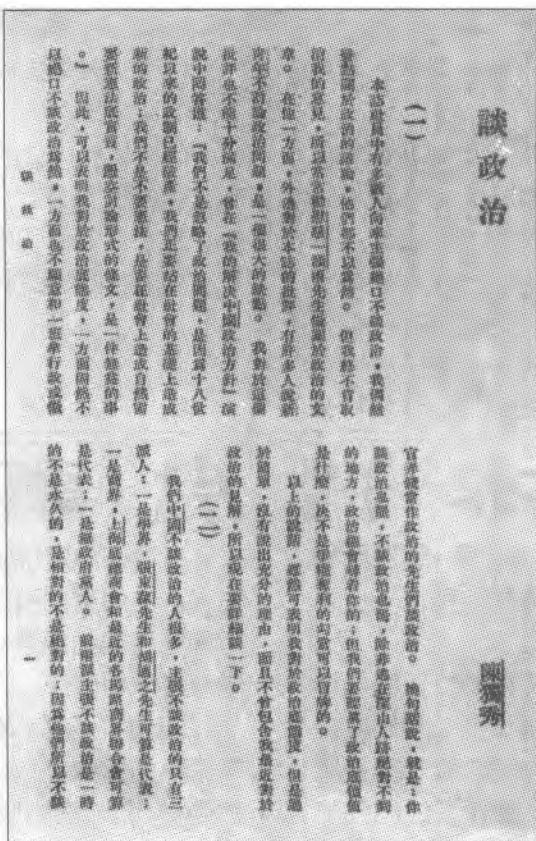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

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应当说,早期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寻路而有了一个路向,自愿地加入到一个行列里。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旧世界的遗风,俄共的习气都交织其间,知识界自然与其发生冲突。国共合作的时期,陈独秀就已经感到了其间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味地让共产党消融在对方之中。独立性的存在就可疑了。张国焘的回忆录不止一次地记录了陈独秀的发脾气、愤怒和焦虑,因为他判断的事情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迥异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时候他感到了党内独立见解的不易确立,个人的真实感受成了罪过。连瞿秋白这样文人气的人,在掌权之时亦带有片面的、伤害他人的一面。政党机器的运作过程,反将个体的人血肉之感抹杀掉了。张国焘这样写道: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



陈独秀文章《谈政治》(1920年9月)



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如果不是作者记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不会懂得事态的严峻性。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人的书斋里的设想,大多要破灭的。创立过五四独立精神的人,现在面临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存在。陈独秀被撤掉职务之后,共产国际就已经意识到这位前任总书记潜在的破坏力。俄国的托洛茨基不是被铲除了么?那原因是他有了异样的声音,不协调了。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希望有多样的声音,因为那时面临的黑暗过于强大,统一性、共同性要远远重于分歧性、个性。斯大林就担心陈独秀会不会另组一个政党,那样的话,中国革命就完全混乱。张国焘有一次见斯大林时,就被问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档案,不再成为机密,人们终于可以窥见其中的讳莫如深的存在了。回望那一段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端。最倡导自由的人,一生都置身于非自由的环境中;为大众殉道的寻路人,却被大众的冷眼所视,收获的只是悲凉的苦果。文学家们描述那一段历史,诗的成分过多,不得要领。瞿

秋白已经很是人性化的人物了,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得不做一些背理的事。至于陈独秀、张国焘也难逃劫运,一生之中做过许多错事。那一代人是经历大痛苦的,所从事的事业,越走越远离了自我。几十年过去,却发现漫长的跋涉,并无彼岸,迷津四布,反而不及起点时那么目标清醒。世间的道理,唯有体验过生活的人,才最为清楚,在象牙塔里永远感受不到这些的。体验中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这是那一代人给我们的馈赠。未经历于此的人,事前向其述说而无用。待到事后,又无可如何。大家都在这样可怜的世间。

张国焘与陈独秀在晚年都放弃了政党事业。在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失败者。关于他们的批判文章和图书,已很是不少。作为一种现象,在讨论二人的历史时,以成败论英雄未必正确。问题在于,政治失败了的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胜利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其中引发出的教训是什么?张国焘的情况十分复杂,世人对其有好感者不多,暂且不谈。仅陈独秀带给后人的遗产,是丰沛的。他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了自己的家园?难道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这是现代史的一个黑结,它解开了,也许历史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文中所引张国焘文均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

(2004 年 2 月 18 日于香港浸会大学)

(责任编辑 萧 徐)

## 本刊启事

一、有关报刊转载我刊的文章,要注明转自《炎黄春秋》某年某期,并寄给我社一份样报(样刊)。

二、我社来稿很多,对稿件的处理情况不能一一告知作者;作者寄出稿件三个月后未接到我社刊用通知,即可自行处理。我刊不采用的稿件不退稿;需要退稿者,请作者注明并附足邮资。

三、投寄我刊的稿件,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构。文内重要引语、数据、资料要注明出处。因内容失实和抄袭他人作品引起纠纷和诉讼,由作者承担责任。

四、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所刊文章更贴近读者,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您想看哪种题材、哪方面内容的文章,以便我们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本刊编辑部

# 听武纡生谈李达

● 申 春

武纡生同志是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抗战时期，他曾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我和他有过多面晤谈。一天，他向我谈到一件轶闻。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致信时在重庆的李达，诚邀他偕夫人及子女去延安，而李达思之再三却婉辞毛泽东的邀请，这个中缘由至今仍鲜为人知。

李达，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零陵。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回国后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月刊。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不久，他又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后曾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刊物。

1923年，李达因对建党一些重大方针政策不赞成，不堪忍受陈独秀的作风，离开上海回到湖南长沙，即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而脱党。

北伐时期他曾辗转于武昌、上海、北京、湖南等地一些大学执教，并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过着闲适的书斋生活。冯玉祥将军在山东泰山隐居期间，李达应冯玉祥邀请前去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流亡到贵阳大学执教。

1938年秋，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期间，率一批督导人员赴川、湘、黔等地检阅部队。1939年2月在贵阳停留期间，冯玉祥知悉李达在贵阳执教，特约请李达前去晤面，冯玉祥对李达非常尊敬，见面时称他为“李先生”。交谈中冯玉祥特邀李达一起到重庆去，李

达欣然同意。俟后，李达偕夫人、三个子女以及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意的武纡生一起随冯玉祥将军到重庆，李达一家安排住在余家祠堂。

1939年4月开始，李达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唯物辩证法理论课，除冯玉祥外，听讲的还有秘书赖亚力，副官赵力钧、周茂藩、武纡生等30余人。李达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冯玉祥的称赞。据武纡生回忆，李达在重庆共讲了七八次课便中断了。主要原因是由于日寇飞机对重庆空袭日渐频繁，冯玉祥将军为安全时常变换住处。

李达在重庆除讲学外，也到社会上做些调查，并撰写了多篇形式逻辑方面的论著，先后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

有一段时间，李达和武纡生同住一室，在朝夕相处中，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坦诚交谈中，武纡生了解到李达作为上海党代表出席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曾当选为党中央的



89岁高龄的武纡生

宣传主任,特别是李达著述很多,在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这些令武纤生对他更加崇敬。

一天,李达随手从皮箱中翻出毛泽东的一封信,递给武纤生。据武纤生回忆,毛泽东这封信写于1938年,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李达和他的夫人表示关怀之意,毛泽东尊称李达是“真人”(据当年李达给武解释“真人”乃湖南地方对人常用的褒义词);二是毛泽东说他已是第三遍读了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三是诚邀李达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

武纤生手捧毛泽东的信连读两遍,信中流露出毛泽东对李达既尊敬又十分关心。武纤生当即问李达是否准备去延安。李达开始沉默不言,不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去延安定受照顾,这我当然是不忍心的,再说一家大小也会不安的。”

据武纤生回忆,李达这番话并不是他不去延安的真正原因,因他早于1923年秋已脱离党组织,后又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过脱党声明,李达决心继续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并从事讲学和理论著述。

武纤生曾将毛泽东致信李达的事向在冯玉祥身边的中共党员赖亚力谈过,不几天,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知悉后,特派车来接李达去南方局谈了一次话。因董必武和李达都参加过中共一大,董必武也理解李达的选择,也很尊敬他,同时也劝他去延安看看,并愿为他去延安提供方便,而

李达却一直未明确表示去延安的意向。

李达曾多次向武纤生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李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李达在重庆通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后惊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水平已达到新的高度,毛泽东不愧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特别是毛泽东在信中写到已第三遍读了《社会学大纲》,李达对此深感欣慰,备受鼓舞,他更加勤奋研究哲学理论。

李达在重庆作为冯玉祥将军最尊敬的客人,所以他受到的礼遇也是不一般的。每两个月,冯玉祥便嘱秘书赖亚力给李达送去200块银元,以作李达一家人的生活补贴。尽管如此,李达既不打算去延安,又觉得重庆也不是久留之地。他曾坦然向武纤生说,他想到一个新环境去从事讲学和理论与研究与写作,他计划创造条件,开办一个书店或创办一个刊物,并再版他的《社会学大纲》,译著《法理学大纲》等著作。

1939年深秋时节,李达终于辞别了冯玉祥将军和家人,只身离开重庆前往广西桂林。他到桂林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不愿潦落异乡,回到湖南家乡零陵过起凄凉的田园生活。

1944年,武纤生在重庆接到李达的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思想消沉、心情苦闷的情况,还谈及他一次遭到土匪的洗劫,险些丧命,一些衣物及毛泽东那封信全被劫走。武纤生对李达处于困境的情况深表同情,他当即给董必武同志写了一封信。董必武当面对武纤生说,李达虽已脱党,但他爱国之心尚存,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拥护党的抗日主张。中共中央南方局曾从经济上分别给在湖南的李达及其在重庆的家属以补助。

新中国成立后,武纤生在北京见到李达时,李对董必武的博大胸怀由衷敬佩,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文革”中在武汉含冤逝世,1980年平反昭雪。



1920年上海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

(责任编辑 吴 思)



# 李立三在自我批评中度过后半生

● 李思慎

1999年11月18日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优秀共产党员李立三同志百年华诞纪念。立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全国解放初期，我在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随着大区的撤销，1954年9月11日调到北京。当时，中央的设想是在北京设立六个地区工作部作为过渡。但实际工作没有开展，1955年初又决定把六个地区工作部解散，打乱重新组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四个办公室。我有幸被分配到主管工业和交通的第三办公室。春节（1月24日）刚过，就按新的机构开始办公。

一到“中三办”，就听说“中三办”的主任是李雪峰，副主任是李立三和高扬。虽然当时我是一个刚刚22岁的小干事，但在西南“革大”学习革命史时，也简单地知道一点“立三路线”错误。在未见李立三之前，只听说他是一个赫赫有名而又犯过严重错误的老革命家，但不知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月14日下午，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北京西苑大院三号楼的会议室里，“中三办”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李雪峰、李立三、高扬到会与大家见面。正式开会前，会场内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只见个头高大的李立三，花白的头发，戴着一副玛瑙色框圆形近视眼镜，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端坐在那里。在李雪峰作简短讲话，向大家介绍了李立三、高扬之后，李立三出人意料地自我介绍道：“我就是那个在党内犯过‘立三路线’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在苏联呆了15年，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比同志们要缺乏一大截。回国以后这一段时间，在全总又犯了新的错误，在劳动部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要向同志们学习，请同志们多给以监督和帮助。”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真挚，对于像我这样参加革命时间不久的年轻干部来说，确实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

1960年底，根据党组织的派遣，我有机会直接到立三同志身边工作，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7年6月22日立三同志遭受迫害含冤离开人世。从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开始，特别是在担任他的秘书以后，在十多年时间中，立三同志有功不自居，有过不讳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

据我后来得知，早在少年时代，李立三就曾经在一张与朋友的合影背面写下过这样的题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说明李立三从小就不是一个随波逐流，听从天命的人。他怀着强大抱负，要干出一番伟业来。

李立三1919年跨海求学。年仅20岁的李立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发动和领导华工和学生开展斗争，被众人称之为“小领袖”；回国后，领导工人运动，功不可没。当时，哪里有困难，党中央就委以重任派他去哪里收拾残局。

在我党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当中,李立三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是辉煌的十年。他在白色统治下搞地下斗争,敌人两次出以重金悬赏要取他的人头而未能得逞;在枪林弹雨中没有伤及他一根毛发;在他还活在人世的时候,党组织在五年时间内,就曾先后为他举行过三次追悼会,其中有两次是周恩来主持的。我们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出于好奇心,总希望能够听他讲讲这方面的传奇故事,但不管是故意问他也好,有人向他作调查也好,或是在闲谈中偶然涉及到某个事件某个情节也好,他始终是坚持一条:只讲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一涉及他个人的功绩时,总是笑着把话题岔开。他从不谈及自己的风云往事、峥嵘岁月,从不讲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历史档案中看到了李立三1939年10月在苏联的监狱中写的《我的声明》,其中这样写道:“我自从1921年入党直至1927年底的七年内,在中央和地方先后担任党和工会领导职务期间,从未犯过右倾或左倾错误,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

他还写道:“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10年中,有3个艰苦时期,每逢这样时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关键的地方去。第一个艰苦时期,指的是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在汉口枪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汉口党组织完全涣散,此时党中央派我去汉口担任汉口市委书记。通过一年多的艰苦的工作,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会组织。第二个时期指的是广州公社失败后,国民党军阀把广州淹没在血泊之中,屠杀了5000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此时,党中央派我去广东担任省委书记。这里,一方面是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党内干部中产生恐慌、气馁、动摇、开小差等现象。通过五个月的工作,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而且在广东创建了苏区。第三个时期指的是‘六大’以后,当时中国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农革命组织均遭破坏,党组织被迫完全转入地下,逃跑、叛变、出卖等事屡见不鲜,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势更加严重。还有一个十分可悲的情况,即

党内各种小宗派纷纷抬头,并且联合起来反对中央。这时,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成员(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内部困难,首先是粉碎了托派和右倾集团,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另一方面恢复了党和工农组织,开展了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苏区根据地和中国红军。由此可见,在这三次艰苦时期,我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一直为完成党交给我的重要任务而努力。”

但作为我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的李立三,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讲自己在这方面的功劳。1949年8月7日,李立三在工人运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相信了马克思主义就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少奇同志一开始也是投身工人运动。长辛店大罢工、安源工运、上海的五卅、武汉的工运都由少奇同志所领导。”

最典型的事例是,1963年电影《燎原》公开放映以前,《北京日报》记者请他写的“影评”,他在文章中都是讲刘少奇、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一点也没有触及到他本人的事情。当有人向他调查“南昌起义”时,他也都是只讲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人的功绩。在“文化大革命”前,史书上的南昌起义,从来不提及李立三。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李立三在这两大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真实的情况,是李立三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同时李立三又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始终是李立三政治生活中的两大禁区。他还是上海“五卅”运动和汉口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总指挥。这些被扭曲了的历史,至今还未完全恢复本来的面目。

众所周知,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在1930年6月至9月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

在对待错误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态度。一些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生怕丢了面子。而李立三则不然,他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

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一个人的面子和亿万人的面子哪个大?共产党员当然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他不搞阴谋,不谋私利,犯了错误,首先想到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承认错误,他就可以改正错误。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好比这墙上有钉子,你碰了一下,扎破了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了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

李立三不只一次地说过:“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就当好这个‘反面教员’。”正因为如此,李立三在他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把这句话当作他自觉遵守的“座右铭”。一方面,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努力以优异成绩作为补偿;一方面,他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襟怀坦白、主动地向同志们、甚至向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讲自己的错误,公开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即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也从不隐讳。努力当好“反面教员”,警戒后人。

1949年,李立三第一次见到分别20多年刚从蒋管区历尽艰辛来到北京的儿子李人纪时,一不叙情,二不问事,一见面就问:“我犯过错误,你知道吗?我犯的‘左’倾错误,就是瞎干、蛮干。”他多次告诫他的子女要吸取他的教训。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自己少年时期的一件往事时,曾经写道:“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坏习气,使我吃了不少亏,后来犯错误,和这个有直接关系,思之痛心。望你们千万以此为戒。”

不仅如此,他对初到他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总是要主动地说,他是犯过严重错误的,思想上有片面性,要求随时对他以严格的监督和更多的帮助。他鼓励大家对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大胆地提出来与他进行讨论、展开争论。像这样的“入门第一课”,长时期

以来,可以说已经成为立三同志的一条惯例。

李立三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国内一些场所,都曾情绪激昂地公开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所在。不了解情况的与会者还以为他是在批判别人,只有当他最后点明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这种现身说法的事例屡见不鲜,给听报告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0年,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就主动深刻检查,勇敢地承担起全部责任。他遵照共产国际的召令,迅即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为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门听取他的汇报和检查。李立三在各种会议上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给予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反复多次进行了全面深刻系统的检查和批判,承认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李立三十分深刻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得到了大多数共产国际执委们的赞许。库西宁当即表示:“立三在这里很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觉,这里确实没有两面派的手段。”

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结束后,根据共产国际决定化名李明,以研究生的身份进入了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一个周末的下午,列宁学院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会,李立三被指名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批判立三路线》。在他的发言



李立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里列举了许多惊人的事例,历数“立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讲着讲着竟痛哭流涕。台下的听众都深深地被他生动的发言吸引住了,并不时为他精彩的批判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听众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更加深恶痛绝。大家纷纷议论说:李立三如果在这里,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李立三作完长篇发言走下讲台后,人们立刻把他紧紧围了起来。有人问他:“你怎么讲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亲自经历一样。”李立三难过地垂下了头,面有愧色地说:“我就是李立三。”大家都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后来有一次李立三在莫斯科郊外一所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讲课,享有副教授职称。在讲授“立三路线”一课时,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极其深刻。当时听课的学员并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后来知道了真相,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反省,表现了共产党人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

1946年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处的飞机经北平到了延安,他在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过去15年来的经历和在东北的工作,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的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请求: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一次话。得到毛泽东同意后,由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师哲同志安排,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对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一开头就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立三,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4个月的感受。

有一次,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在辽阳市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会场座无虚席。部队负责人请刚从苏联回国的李立三到会上去作报告,李立三欣然同意了。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李隆郅是谁。只见一位瘦高个的中年人走到讲台上就讲开了。他首先讲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和成功的经验意义,接着用了两个多小时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讲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后,又讲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他提高了嗓门说:

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随后,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计划,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先后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提出了“来一次暴动,取得一次成功,一口吃掉一个大将军”等“左”倾冒险主义。当这个命令和决议下达和执行过程中,毛泽东等同志曾经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正确意见是右倾,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惩罚。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下,我们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会场鸦雀无声,个个听得入神。报告人突然大声向听众发问:“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台下齐声回答:“不认识。”这时,报告人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会场喧腾开了,随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无不为了李立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感动。这时,李立三招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接着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发展和巩固解放区,扩充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并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1949年2月,李立三经北平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他主动要求发言,又一次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的,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而王明却拒不作检讨,恰成鲜明对照。因此,刘少奇在会议上表扬了李立三,说他有自我批评精神。

1949年5月初,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李立三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希望天津的领导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开手足,大胆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以惊人的坦率在上千人的大会上,公开检讨了过去犯的“立

三路线”错误,令与会人员无不钦佩。

1949年9月7日,李立三在中央燃料工业处华北电业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曾经讲道:“知识分子好面子,为了保存面子有缺点不肯承认,不肯改变,越搞越糟。爱面子的结果是根本丢掉整个面子。我们要帮助这些同志认识到面子是小事,否则丢掉的更多。我们不要怕承认错误,我们共产党员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算什么?面子更算什么?我过去曾犯过严重错误,大家知道历史上的李立三路线,我公开批判过我的错误。如以旧思想来看就了不得了,这不是面子上不好看吗?其实对我公开批评之后,可以帮助别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帮助旧人员丢掉包袱,要他们知道面子是小问题,有什么错误必须向群众公开坦白,并保证不再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气度是宏大的,群众懂得技术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能原谅他们。”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联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苏联、蒙古、朝鲜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代表117人。亚澳各国代表交流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李立三以东道国工会负责人的身份作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一些外国工会的代表,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运经验出发,单纯强调工会的权力、工人的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忽视民族解放的根本任务而不同意中国工会报告的观点,使会议发生原则争论。斯大林来电表示同意中国工会的观点,会议的认识才得以统一。会议促进了亚澳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两个地区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立三在向各国工会工作者介绍我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得胜利的斗争经验时,还以自己过去的错误为例,讲了我国革命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刚刚获得伟大胜利,一些人作为“开国功臣”正在享受人们的赞誉时,李立三却公开向外国朋友批评自己所犯过的错误。这种风格与品德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李立三相对地集中了一些时间,认真准备他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发言稿起草出



本文作者(右)和李立三夫妇(1961年11月)

来,先是送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征询意见,争得帮助。毛泽东极为仔细地审阅了这个发言稿,并对标点符号和个别文字作了改正,给予了明确的肯定。8月30日毛泽东亲笔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周恩来批:李立三在总工会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9月23日,李立三在大会发言后,《人民日报》在9月24日发表时,题为《对“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李立三在发言中重新讲了自己20多年前发生的、早已纠正了的错误事实后说道:“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得到了一点起码的认识,就是如果不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便会成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错误中去。同时,我在犯过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在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这的确是立三同志一生的最好写照。他的坦率态度与责己精神使与会者(下转第29页)

# 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

● 杜 光

## （一）自由并无阶级性

自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权利，既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之分，也没有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自由之分。自由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并非偶然地出现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即资产阶级的孕育时期。这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产物。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使人们不甘于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束缚，而诉求人身和精神的解放时，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便油然而生，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进军的号角。历史赋予资产阶级以埋葬封建专制制度的使命，同时也向他们授予自由平等这些精神武器。资产阶级同自由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现象，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自由具有资产阶级性。

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没有中断过，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被肯定是人的自然权利并由法律加以规范却是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事。在历史上，中世纪的自由主要是集体的自由，英国在 1215 年 6 月颁发的《自由大宪章》里，虽然有给予自由民及其子孙以种种自由的规定，但重点还是教会、城市、港口的自由。13 世纪以降，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论及自由时主要是指城市独立和共和自治，如罗兰迪诺在 13 世纪 60 年代写的《帕多瓦编年史》，就旨在歌颂帕多瓦的共和

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出于革命的需要，把自由主要解释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美国在 1776 年制订的《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明确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四条进一步解释：“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在这个经典式的自由定义里，我们可以知道：1、自由是指人们可以做一切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事，它们以别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2、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3、如何实现这种权利，如何界定自由的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说：“政治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根据这些经典定义，人的自由权利是由法律规范的。马克思就不无根据地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自由只能在法律范围内实现，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地各行其是。这是自由的一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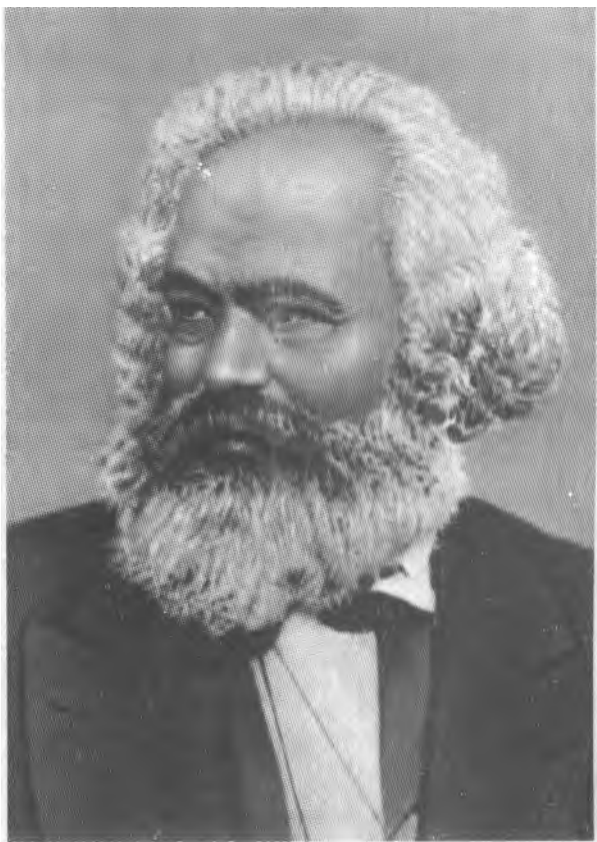


自由的另一特征在于它是理性的行为,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马布利把理性列为人类的第一个特征,自由是第二个特征,自由在理性指导之下,两者不可分离。英国的洛克也说:“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多次引述康德的观点:“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马克思也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它“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可见,自由指的是在法律范围内、在理性指导下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仿佛是为了更正人们对自由的误解,卢梭在他的一篇名著中指出:人们不应当“把与自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

正因为自由理念具有普适性,所以才能为马克思所继承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当然,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眼界的局限,资产阶级在争取和实践自由的过程中,必然以发展和维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为前提。马克思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资产阶级所争取的自由,从经济领域来说,是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从政治领域来说,是本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些都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自由的实现程度上,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超出本阶级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劳动者的有产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必然会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得以享受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这当然也符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自觉地充当了这个规律的实现者罢了。

## (二) 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资产阶级为确立市场经济和本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扫荡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自由的口



马克思

号曾经响彻云霄,它吸引了无数爱国者投身于其中。《马赛曲》里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既代表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为夺取自由而战的坚强决心,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精神。因为争取自由,实现自由,不仅符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自由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的共同要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奋斗目标。它是资产阶级前辈给人类社会留下的无比珍贵的瑰宝。正因为如此,一切先进的思想家无不推崇自由、宣扬自由,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者,更是把自由列入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如马布利说:“人们来自大自然的怀抱时都是完全平等的……而且都是完全自由的。”他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另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也指出:“人的自由就是要实现他权力以内的东西。”他把自由视为人类幸福的泉源,认为“人愈自由,国家将愈繁荣;反过来说,国家愈自由,

人将愈幸福。”另一位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也认为理想的制度是“全体的和谐,以及在全体的和谐中的每一个人的最大的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时,明显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空想共产主义前辈的思想成果。他们绝非偶然地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早年著作中曾指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而人的本质特征便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争取人的本质的复归过程,也是人的解放的过程。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人的解放,实现自由。马克思在他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中,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将“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生产条件”,建立“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即“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这个社会是由“自由结合的人”构成的,它的基本单位就是“自由人联合体”,换句话说,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在这个联合体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也明确地谈到,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在这个社会里,人将“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他在青年时代肯定“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到晚年仍坚持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对自由的追求始终是他们的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解放。何谓解放?陈独秀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人的解放就意味着获得自由。所以,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过去我们论及马克思主义时,更多地注意它的世界观、人生观,注意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而对它的价值观则很少关注。国外有些学者

也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遗憾的是西方现代学者几乎都是通过苏联这个标本来考察马克思主义、评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垢,被描画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使回归马克思主义、宏扬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学说显得十分必要、十分迫切。

### (三) 自由与现代化

人类社会由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说,实现现代化就是由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现代化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而这种发展和提高都有赖于自由。也就是说,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就以经济现代化来说,它始终伴随着自由的发展而发展。也可以说,经济现代化以经济自由为前提。什么是经济自由呢?经济自由是人类整个自由的经济基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祖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有一段关于经济自由的经典表述。他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斯密在这里说的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贸易自由、交换自由、投资自由,都包含着竞争的因素在内。经济自由所要求的竞争,是在平等公正的前提下的竞争,这就是说,竞争的机会是平等的,竞争的条件是公正的。实现经济自由,实现竞争的平等化、公正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之所以发育不健全,主要就是不能自由地、平等地、公正地展开竞争。不能一视同仁,没有免于特权干涉的自由。市场上充满了各种无法可依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竞争规则,甚至根本无规则可言,这就大大限制了企业发展的自由。这种局面如不改变,要实现经济现代化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市场竞争的自由、平等和公正,仍不足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市场经济不可

避免地会带来贫富不均。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情况下,真正的自由、平等、公正是很难实现的。马克思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他把占有生产资料作为自由的前提,鲜明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本质特征,既揭露了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在实现自由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提示了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只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实现了平等公正的占有,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劳动的异化,使雇佣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实现全面的经济自由。《共产党宣言》特别强调所有制,就因为所有制的核心所有权是自由的关键。

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民主化,民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主要表现。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权利就是民主权利,也就是卢梭说的“主权在民”。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民主是自由的政治保证;没有自由的民主和没有民主的自由都是不可取的。民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民主制和古罗马的共和制。但近代民主的理论体系则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当时的自然法学派从自然法演绎出人民的民主权利。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几乎都对民主有所论述,使民主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趋于成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

在我国,民主曾经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提出“建立和平、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一些根据地曾实行过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民主选举。毛泽东曾以斩钉截铁的语调宣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但民主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却遭到冷遇,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自由民主日益式微。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解放运动,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没有进一步揭露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家长制等现象,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

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邓小平说

得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个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且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主旨,改革现有政治体制。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改进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作为推行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共产党是现阶段唯一的执政党,它本身的民主是否健全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只有一个充分民主的执政党才能把国家带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繁荣,也是同自由分不开的。贺麟先生在他的《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指出:“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总起来说,真美善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而由于高级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理智所产生,可以说即是精神化——精神,使人精神心悦诚服。”贺先生在这里说的文化的内涵是真美善,就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也就是精神化——精神文明,它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真美善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的进步离不开自由。没有自由宽松的环境,人们对真美善的追求受到压制,它们的对立物——假丑恶便相应孳生。纵观当今社会,假丑恶泛滥成灾,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还是缺乏文化自由的环境。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快文化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其次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符合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方针,它的贯彻将会有力地推动文化艺术和学术理论的繁荣。其三是尽快制订《新闻法》,保障人民的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把对文化艺术和学术理论的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

但是,不管哪个领域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的提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素质低,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缺乏什么样的公民意识?我认为最根本的意识就是自由民主的权利和争取自由民主的义务。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只能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实现。鉴于公民对自由民主普遍缺乏正确认识,十分需要自由民主的启蒙教育。在公民的自由民主的启蒙教育中,理论界、教育界、学术界、新



闻界的知识分子，应当担当起这个沉重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但只要我们明确方向，持之以恒，便可以逐步地提高公民的素质。这是我国现代化的最根本的保证。

#### （四）人间正道是自由

“万类霜天竞自由”，追求自由是一切生物、尤其是人类的天性。石板下的小草懂得寻求自由生长的缝隙，荒野上的小鹿知道奔向水草丰茂的草原，具有思维能力的人更是无时不在为自由而奔忙。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诚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由于自然的社会的种种条件的限制，人的自由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特别是在阶级社会，被压迫者在受到经济剥削的同时，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也遭到剥夺。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提高和人们的主观努力，自由的范围必将扩大，人类终将完成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自由是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人间正道。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是为人类争取自由指引方向的科学。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最简要的概括。我们共产党人在接受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理念，并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实际上就接受了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原则。作为共产主义者，没有比争取实现这个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了，它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终生。几个

世纪以来，为了实现社会的自由，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共产主义者应当是这些自由先驱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作为一个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律，人类由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但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历史所能容许的自由的实现程度是十分宽广的。我们的责任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争取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为未来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需要积极地投身于争取自由的实践，而首先需要的是开展关于自由的研究和讨论。目前国内已逐渐兴起了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但都是宣传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的探讨却很少。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社会主义自由观同西方自由主义是异曲同工的，终将殊途同归。所以，目前应当从两方面同时着力，开发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由民主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固然需要发展自由民主，已经建立一定的自由制度、民主制度的国家也需要扩大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化是社会主义取得世界性胜利的前奏，是通向更美好的未来世界的大道、正道。中国人民将告别封建，告别专制，沿着这条大道、正道，奋勇前进！

（责任编辑 吴 思）

##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 通 告

2003 年合订本于 2004 年 1 月装订完毕，如购买合订本，请将书款汇至我社发行部

1999 年合订本：简装：51 元；精装：56 元  
2000 年合订本：简装：51 元；精装：56 元  
2001 年合订本：简装：51 元；精装：56 元  
2002 年合订本：简装：51 元；精装：56 元  
2003 年合订本：简装：51 元；精装：56 元

（以上均免收邮费并挂号邮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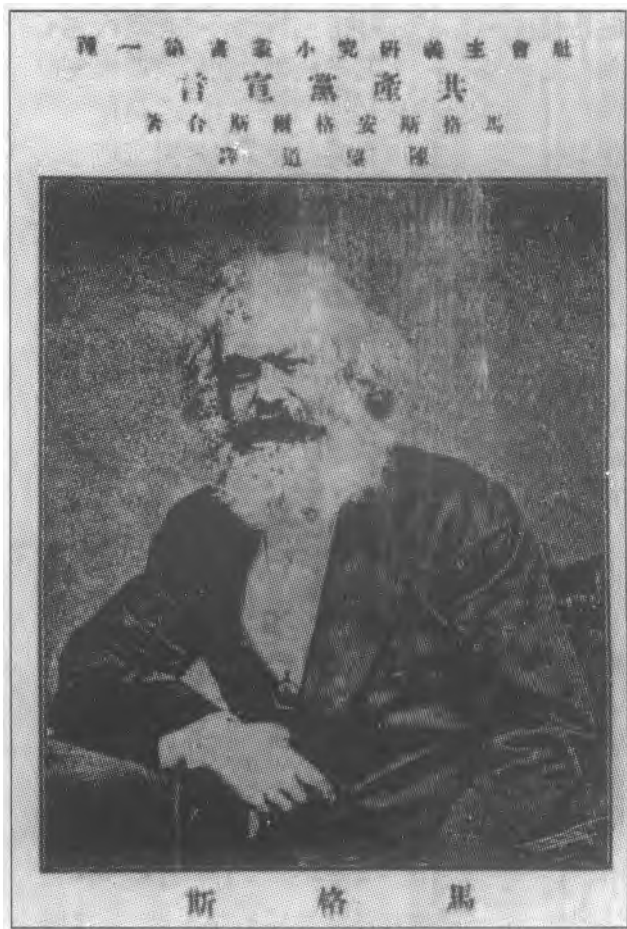
# 对《共产党宣言》的补充和修正

——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感

● 孟戈非

所谓两《言》，一是指 1848 年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二是指 1859 年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两篇巨著相距十一年，虽然背景不同，写作的目的不同，而且文字的风格、气度各异，但它们的基本精神则都是为了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奥秘，以及指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因此可以说，两篇雄文具有一定的对比性和参照性。

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1847 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开始起草《共产党宣言》。马、恩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所暴露的社会弊端，如“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由于生产过剩而产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促使阶级分化日趋严重，“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就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再也不是空想了。同时资产阶级还铸造了置自己于死地的“掘墓人”——现代工人阶级。于是断定：“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以尖锐、辛辣的语言和犀利、流畅的文字对资产阶级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对无产阶级抱着无限的同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于是一部震惊世界的巨



著——《共产党宣言》诞生了。

《宣言》发表以后十一年，也就是 1859 年 1 月，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了一篇寓意深远的“序言”，这篇“序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一书中，称之为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详见该书 208 页）同年 6 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该“序言”先在德国的《人民报》上率先发表，随

后又在美国的许多德文报纸上陆续发表,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正式出版时,才收入该书一并出版发行。由此可见,该文虽然是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但它的历史作用和政治理论意义却是划时代的。

我认为,“序言”对《宣言》来说,虽然仅仅过了十一年,然而至少仍在三个大的方面作了重大的修正和补充:

第一个重大的补充和修正,我认为在社会进化规律方面。《宣言》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在抗战时期我接受了这一理论。虽然社会进化的内容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如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和发现等等,都对社会进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使我产生疑问的例证是:原始共产社会没有阶级当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那么这个社会是怎么进化的?!这个问号在我的头脑里存在了几十年。虽然恩格斯加了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但仍然解释不了我上面的疑问。可是后来当我读到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时,“序言”却明确地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当作了社会进化的动力。我认为“序言”中的这一表述,不仅可以解释原始共产社会是如何进化的,而且还可以说明任何社会的进化规律。“序言”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的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II卷82页)从马克思这段概括中,雄辩地说明:生产关系、生产力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是一切社会进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说明两点: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两者永远不可分割;二是两者不能错位,生产力永远是决定的因素,生产关系永远是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的。两者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因此我认为:从《宣言》的把阶级斗争看成社会进化的动力,到“序言”的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序言”对《宣言》的一个很

大的补充和修正。它不是一般的补充和修正,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社会进化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第二个大的补充和修正是:《宣言》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因而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宣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强大到资本主义制度“容纳”不下自己的地步,因而生产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工人罢工、破坏机器、阶级冲突不断加剧,同时资本主义还为自己的灭亡“铸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及“运用这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阶级即无产者”来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以上引文见《共产党宣言》)可是仅仅过了十一年,马克思根据新的研究,在“序言”中却说:资本主义“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详见《马、恩选集》II卷83页)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我认为这是“序言”对《共产党宣言》又一个重大的补充和修正。

第三个大的补充和修正是:《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用行政手段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并且还提出十条消灭资本主义的具体措施。但是仅仅过了十一年,马克思在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中却又提出:“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II卷83页)上述两者的提法也是不同的。前者《宣言》是无条件地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后者“序言”则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物质的,它需要的“物质条件”必须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否则是“决不会出现的”。所谓“成熟”,我认为就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的,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工业化水平要高,生产力水平要强,社会财富的积累要丰厚。(详见该文第十九题)也就是说,上述的“物质条件”如果不具备,想超前用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用行政措施没收了资产阶级的财产消灭了私有制,



结果反而会阻碍或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败坏共产主义的名声,自己也是存在不下去的,实际上是欲速则不达。强大苏联的解体,中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教训,都充分说明超前思维是无济于事的,达不到目的。

以上三点论证,我认为充分说明:“序言”从根本上补充和修正了《共产党宣言》。

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已经有156年了。他们本来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写的宣言书。《宣言》发表以来,19世纪末时,欧洲少数几个国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曾掀起过短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时间最长的要算有名的巴黎公社的武装革命了,也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资产阶级的军队镇压下去。到了20世纪初叶,俄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十月革命,它虽然不符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所讲的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发生”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预言,因为它需要的“物质条件”当时在俄国还不具备,(详见《马、恩选集》I卷221页)但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因此当时列宁被斯大林说成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久,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东方和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普(上接第21页)深受教育,受到党内外一致好评。据说参加这次大会的郭沫若同志,听了他的发言,竟激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李立三正是这样,为了保全党的面子,尽管他是在党的幼年时期,他也只有30岁,犯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月,却坦率地检讨了三十多年。他这种对自己的错误采取的坦率态度,正是他无私的高尚品质、坚强党性的表现,也是他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

即使如此,在十年动乱中,他仍然没有免遭厄运。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给他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他和他的亲属都遭到

遍燃起,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很多封建性的国家,也普遍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很多殖民地国家取得了胜利,人民得到了解放,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号召力和影响力。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按照《宣言》的号召,走上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是,资产阶级不得不收敛他们的残酷剥削手段,相对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并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这也应该归功于《共产党宣言》所推动的工人斗争的强大压力。

然而,如果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那么156年的历史证明,《宣言》中若干论点还是不够科学的。而马克思在1895年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过145年的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在“序言”中所作的“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经典性的表述”,是精确的。无论是关于社会进化规律的研究也好,对资本主义灭亡条件的分析也好,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基础的论述也好,即前面所谈“序言”对《宣言》所作的三个重大的补充和修正,我认为都是正确的,是经得起革命实践检验的。(责任编辑 杜晋)

严重迫害。就是在如此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党的原则,宁可自己吃苦受罪,决不损害党和同志的名誉,更不向林彪、江青一伙低头。他的这种爱恨鲜明的立场和态度,自然更加触怒了那帮家伙。在遭到连续的批斗和禁闭折磨之后,他不堪忍受,不得不含冤离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才决定推翻强加给李立三的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宋平同志写道:“无论在革命高潮还是低潮,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立三同志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讳疾忌医,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淡泊名利,无私无畏。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应有的高尚品格,也是立三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李晨)

# 忆“三同”张老

——怀念报界元老张友鸾

● 舒 芜

“三同”张老，指张友鸾先生。我与他互称“三同”。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

“三同”原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政策术语，指工作队员应该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好谈心知心，发动群众。我与张友鸾先生互称“三同”，则有我们的典故，是指我们被宣布划为右派（1958年），宣布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布改正右派错划（1979年），三次的宣布都在同一时间场合。而本单位其他同时的乃至同案划右派的，后来虽然都摘帽、改正了，但摘帽、改正的时间，宣布的场合，彼此不尽相同。

我与张老同时同地听宣布摘帽，是1961年11月13日，当时我们还以为有多大意义，约定从第二年起，年年此日小聚小饮，以为纪念。后来渐渐觉得不大对劲，摘帽之后可以恢复“同志”的称呼，此外没有多少不同，背地里还是叫你“摘帽右派”，可是我们仍然小聚纪念。当时规定干部每人每年有一个月的轮流劳动锻炼，1964年的11月13日，我正与绿原同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参加卖书劳动。事先约好张老于书店下班时来，我们同到书店隔壁的闽江春小馆小吃。席间，张老偶然说起，我才知道前一天是他六十生辰。第二天，我用旧体诗形式写了一篇祝词道——

十一月十三日夜饮赠张友鸾先生兼祝六十之寿  
十一月十三，日历寻常字；而我与先生，频年得佳致；  
拮据共倾囊，相将买微醉；我惭无酒肠，公归一酣睡。  
今年又此日，习劳在书肆；期约及华灯，策杖飘髯至。  
客问何所为，答云是生祭；庾词虽滑稽，恍惚见深意。

人生天地间，所历非一事；事至异甘辛，事过尽堪记。  
庄生强齐物，汗漫聊自譬；七尺付百年，艰难岂儿戏？  
羞为沾沾喜，不下潸潸泪；风物放眼量，立身终有地。  
席上闽海珍，未必众口嗜；与其问庖人，曷如自尝试？  
泸州大曲酒，不饮香触鼻；当其储瓮时，胡由辨真伪？  
且作荒唐言，以代纵横议；今古揽奇观，聊斋搜志异；  
范张鸡黍情，狐鬼幽微意；收拾入新篇，鼎笔绘魑魅。  
清话颇移时，凌杂少序次；前日寿六旬，失口偶未秘；  
我欲补称觞，招邀几朋类；公言勿复尔，齿长徒为累；  
世情本如斯，菀枯各相避；但申来岁约，重证今朝事。  
前年我四十，手把耰锄器；担水点芋苗，带露刈麦穗；  
仰视浮云驰，卧逐凉风吹；自寿不成诗，辗转却成寐。  
今者寿先生，思量尤匪易；惟当袭陈言：长保松筠翠；  
十一月十三，永葆毋遐弃。

“客问何所为”的客，指与我同在书店参加轮流劳动的绿原，我们邀他共餐，他问为什么有此小聚。“答云是生祭”，是张老答道：“今天是我们的生祭。”冲口而出，把小聚的意思和我们的心情说得恰好，他一贯有这样妙语如珠的捷才，所以说是“庾词虽滑稽，恍惚见深意”。诗中虽有牢骚，如“且作荒唐言，以代纵横议”、“世情本如斯，菀枯各相避”等句，末尾还是相约“十一月十三，永葆毋遐弃”，满以为可以年年如此小聚一番。我们真是“鱼游沸鼎之中，燕巢飞幕之上”，不知道只隔一年，1966年的十一月十三，大家早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什么都谈不到了。

文革之后，我们第三个“同”之后，只见过两三面。最后一面，是1987年11月，听说张老决计和夫人崔伯萃女士回南京定居，我与周绍良兄同

去他家送行。张老已经因脑血栓失语,见我们去,很是高兴,半靠在床上笑容满面地相陪。我们告别时,他半靠在床上笑容满面地挥手送我们,是我记忆中他的末一张照片。从温暖的斗室走进茫茫的寒夜时,我明明意识到后会难期,却无悲戚之意。归途中,我一直默念着,为他们庆幸。我知道,南京对于他,不是故乡,胜似故乡。当初他离开新闻界,离开南京,到北京改行当编辑,本来都是不得已,对南京还是朝思暮想,现在可谓终于能“遂初”。1980年他应邀参加了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担任了《北京晚报》顾问,也算回到他当初立志终身的新闻事业。

别后不到三年,1990年7月,得到张老逝世的噩耗,我寄去挽联云:

新闻妙笔,古典鸿裁,尽俗文章皆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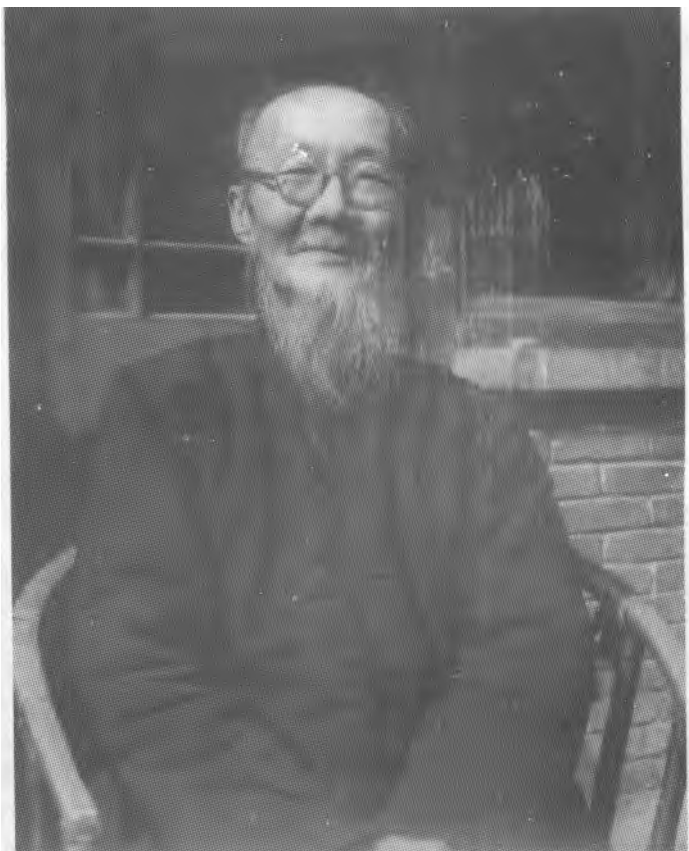
浊酒陪欢,清流共厄,三年喑默竟千秋。

上联说张老学问的三个方面:新闻,古典文学,章回小说。下联说彼此关系的始终,“清流共厄”指“三同”,“浊酒陪欢”却不大真实,我们同吃小馆虽然不少,我其实一贯酒精过敏,滴酒不沾,正如前引诗中所云“我惭无酒肠”,只是以吃菜陪他小饮罢了。

我们相识于1953年5月,我从广西南宁调到北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张老是年初调来,比我早几个月。他的大名,我已经久仰。抗战期间在重庆,我就是《新民报》《新民晚报》的爱读者,从这两家报上取材写过杂文。我已经知道“新民报三张”,其一是张友鸾(另两位是张恨水、张慧剑)。见面认识,才知道他是安徽怀宁人,我是桐城人,两县邻接,可算小同乡。这样一位著名老报人、大我约二十岁的乡前辈,一点没有乡前辈的架子。“平易,温和,幽默,胸怀宽广”,“坦荡幽默,达观开朗”,“旷达散淡”,“倜傥不拘,潇洒自如”,“待人谦和,温文尔雅”,“幽默风趣,妙语如珠”,这些是《张友鸾纪念文集》里面老朋友们描写张老风度品格不约而同的用语,与我的初步印象完全相符,后来越熟识,越是加深印象。

熟识之后,大体了解张老的历史:他是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出身,邵飘萍的得意弟子,

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进入新闻界,开始就是总编辑一级,很快显示出新闻工作的全才奇才,得到公认。他本来要以新闻为终身职业,解放前坚持民间报纸工作,不入官报。擅长编小型报,在《新民报》《南京人报》最久。抗战后的《南京人报》是他独力办的,政治上是独立、自由、公正、超然,新闻上注重社会性,注重文采,注重趣味,有很大成功。南京解放前,《南京人报》公正地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独裁、贪污、腐败,受到国民党迫害查封。解放后,与《新民报》一起得到批准仍然作为民间报纸复刊,为全国都没有民间报纸中之特例。不久改为公营,又不久,因为必须学《真理报》《人民日报》,失去特色,销路锐减,只好停刊,他从此结束了一生大愿,离开新闻界。三反运动起来,他配合运动写出章回小说《神龛记》,受到欢迎,上海正要拍电影,不料《文艺报》上一篇大文章批判之为《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使他不能再在南京待下去了。正好老朋友聂绀弩经过南京,聂本来了解他在新闻工作之余,已经研究古典文学,写过《汤显祖及其



张友鸾先生



牡丹亭》等论著,便邀他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工作。张老于是移家北京,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二编室。

起初,二编室的气氛比较宽和,工作之余,谈笑笑,做打油诗互相唱和,工作丝毫没少做。尤其张老,上班坐下来就不大走动,埋头工作。他给《水浒》作了新的注释,开创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加注的新领域,其他古典小说,也都是他作为小说组长主持整理出版的。他从不作打油诗,别人的打油诗,却不知为什么多爱以“赠张老”为题,抄写奉上。本来大家没有注意,张老自己指出这个现象,大家一想确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我首唱赠张老云:

伤风晨上值,淋雨夜归家。  
白日常寻梦,晴窗偶种瓜。  
传闻夸鹿马,相见话桑麻。  
□□□□□,□□□□查。

(末联忘记了。)

张老长期新闻界生活习惯于夜间工作,早晨迟起,所以第三句说他白日常寻梦。张老笑道:“我成了大烟鬼了。”是带欣赏的玩笑态度,没有愠意。这大概也鼓励了大家更喜欢做打油诗赠他,好像一班小弟弟爱缠着一位笑嘻嘻的老哥哥开玩笑。但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比张老大一岁,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也用此韵嘲张老,第三句云:“文章王卖瓜。”用“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俗典颇巧妙,张老笑纳,不以为忤。但末联云:“错自由他错,谁将字典查。”张老可笑着抗议道:“这可是领导在考核工作呀!”聂老连忙改为“一字难分处,康熙百遍查”,问:“这行了吧?”

及至王任叔来任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分管二编室,二编室气氛迅即紧张,“闲谈乱走打油诗”和所谓“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被指责为二编室四大要不得风气。关于“吃吃喝喝”,张老后来有小文追记云——

文酒之会,以谈为乐,原是文人们的享受和趣味。鲁迅先生当初在北京,也爱下个小馆子,西四“同和居”,就是他常去的地方。到了五十年代,仍然有许多人,继承这个传统。当时聂绀弩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同事中不乏老饕,招邀共饮,每周必会。说他们吃遍了北

京小馆子,当然是夸张;但是他们的足迹,踏过不少地方,这倒是千真万确。

他们轮流做东,仿佛像是个“转转会”。为写文章有些稿费,杖头之资,不虞匮乏。聂发表的稿子多,收入稿费多,所以做东的日子也偏多。有些小朋友们,少有稿费,就请他们吃白食。这也成了不成文法。

有那么一天,他们去到一家名叫“马凯食堂”的馆子。那天之前,聂拿到稿费,我也拿到稿费,聂多而我少。聂领头在前,走进店里,回顾一下说:“今天张老请客呀!”我便笑答:“先入为主嘛!”聂哈哈大笑,无言以对。那些小朋友,如今也是五十老翁了,有的还谈起此事,说直到现在,和人上馆子,总有戒心,不敢走在前面。想想多有趣!

马凯食堂是个湖南馆子,在后门桥迤北,鼓楼之南。什么蒸腊肉、炒鱿鱼、东安鸡、豆椒肉丝之类的菜,它都拿手。而且大师傅、服务员,很多湖南人,有一种特殊的乡土风味。所以他们后来一段时期,常吃马凯。到了一九五七年,出版社发布一个编辑条例,在它第八条中,规定社内编辑,一概不付稿费。对于那些老饕,影响不小。舒芜写诗一首,以表无穷的感慨。诗曰:

马凯漫相招,先看第八条。

两行编辑泪,羞过后门桥。

这简直是一首挽歌!这些年,真是“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他们之中,有坐牢的,有劳改的,挨批挨斗的更是比比皆然,风流云散,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酒之会!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知识分子又受到社会的重视。走到任何地方,都看到喜笑颜开的脸;走到任何地方,都听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真个是一片欣欣向荣之象。死气沉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马凯食堂(如今改称湖南饭馆)的老顾客又来了。启功教授和舒芜说:“你那首诗,如今要改一改了。”说着,就口占道:

酬报凭劳动,推翻第八条。

从今开口笑,重上后门桥。

——《马凯餐厅的文酒之会》——

写得轻松,其实当时很严重,“肃反”“反右”中,“吃吃喝喝”曾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下组织联络方式之一,这里且不深论。

下班之后,“文酒之会”之外,我还有很多向张老承教的机会。我与他同住出版社的草厂胡同宿舍。我住四合院里面,张老住一个小“别院”,进大门不进中门,向左一拐,一个矩形地带,实际上是四合院内通向厕所的旁角地,靠着外围墙搭起披荏三间房,就是张老宿舍。张老书桌当窗正对厕所,他坐在桌前,全宿舍谁上厕所都逃不过他的眼目。幸而空间还大,当窗搭起架子,种上藤蔓植物,隔一隔向厕所的视线,倒成就了一点豆棚瓜架的诗意,也就是我所谓“晴窗偶种瓜”。我又有赠诗云:“小圃当窗种菟丝,酒醒人困晚凉时。忽然一阵潇潇雨,闭户人家总未知。”咏他夏日豆棚下乘凉的情况。

张老这三间屋,今天回想很简陋,当时倒不大觉得,仿佛还是宿舍中的水平线以上的。张、崔二老诚恳好客,主雅客来勤。特别是聂老当时独住出版社机关,下班后经常来张老这里共餐,谈到深夜回去,各自灯下写作。我若知道张老那里有我熟识的客人,也常去共谈,学到不少东西,最多的是新闻界的逸事趣事。

记得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高涨,有一位黎东方教授在重庆公开讲演,说君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缺点只在好君主身后不容易有适当继承人,所以秦皇汉武求长生实在是不得已。他又说,农民虽苦,却不知道造反,有文人煽动,才会天下大乱。《新民报》的“本报特写”记录了这些高论,加上大标题曰:“可恨腐儒文乱法,只悲圣主不长生。”幽默风趣,典切工整,一针见血,我当时就据此写过一篇杂文,现在才知道那标题就出自张老手笔。又,抗战胜利后,传来郁达夫南洋被难的消息,又风闻王映霞已与某轮船公司总经理结婚,当时交通困难,出川不易,轮船公司是大家注意羡慕的敏感部门,于是《新民报》将两条消息综合加标题曰:“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

客死南洋。”妙不可言,现在也知道出自张老。

(附带说一件,但可能是以后才听到的:抗战胜利后,某次黄苗子、郁风夫妇偕丁聪同过南京。张老请他们在秦淮河某酒家小饮。这家有一位女招待颇著名,墙上悬有于右任赠她的对联。黄苗子向女招待介绍时,故意把郁风说是“丁夫人”。女招待以为黄苗子真是单身客,特别殷勤,后来才知道他的夫人就在座,很是尴尬。次日,张老把这件事在报上登出,加标题曰:“于髯翁挥毫桃叶渡,黄苗子调笑酒家胡。”后来黄苗子谈起,还笑道:“那时我是财政部荐任秘书,‘调笑酒家胡’的罪名,几乎害我受处分哩。”)

一些文苑交游,文坛点滴,张老偶然随意谈起的,例如,远在1921年,张老还是安庆第一中学一个十七岁的学生时,便结识了来到安庆教书的郁达夫。郁达夫便介绍他读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张老早年在北平时,去看过徐志摩,徐晨卧未起,床前凳上,整整齐齐叠着他的绸缎袍褂。焦菊隐结婚,周作人送贺诗曰:“郎情如烈火,妾性



本文作者(右)与聂绀弩

似干柴：今朝两相遇，并出火星来。”等等。我听了都有兴趣，从中领会不少东西。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来了。

1957年开始整风时，二编室早已人心思散，纷纷打主意离开。张老想回新闻界，已经联系有成。机关里鸣放，他好像请了什么假在家，没有参加运动。某一个星期日，二编室同事顾学颉来到张家闲话，我也去了，同宿舍的林辰也来了，谈了机关鸣放中揭露的许多消极事项，一个上午谈得很畅快。紧接着“反右”开始，我与顾学颉相继被揪出来，那个半日清谈真成了“盛筵难再”。我每天低头上下班，偶尔看见张老还在豆架下闲坐纳凉，远远对我微笑致意。我庆幸他没有卷进来，希望他能保平安。可是，北京召开了新闻界座谈会，那是专为“钓鱼”、“引蛇”而开的，张老出席，作了《是蜜蜂，不是苍蝇》的精彩发言，一吐他压抑多年的对于新闻界的意见，马上被钓出来引出来了。北京新闻界批判之后，发回本单位批判，正好满足了本单位的需要。先前“肃反”运动中，就批判过“二编室独立王国”，是以反革命分子聂绀弩为首，以舒芜、张友鸾为左丞右相。后来聂绀弩不算反革命分子了，独立王国还算不算，仍然悬着。现在可好了，“由聂绀弩独立王国到舒（芜）张（友鸾）顾（学颉）李（易）右派小集团”，这篇文章就这么水到渠成了（此时聂绀弩虽然也打成了右派，但是“肃反”以后他就没有上班，所以与我们“右派小集团”连不上）。领导全出版社运动的人兴高采烈，发动群众把我们批得昏天黑地，我们终于都按这个口径认了罪。可是，我至今不清楚，上面是否有哪位尊神说了话，舒张顾李四个右派的定案结论上都没有提到“小集团”，只是四个单干户而已，这在处理轻重上是不相同的。

“反右”在政治上把二编室一扫而空，业务上不能没有人做，于是二编室的右派绝大部分留在原单位原部门仍然做编辑工作，张老与我都在内。其时，出版社机关从老平房迁入新大楼，一楼两家，人民出版社占东边，人民文学出版社占西边。一天，我上班上楼时与张老相遇，旁边没有别人，张老向我微微一笑道：“无言独上西楼。”此时此地，他还是这样妙语如珠，典切自然。

我们同在二编室一阵，又一同调入新成立的

编译所。1961年我们一同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张老便申请退休，1962年批准退休。所以前面说的1964年11月13日，我们相约小聚，我还在参加轮流劳动，张老却是从家里“策杖飘然至”了。

张老“划右”后工资降了三级，退休还要折扣，本来很窘迫。所幸能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文汇报》等处开辟专栏，笔耕不已，稿酬以港币计，生活略微宽裕了几十年。聂绀弩赠他的诗有云：“悦非香港大公报，看尔悠然能遂初。”是纪实。“悠然”是张老所用笔名之一，双关“遂初”后略微宽裕的生活。

退休还有一个好处，“文革”中他没有与我们在职人员一起进牛棚，下干校，只是被“街道专政”。“专政”具体内容似乎只是扫胡同，作思想汇报，此外无多事，他照样喝老酒，上街看大字报，反正比牛棚干校好得不少。

这些我都不是亲见。重新见面就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曾一同访问刚从山西出狱回北京的聂绀弩，在聂家午饭。聂绀弩“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后来以“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身份获释，每月从派出所领取生活费十八元。那天的饭菜很可口，张老赞美道：“我准备来吃一月十八块的伙食，却吃了一月八十块的。”妙语如珠，仍不减当年。

再以后就是开头说的送他们回南京，直至接到讣告。关于张老的最后形象，其女公子张锦女士有生动描述云：“父亲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是把他热爱的南京城作为归宿的。1990年7月21日，父亲一反终年卧床的衰疲状态，挣扎起床，下地走动。他的失明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但只能听到‘新闻’、‘发稿’、‘出版’等单词，讲不出连贯的句子。实际上他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向世人告别，向他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和文学事业告别。一连三十几个小时精神亢奋，终于在7月23日凌晨，他无憾地长眠于母亲——南京的怀抱之中。”

这同我亲见的满面笑容挥手送我的最后形象完全一致。真好！

（2004年7月17日，在北京碧空楼）

（责任编辑 李晨）



# 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日子

● 燕 凌

1948年12月间,范长江奉命离开新华总社的领导岗位,从西柏坡到了北平附近,参加准备接管北平的军管会的工作。1949年1月31日,他领着从华北人民日报社抽出来的一部分人员,加上华北局城工部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里挑选出来的适合做新闻工作的地下党员、进步青年,从良乡到北平西郊住在程砚秋别墅里一段时间,然后随解放军进城,接管新闻出版机构,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不久,他又奉命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主持创办了新的《解放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回到北京,辅助胡乔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工作。1950年初,中共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社长。

在这里,把他1950—1951年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期间的谈话、批语和示范活动作些记述。

## 以“将军”的姿态指挥“大转变”

当时《人民日报》刚从华北局的报纸改为中央的报纸不久,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做报纸和通讯工作的,还有一些是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党的工作的重点正在从战争向生产建设转移。报社正处于机构、体制、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方法和作风都需要大的变化的时期。范长江像一个身临战场的将军一样,指挥了新闻战线上的这场大转变。做“将军”,这也是他对报社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他历次在报社编委、组长接头会上讲的一些话,鲜明地表达了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新闻战线大转变的期望:

——我们报社的编委、组长都要做“将军”,不要做“侠客”。要会带领队伍,指挥队伍,而不是单枪匹马,跳来跳去。头脑要保持清醒。各组组长每天都要了解自己组里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每个编委都要随时

检查自己领导的组里的工作情况。各组的组长、编辑都要经常外出活动,了解各自分工的方面的新情况。我们解放军的作战命令总是把情况放在最前面。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每个组的人员可以分成两条线,有“在朝”的,有“在野”的。编委和各组正副组长,有领兵出征的,有在中军帐里摇鹅毛扇的。不要都埋在成堆的稿子里,不了解情况,迷失了方向。

——各个组长要清醒地掌握责任范围内的主要问题,抓住不放,突出中心,力争主动,不要只是手头有什么稿子就编发什么稿子。现在我们的接头会上,各组组长不谈本组调查研究的实际工作中的主要情况和问题,只是介绍手头的稿子,枝枝节节,没头没脑。有的同志讲了半天,别人也听不清楚他推荐的稿子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的什么主要动向,有什么背景,为什么要发这些稿件。显然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甚至事前连手头的稿件也没有看,是到了接头会上才看的。凭天地良心,也不能这样啊!

——不要只是到接头会上争地盘。老是说“我们组已经发了许多稿子,好多篇还没有见报,总编室为什么不用?”不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看工作成绩不在于哪个组已经交来了多少篇稿件,而在于有几篇有助于解决实际工作的做法问题和人们思想上的看法问题。发稿的目的只是为了用稿,不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这就放弃了党报工作人员应负的责任。从来稿中发现了实际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正好拿出来在报上讨论或批评,为什么要抹掉,代为隐瞒呢?

——报社的政治神经要灵敏,每个人了解了重要情况和问题,要迅速反映到神经中枢。重要事件的读者反映,要向中央报告。要学会看苗头。“人民园地”组答复一位读者提出的政治性问题说:“这个问题很难解答。”这是不对的。是谁很难解答呢?是中共中央不能

解答吗?把目光限于“本园地”,自封独立国,自然就不能解答。为什么遇到不能解答的问题不向领导同志提出呢?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并不嫌大家提问题太多,而是嫌提出的政治性问题太少了。桌子板凳之类的事情往往拿去请示,政治性问题反而压下来不向上报告请示。高级动物都是由脑子统一指挥的。乌贼那样的低级动物才每一部分都能独立生活。我们报社还正在由低级动物向高级动物演变之中,猴子还没有变成人。

——报社内部的力量要团结中央各部委的写作力量,形成统一的写作队伍。报社的主要力量要以编写主要稿件为中心。训练新闻干部,主要办法是让他们认真地严格地编写稿件。为了编得好写得好,自然就要努力学习理论,自然也就非找群众商量不可,非了解实际情况不可。这样,思想水平和知识、能力就积累得越来越高。

——报社也要开展创新纪录活动。总编室要抓这件事,交流各组的新经验、新办法,评比各组的好稿件、好作风。有表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报上提倡的,我们自己要不要照着办?譬如民主管理的经验,我们宣传了,自己是怎样做的?是不是“胡文虎的头痛粉”,自己也不相信管用不管用?据说,有一次胡文虎头痛得不行的时候说:儿呀,你把咱那头痛粉拿来我吃,看到底顶用不顶用……

## 高标准,严要求

长江对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提出高标准、严格的要求。在他主持下,对处理来稿来信规定了一套比较细致而合理的制度:每天的来信来稿,由通讯联络组(读者来信组)统一接收,按内容分发给各专业组。各组人员轮流先由一人大略浏览一下,按照组内相对固定的分工,把稿件信件分给编辑人员。大家看过以后,向组长汇报。汇报中提出了重要的问题,组长可以让大家一同讨论如何处理,必要时组长可以把涉及重要问题的稿件信件再拿来仔细阅读。较长的稿件在送给组长复读之前,由编辑写出提要,组长看了提要就便于决定处理的先后次序,提出处理意见。分工相对固定,而不太死板。一定时期要把主要力量用在一个主要方面。要根据中央的要求和自己从群众中了解的实际情况,每周每月检查报上发表的稿件,看什么情况和问题应该在报上反映而没有反映。据此,从来稿来信中寻找线索,约请通讯员或记者采写,或组内派人到群众中去访问、写

稿。对读者和通讯员的来稿来信如何答复?长江说:不能“打太极拳”,虚晃一下应付过去。人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反映了许多情况,你没有认真回答和回应,把人家的热心和精神劳动,在客客气气的“您”字里湮没了。

对于各方面的来稿,长江都要求及时认真处理。1950年5月间,报社农村组收到在政法委员会工作的民主人士叶笃义的一篇稿件,是写到灾区去的考察团的活动和灾民生产自救情况的,负责处理这篇稿件的同志不但不重视来稿,而且轻视民主人士,没有细看就压下来,忘在一边了。作者打电话催问,他还很不耐烦。后来,打算把叶先生的文章退回了事。政法委员会新闻秘书室来信询问:为什么发表了记者写的同一主题的通讯,而不用叶先生写实的文章?他更加反感,说:“政法委干涉我们的内政,发哪一篇稿子他们还管得着?”拖来拖去,这篇文章过了十多天才发表出来。

长江发现此事,当即追查。这位同志作了书面检讨,认为自己在编辑岗位上不称职,“恳请领导上考虑我的工作问题,置于一个适可而止的岗位”。6月10日,长江在他的书面检讨上加批:“你为什么不上级报告?你是哪一个独立国的国王?”在说到“干涉我们的内政”的地方又批了一句:“你这个独立国是不能动的?!”另外还写了一个总的批语:“×××同志的检讨,深值他自己和本社全体党员同志警惕。他在这次事件中犯了两大错误:一、严重地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非党人士采取极端错误的轻视的态度,对他们的文章和意见可以任意置之不理,这是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和党中央一再号召加强与非党群众联系的指示毫无共同之点。这种政治上的盲目自大,大大地妨害了我们与非党群众的联系。二、他的第二个大错误是惊人的无组织无纪律。他把自己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独立王国,他不把自己作为党报的一个工作人员、党的一个成员,而是以专断独行任性胡为的态度来处理政治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对于政法委员会也极不尊重。这是本报在今年一月间已提出来加以反对的倾向之一,即是独立分散的倾向。×××同志在这一方面还没有什么进步。”批评是严厉的,而提出的组织处理意见则是宽容并且饱含深情和期望的:“他犯这样大错误的原因,主要由于不肯学习,满足于自己这一段革命历史,因而对政治问题采取马虎潦草的态度。这种错误的态度,应当痛下决心,加以改正。只要决心改正错误,不必加以处分;亦不调动工作,即在原工作岗位上加以锻

炼。”

有一次，为了一篇稿子里的问题，他要经手的编辑打电话向作者问清楚。编辑说不知道作者的电话号码。他惊奇地说：做新闻工作，怎么对这样的事情能说“不知道”呢？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为什么不问清楚呢？他认为，“我不知道”这种话，根本不应该从编辑者口中说出来。

有一段时间，编辑部强调学习苏联《真理报》，有些编辑机械照搬，把它的缺

点也当成优点，把自己的优点反而丢掉了。《真理报》的版面上总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很呆板；标题也只是简单地一句半句，不像中国传统的报纸标题讲究引题、主题、副题。《人民日报》有个时期也弄成了这个样子。长江对这很不满意，生气地说：“这不是学苏联，是学懒联。”

那时候，报上发表的消息老是迟到。长江对这状况难以容忍。他对大家说：新闻报道放“马后炮”，是从农村带来的毛病。展览会要结束了才报道，谁还看？挖“三海”（北京北海中南海清淤）的新闻稿，说是要等到挖完了以后才发表；挖完了，说要等写好评论一起见报，又压下来。这是做新闻工作吗？这是很要不得的做法。各组要和派到各地的记者密切联系，随时搞清全国各地有关本组任务的情况，组织好自己的力量，并且和新华社各组结合起来，清醒而又及时地报道各地的动向。8月1日全国通航，什么地方发生了有重要的事情，可以乘飞机去。要及时抓住全国多数人所关心的最当紧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报道、评论。不要让人们冷盘吃饱了才把许多肥肉堆上。即使肉是肥美的，过了时机也就没有人愿意吃了。

他谆谆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人民日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报社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兢兢业业，不能“大致差不多”就算了。稻奋办报刊多么周到精



解放初期，毛泽东和范长江在一起

细，一点不含糊，数十年如一日。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候还受到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不要因为领导同志多指出些缺点就觉得冤枉了，这工作干起来也太辛苦了，不干了。共产党员怎么能退坡呢，要前进啊，要快些提高自己啊！《人民日报》现在居于全国的舆论领导地位，而我们还没有领导舆论的本领。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新闻、通讯、评论，《人民日报》一登，全国所宗。不可不极度慎重。我们报上把合作社工作会议消息放在第二版角落里了，黑龙江合作社干部给在北京开会的人写信就说：大概中央不重视这个会。司法工作会议在报上登的地位太小了，与会的人们大闹情绪，会也开不下去了。上海《解放日报》夜班编辑处理新闻中间发生争论，就有人说，看《人民日报》是怎样处理的……

## 把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的防线

长江要求党报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都把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一道防线，坚决守住，不让任何错误从自己这里通过。

1951年7月间，一位记者采写了一篇关于全国供



销合作事业发展情况的稿件,经过合作事业局一位工作人员修改补充以后,这位记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再看一遍就交给发稿的同志了。长江很重视这篇稿子,是要同关于合作事业的社论一起发表的。他仔细看过之后,发现几个问题。他把这位记者叫来询问,得到的是似是而非的答复。长江要他再认真核实。他再向合作事业局查询以后,才弄清楚。长江对这位记者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恳切的教导。这位记者作了认真的检讨。主要反省自己缺乏政治责任心,没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依赖被采访的单位审稿,依赖报社领导同志把关;而且用“可能是”“或者是”“恐怕是”“大概是”来应付领导同志的询问,掩盖自己的错误。他认识到以这样的思想作风做党报记者的危险性,决心彻底清算这种思想和作风。

长江在这位记者的书面检讨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同志这个检讨甚好。必须严肃认真地工作,才能有真正的进步。他在所写合作社新闻中,把几个重要事实弄错了,反而含糊其词地答复我的询问,如果我马虎过去,就太危险了。这种马虎了事、不负责任的作风,在我们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同志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很严重的。这是一种党性不强的表现,必须坚决加以克服。”他把这位同志的检讨交给报社党的总支,建议总支印发各个小组,希望各组结合本组实际情况,在开小组会的时候加以检查。

要求每个党报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岗位当作最后一道防线,长江的这种指导思想,来自他自己的实践。他谈过他的一次永志不忘的经历:1948年5月间,中共中央重新公布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两个文件的时候,他作为新华总社的负责人之一,仔细地校阅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可是,新华总社电台把这两个文件发到各地以后,有些地方党报登出来的却出现了一些差错。周恩来同志看到出错的报纸以后,就把长江叫去,严肃地批评了他。他当时觉得委屈,说明自己是尽了责的,问题发生在电台发稿过程中遇到了外来电波干扰,有些分社收报台没有收清楚。恩来同志听他说过以后,并没有放松追究责任,而是仍然严肃地指出:这两个文件是要解放区各地照办的,报上登的文件出了差错,对党的工作就要造成损失。你是新华总社负责人,有掌握电台的权力,也有对电台工作随时检查的责任。为什么不向各地分社打招呼,要他们在电台收听不清楚的时候来电查问?也应该通知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就向总社提

出要求再发一遍嘛!长江说:经过恩来同志教导,我思想通了,当即作了检讨。——他现在要把恩来同志的教导,把这种将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防线的高度负责的精神,言传身教地传递给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各级干部,希望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 不能只做喉舌,还要当好耳目

1950年底,《人民日报》发行到11万份;到了1951年9月,增加到将近30万份。《人民日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在提高。长江说,这主要是因为报纸上有了“声音”,而且“声音”渐渐响亮起来。报上的言论的确能够而且已经对各地的工作起了指导作用,许多地方的干部把《人民日报》的言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有些地方党委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或短评,不再等待上级指示就开始照着布置工作。《人民日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和批判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里的各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指导性加强了。可是,长江提醒大家注意,《人民日报》的思想水平与报社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是有区别的。

1951年7月中旬到9月中旬,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报社工作人员学习这次会议的文件以后,长江作了学习总结报告。他着重告诫大家:报纸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报社工作人员水平相应地提高了。报上发表的东西,特别是言论,不全是我们自己写的。作为中共中央的发言机关,报社人员现有水平是不相称的,与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相差很远的。我们报社的干部应当能征善战,像五虎将、一百零八将那样,人人都有几手熟练的本领。但是我们这里像大刀关胜之类的猛将还不多。

怎样提高战斗力呢?他反复强调两条:一是提高思想性,二是加强群众性。提高思想性,先要彻底了解党报工作首先是思想工作,党报工作人员如果不把精力集中在提高思想性上,就不会有进步。加强群众性,先要明确地认识群众工作是党报工作力量的源泉,而且联系作者积极分子队伍是为了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进行思想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无目的地联系。我们不是从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作斗争中选择和培养作者积极分子,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编辑部是思想斗争的一个司令部,因此在群众工作中老是处于被动应付状态。他说:新闻工作中的单纯技术观点必然走向形式主义,那是死路一条。发展通讯员,应当是为

了进行思想斗争而培养作者积极分子，同他们交流思想，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而不是缺稿的时候才向他们约稿，更不是填写了通讯员登记表就完事。

他传达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的报纸要办成真正的全国性的报纸，就要大量地团结人，吸收大量的作者为报纸写稿。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机关中，有单独写稿的，有集体写稿的，都要联系。对非党员的作者也要注意联系，党外关心国家建设事业和党的政策、干部作风而又会写好文章的人多得很。报上要反映各个方面的声音和动向，局面才能打开。

他常讲《人民日报》要起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既要作中央的喉舌，也要作中央的耳目。来稿来信中反映了重要情况而报上不适宜发表或为版面所限未能发表的，他都很重视，要求大家千万不要都装到麻袋里当作废纸处理掉，而要分门别类或全文或摘要定期编印成小册子，供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部门的有关人员参考。特别重要的紧急的要尽快单独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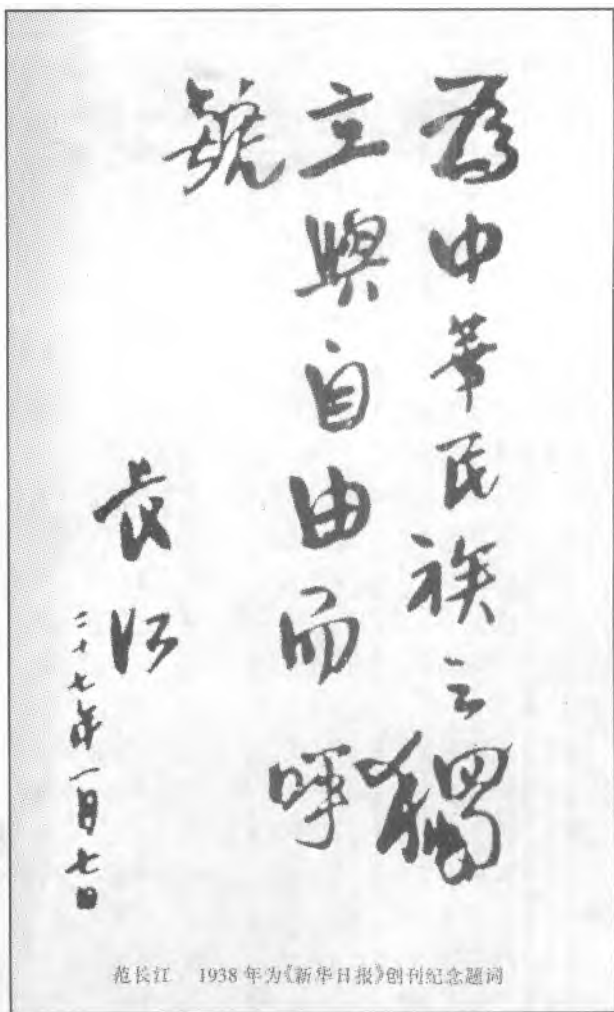
批评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发表后，编辑部收到大批来稿来信。我作为编委会政治秘书，他要我把来稿来信情况给党中央写个专题报告。我知道这篇社论来自最高领导人，就选出拥护社论的反映，摘写成一篇报告稿。他看了之后，皱眉苦笑摇头，对我说：给中央反映群众意见，不能这样；要把不同意见反映上去，对中央决策才更有用处。——实际上，他自己对批判《武训传》是有不同看法的，至少是认为批判《武训传》有些过火，希望中央即使不刹车也要有所控制，降低调子。他认为只有认真地，如实地反映社会上种种不同的声音，才是真正自觉地忠实地做中央的助手，做中央的耳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诺诺”有害，“谔谔”有益。

### 在思想斗争中联系作者积极分子

长江主持的在实际斗争中提高思想性、加强群众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是以“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后来订正为“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为主题，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开展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宣传和讨论。建国伊始，刚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恢复和新兴的大大小的基本建设工程渐渐多了起来，而许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不尊重科学，不愿受

基建程序和规范的约束，随心所欲，急于求成，总想简单从事。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东北第三造纸厂盲目施工造成损失的报道，并且为此发表了社论。6月20日，发表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检查基本建设工程设计的通知。此后，全国各大行政区各大城市纷纷来稿，以往从来没有和报纸联系的许多人也寄来了稿子。报社收到反对必须先有设计然后才能施工的来信，长江决定发表，发动人们在报上公开讨论。

报社的工作人员也体会到：“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的宣传和讨论，实质上是愚昧与专断的意识和科学与民主的意识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而且，不组织广大的积极参与报纸上的讨论的“社会活动家”队伍，就不能在报纸上有效地进行思想斗争。而这些“社会活动家”，又大都是在这场反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涌现的。如重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崔中，从《人民日报》一开始进行关于基本建设的宣传和讨论，就自动报名参加这场思想斗争，始终不懈。有些人自愿地积极



范长江手迹

地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参与思想斗争。石家庄糖厂厂长陈光宇,写了本厂建设失败的检讨,要求在报上发表。北京建筑工程师戴念慈等送来文章,分析自己的雇佣观点对基本建设的危害。这些内行人的话,更利于解决思想问题。在长江主持的公开进行的这场思想斗争中,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认识到:组织社会活动家在报纸上进行群众性的讨论,对改进实际工作有头等重大作用。

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印发给全国各地通讯员一封信,号召他们提供反映基本建设中的问题的材料。太原钢铁厂通讯员王贵英(全国劳动模范)积极响应,8月26日给报社寄来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钢铁厂基本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同时提到生产管理、工人福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反映了工人群众的呼声。他为了写这封信,向很多人作了调查,还爬到高高的烟囱上检查了工程质量,极其认真负责。这封信寄到报社以后,两个有关的组都未能正确处理,毫无结果。这年11月间,当中央正在制订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时候,长江到山西农村调查采访(写了《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太原停留期间,特意抽查了工厂通讯员的状况。他从报社工业组要去的名单中,注意到了王贵英,同他交谈,得知他曾经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反映过重要情况,没有下文。长江当即打电话到编辑部,从北京调去王的来信;并且向王要来编辑部读者来信组给他的信。仔细地阅读和分析了这些信件之后,发现其中有很大问题。王贵英信上反映的确实是很重要的情况,报社经手的前后有六个人,可是谁也没有把信的内容弄清楚。给王回信要王“补充具体事实”,其实原信已经写了具体事实。说王的信与已经发表的另一读者来信“重复”,其实王的信提出了更多更重要的问题,并不重复。王认为报社不相信他,就不再给报社写信了。没有重视和发表王的来信的根本原因是经手的人群观点不强,对自己本应经常联系的社会活动家式的通讯员茫然无知,而且缺乏应有的实际知识,看不出来信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

长江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王的来信反映的问题经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基本建设检查组查处,已经基本上解决,那封来信当然不再需要发表了。12月4日晚上,长江同王贵英和太原钢铁厂负责干部一起座谈如何增产节约,其间王又提出厂内公共厕所年久失修无法使用,全厂工人对这十分不满,这个意见提了两年也没有解决。长江当即与王和这个厂的工会主席一起到几个厕所查看,看到这些厕所确实又破又脏,难以进

入。而厂领导人总推说“计划未定”、“没有钱”,其实是没有关心工人生活的观念,从中作祟的是根深蒂固的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王贵英和工会的同志都认为,必须拿到报上公开批评,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长江就派自己的助手跟王一起到厂内所有厕所实地调查,并且访问了各车间的老工人、工会干部以及一些管理人员。由于王贵英对本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他同工人的广泛联系,调查所得材料具体、全面,文章写得生动、实在。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不但在太原钢铁厂引起轰动,而且受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和中共太原市委的重视。文章见报当天,太原钢铁厂负责人就接到重工业部和市委限期解决厕所问题的电话。原先两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星期就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从此厂里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加强了,厂长还在全厂积极分子大会上表扬了王贵英。

在太原,长江还召集山西省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大都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报和省里各单位的作者积极分子)开座谈会,商定了特约记者组织起来加强联系、定期讨论写稿问题(主旨、题目、分工等等)的办法,并且同他们一起讨论了当地的工作情况、领导和群众的要求,以及近期的写稿计划。他随时随地都以党报负责人的责任感和新闻工作者对新事物的敏感,在实际工作和群众生活中抓选题,组织写作力量。平时在北京,他经常直接联系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研究人员、写作队伍,力求熟悉自己还不熟悉而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的经济建设工作,从里面抓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组织报道和评论。

他是热爱新闻工作的,殚精竭虑想把《人民日报》办成更加符合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要求的报纸。在他到山西去之前,还起草了《加强思想工作改进报纸工作的中心环节》,里面寄托着他对《人民日报》的同志们的深情和期望。

就在1951年12月,他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三反运动”开始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文物单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之一,1952年1月,中央指派他去领导这方面的“三反五反”。在报社的“三反运动”中,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运动”中难以避免的“左”的倾向,他受到了过火的批评,例如“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等。内部矛盾一时难以缓解,他奉调离开报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新闻工作岗位。

(责任编辑 李晨)



#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 李 平 文并图

今年是刘少奇同志在“文革”中蒙冤辞世35周年。在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们仍然怀念刘少奇同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建树的功绩。我也回忆起24年前,参加到河南省郑州市迎取刘少奇同志骨灰工作的一些情节。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20多年来从未公开发表,现在公诸于众,作为对少奇同志逝世35周年的纪念。

1980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重要议程之一是为“文革”最大冤案的刘少奇主席平反昭雪,撤销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所有罪名以及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还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邓小平同志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非常好,而且一次比一次好,真正作到了畅所欲言。这次全会恢复设立书记处,当选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认为,五中全会内容不比三中全会少,在国内外反应很大很强烈,其意义不低于前两次全会。

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中央最初决定在4月15日举行追悼会,并成立治丧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后因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前往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的葬礼,而将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推迟到4月17日举行。

刘少奇同志从1969年10月17日晚7时许,于病中被用伊尔—14型3284号专机运离北京,

晚9时30分左右到达河南省开封市关押,至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含恨因病辞世,距离开北京仅27天。11月13日夜12时,刘少奇的遗体在开封市火葬场火化。

据护送刘少奇前往开封并最终在开封火葬场观察遗体火化情况的刘少奇主席原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的记述,刘少奇于1969年10月17日晚19时23分被用担架抬离中南海福祿居,从北京西郊机场用飞机空运到河南,晚21点30分在开封机场降落,即被送入监护地点。李太和一行于11月8日奉专案组之命全部撤回北京。刚回北京不久,李太和即于11月12日夜得知刘少奇已去世的噩耗,又于11月13日凌晨赶往开封。李太和亲手为刘少奇的遗体剪去乱发和胡须,并为遗体穿好衣服和鞋子,于当夜送至开封火葬场火化。当时为了保密,选定在夜间火化,并且谎称被火化的遗体是一名“烈性传染病患者”,火葬



见到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王光美潸然泪下

场由军人予以警戒和封锁,只留下了两名火化工人。火化手续由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理,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写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火化后,刘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骨灰盒里,由北京来的人交费后寄放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后被长期搁置在骨灰陈列室第124号框格里。

造成十年内乱的“文革”结束后,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很快,中央组织部首先对王光美同志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同年6月,王光美同志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年11月,联合复查组经过核查,证明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有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到河南,调查了解刘少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兼河南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组长的赵文甫,在1979年3月5日,派人秘密前往开封,取回了刘少奇的骨灰盒。为防止意外,他把骨灰盒暂时存放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皮保险柜里,并只让少数几位省委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

追悼会前,需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迎回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并批准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刘少奇同志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的请示报告》,知会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理。治丧委员会决定由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及子女前往郑州迎取骨灰。但当时中央决定,迎送骨灰的活动不在中央媒体上做公开报道,北京组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人员随迎取骨灰的专机到郑州,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料,将镜头拍足。河南省的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可对有关活动作地方新闻予以报道。由于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和第二书记胡立教都有事不在省内,所以在河南的活动,只有省委第三书记兼省长刘杰和省委书记戴苏理、乔明甫、赵文甫等参加。河南省委对此事极为重视,几次开会研究,确定由赵文甫书记具体负责。

1980年5月13日上午,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及子女乘三叉戟专机飞抵郑州,下榻于郑州市的中州宾馆。他们一行进入宾馆,即被人们认出,住宿在中州宾馆的一些外国宾客,也纷纷索要白花,希望能参加悼念活动。

当天下午,王光美等由赵文甫书记和河南省副省长史毅陪同前往开封。他们首先到开封市火葬场,在那里翻阅了当年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

登记簿,王光美同志与当时参加火化的两名工人作了简短的交谈,询问了有关情况。然后即到刘少奇被关押的地方参观。

刘少奇同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原开封市政府院内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这里解放前是开封银行及其金库,所以修得非常坚固,院落也不大。由于墙高房固,院落封闭,且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进出,符合易于保密的要求,因此选定在此,把少奇同志关押在一楼的一间斗室。这是一



在郑州人民会堂举行刘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



个套房的里间,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屋中央摆放一个单人木床,惟一可透光亮的窗户竖着铁栅,窗前有一张旧木桌,两把椅子,此外别无他物,少奇同志在此只住了27天就溘然辞世。少奇同志死后,为等北京的指示和来人,其遗体被放在一具帆布担架上,停放在同院原金库的小房中达两天一夜,然后才在13日夜



郑州人民夹道恭送刘少奇同志骨灰

间火化。在那间空空如也、屋长不及身长的类似过道的小金库中,当时只好斜着摆放那具担架。

关押少奇同志的房间按当时原物原样陈设,王光美同志及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等人进入小屋,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少奇同志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睹物思人,再也控制不住心情的激荡而潸然泪下。刘平平、刘亭亭扑倒在床上,抱着少奇同志病逝时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闻者观者,无不为之心酸泪下。王光美同志强自抑制心中的悲愤,大声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关押少奇同志的院落应该有着太过沉重的记忆,因为不仅刘少奇同志在此蒙冤辞世,以后,就在这个小院的二层楼,还关押过以“战备疏散”名义转送到开封的徐向前元帅。王光美同志一行离开时,很多开封市民风闻消息,汇聚拢来,形成了自发的夹道迎送,他们向着车内的王光美同志热情地鼓掌,表达发自内心的深切慰问。

5月14日上午,在郑州人民会堂第一休息室更换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乔明甫、赵文甫两位书记将新旧两个骨灰盒送到休息室。旧的骨灰盒个小且普通,盒上没有照片,放照片处嵌着写有“刘卫黄”三字的纸签。盒内的骨灰袋为红色

绸质,袋上还印有“移风易俗”四个字。新的骨灰盒大一些,做工相当精致,正面居中镶嵌着少奇同志的半身标准像,准备好的新骨灰袋是洁白的缎子所制。

8时30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王首道、刘澜涛及河南省委书记刘杰、戴苏理、乔明甫、赵文甫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和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步入休息室,在屋子中央白布铺围的长台前肃立默哀。然后,刘杰同志打开旧骨灰盒,取出骨灰袋交给王光美同志。她沉痛地抱着骨灰袋,长时间地将脸偎依在骨灰袋上,又一次流下心酸的泪水,静谧的房间内,随之响起一片啜泣声。接着,刘杰同志把套上新袋子的骨灰袋放入新骨灰盒,刘源把骨灰盒盖好。在肃穆凝重的气氛中,刘杰同志将骨灰盒捧入骨灰迎送仪式的会场。换盒后,旧的骨灰盒亦带回北京,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午后1时30分,正式的骨灰迎送仪式在郑州人民会堂举行。礼堂内悬挂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舞台正中悬挂着刘少奇同志的遗像;遗像下是党旗覆盖的骨灰盒;骨灰盒前摆放着一个花圈,花圈洁白的缎带(下转51页)



# 忆在延安的生活

● 郑校先

弹指一挥间,六十年故去。抚今追昔,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涯,不时让我陷入沉思,延安生活历历在目。延安,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 一、奔向延安

我出身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从7岁到13岁读私塾,13岁开始上学堂,16岁高小毕业后,考入泰安育英中学,那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我们班的班主任、国文老师夏振秋先生经常找我谈心,向我讲解抗日救亡的问题,讲“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把东北三省拱手送给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妥协投降政策。我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做法非常愤慨。夏老师根据我的思想动态和对形势的认识,对我说:“你想打日本,可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要和日本妥协,他们要大力围剿共产党和红军,而共产党和红军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我说:“日本如果占领了山东或者全中国,咱们只能当亡国奴,给它做事就得当汉奸。我是坚决不当汉奸的,谁打日本我跟随。”于是夏老师就介绍我参加“时事研究会”。他对我说:“咱们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抗日救国形势的组织,你愿意参加吗?”我说:“愿意!我听老师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吗?”我问他,夏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

1937年我弃学参军,参加了山东省第六区(聊城)抗日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以后在延安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抗日不当亡国奴”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使我从一名爱国青年学生一步步走到革命队伍中来。

1938年8月,为策应武汉保卫战,中共鲁西北特委和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将军团结合作,集中近两万兵力,袭击济南和破坏日寇的铁路、公

路,同时多处打击敌人的小据点,牵制日军进攻武汉的部队。我们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来到前线参加战斗。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打硬仗,但我们把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化作了无畏的勇气,英勇地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包括大队长在内共23名同志,至今想起他们来,不禁热泪盈眶,怀念不已。

这次战斗后不久,中共鲁西北特委选送我和白驹驹、席一、周衡、左江、贺立德等六名同志到延安抗大学习。我们先到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南宫等待。在这里,我们会同从河北、山东选调来的300多名干部,编成三个队,由一个营的兵力护送我们去延安。我们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跨过平汉铁路,穿越阎锡山的防区,来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徒步跋涉2000多里,我们终于胜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 二、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

到延安后,我们从冀南抗日根据地来的300名同志被编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何长工任大队长。

入抗大学习时间不长,因为敌机就要轰炸延安,驻延安城内的各机关单位有计划地进行了疏散。抗大有些大队也撤出延安城。我们五大队迁到了甘肃省庆阳县。罗瑞卿副校长针对我们这个大队说:“同学们辛苦啦,你们从华北到了延安,又从延安到了庆阳,敌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在庆阳,我们将学校设在一座文庙里。到了12月初,中央决定将五大队调回延安。当我们大队走到离延安90里的甘泉县城时,接到了新的命令:五大队前往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

部所在地,成立抗大第一分校,何长工同志任校长。我和另外几个同志调回延安,编到抗大总校第三大队继续学习,住在清凉山山腰的窑洞里。

我在抗大被分在军事队里,听讲军事方面的课程较多一些。学习内容主要是抗日战争中需要的战略战术以及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游击战和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军校生活紧张而有秩序,严肃又很活泼,集会时学员队之间互相挑战唱歌,每个队都有啦啦队,情绪激昂,高潮迭起。学员们精神生活丰富,心情很愉快,与队里的干部、教员、职工之间关系都非常融洽。对待学习都非常认真,争取多学些本领,待毕业后到前方部队工作时用得上,对抗日战争多做贡献。

1939年我在清凉山三大队时,我们组里有位华侨同学叫庄林苏,30来岁,是来自马来亚的中学教员,文化程度较高,和全组同学都相处得很好。有一次他为丢了一件东西写了一首诗给我看,至今我还记得其中几句:“东西放在洞中,不翼而飞,君子来自梁上,有获而去。”后来队上知道后,给他找回了失物。该同学没有学完第五期,根据他的能力水平和海外的许多关系,我估计他的离校是另有重用了!抗大不仅在国内受到普遍赞赏,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国外也有很高的声誉。抗大创立初期,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许多国际友人都曾到过延安抗大参观访问。有些国际友人参观访问后就自愿留在延安参加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马海德是美国人,到延安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门诊部当医生,曾给我治过病。他在延安和一位中国文艺界的女同志结了婚,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马海德也去看病,他时任国家卫生部顾问。我跟他说:“四十年前在延安你还给我看过病哪!”他马上问我:“看好没有?”我说:“看好啦,那时我才20多岁,并无大病。”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对人很热情。

罗瑞卿副校长在一次讲话中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说明了抗大的顽强生命力。大多数学员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就是1938年12月在抗大入党的。

### 三、在八路军的最高学府学习

1939年底我入军政学院学习。军政学院在当时被称为八路军的最高学府。课程安排,除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常来讲话作报告

外,还专门安排谭政、王若飞、和培元、郭化若、王学文、张如心等同志兼课,这些同志在党内都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如王若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培元是毛主席的秘书之一,王学文是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郭化若是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中抽出较多的时间来给我们讲课。王若飞同志讲历史课,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和培元同志讲哲学;郭化若同志讲战略战术;王学文同志讲政治经济学。

学院驻地叫大便沟,周围是山,山顶有块平地。我们自己动手在这块平地上盖了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小礼堂。我们多数时间在这个小礼堂里上课,也到宝塔山或八路军大礼堂去上课。学员和干部都住窑洞。除集中上课外,其它时间主要就是阅读学院发的教材,自学时间较多。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书,很难读懂,要逐字逐句很费力地去研读、去理解,每小时只能读5页左右,等于是硬啃下来的。学校还安排读书讨论会,会上大家都要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体会,交流学习方法和见解,相互帮助。全院共有三个学员队,我在一队。我在军政学院两年多,是学员一队的课代表,要经常收集综合学员在学



彭校先(1944年)

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可以直接去找老师汇报和请教。老师每次来上课时都先问一下上次讲过的课还有哪些地方不懂,就由我简要地汇报一下。老师一般都是坐着讲课,学员有时坐小凳,有时就站着听,用一块木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当课桌,木板上放着笔记本,边听边记录。

## 四、感受伟人风采

当时的延安,不论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还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是穿普通的灰军服,外表和普通的干部群众没有什么两样。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都身体力行,参加挖地、种菜、拾粪、纺纱等生产劳动,周恩来副主席还被评为纺纱能手。

我在抗大时,校部设在延安清凉山下。毛主席经常到抗大讲话、作报告。每当毛主席骑着白马的身影一出现,即受到全体学员的热烈鼓掌欢迎,有的还将自己的帽子抛到空中欢呼。报告会会场布置非常简陋,会场中间放一张旧木桌和一条长凳,桌上放把装满白开水的茶壶和一只大碗;各大队都按划分的位置围坐在桌子四周,各队下设十几个组,组长坐在组的最前面,离毛主席也就二三米远。在主席讲话时,有时是队领导安排,有时是自动的,由坐在前面的学员给毛主席提壶倒水,我也倒过。因为我们都年轻,毛主席不认识我们,但在倒水时都向我们点头示意。毛主席讲话一般都是站着讲,没有讲稿。但每次讲话都有个中心内容,条理清晰,讲起来非常生动幽默。有一次毛主席讲到延安物质条件比较差,又有敌人和反动派包围限制封锁时,说了一句:“你们坐着地球听讲课,也是了不起的呀。”引起全体学员哈哈大笑,热烈鼓掌。1939年4月抗大总校第三大队与第一大队换防,毛主席特地前来为第三大队送行,他对大家说:同志们要离开延安了,要求我来讲话,我不讲别的,瓦窑堡有狗,送你们一个礼物——一条打狗棒,这条打狗棒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讲话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学员们非常爱听。毛主席讲话每次两个小时左右,一般不超过三小时。有时校领导请主席中间休息一下,这时不少学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或纸片,走到主席跟前,举手敬礼后,请毛主席题字。主席从不拒绝,提笔就写,如“坚持抗战到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等等。毛主席的题字一般送到队上统一保管,也有的由自己保留。不管由谁留存,只要请到毛主席写了

字,就都高兴地认为这是自己的终身光荣。毛主席来讲话,有时带秘书,但多数时间不带,由学校安排专人作记录。记录稿经过整理送中央或毛主席亲自审检修改后,有的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有的编印成书,下发延安各单位和前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学习。如《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书都是由毛主席的讲话整理而成的。1942年春,我们军政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要求毛主席来讲话。因主席工作太忙,不便从枣园骑马来学院。学校就组织我们到枣园毛主席的住处,听毛主席给我们毕业学员讲话,作指示。我们的心愿达到了,都非常高兴。我在延安近四年,听毛主席讲话作报告有很多次,由于听得次数多了,我能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在军政学院开娱乐会时,同学们都自报节目,我表演的节目是模仿毛主席的口音讲几句话,这个小节目竟很受欢迎。

朱德总司令也经常给我们上课或作报告,他就像一名普通的老军人,非常平易近人。他还经常到学校来与大家一起打篮球,尽管技术不高,却非常喜欢和我们一起打。能与总司令一起打篮球,我们也都非常高兴。1940年我们军政学院成立了篮球队,起初起名为“朱德篮球队”,但是在和兄弟学校、单位的几次比赛中,总是输得多赢得少,我们自觉脸上无光,就主动取消了这个名字,改为“军政学院篮球队”。当时在延安还流传着一个总司令“借钱不能还”的故事:那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艰苦,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干部,没有工资,只发津贴。我在抗大时每月只发一元钱津贴,到军政学院后也只发三元钱。当时营级干部是三元五角,团级干部是四元,旅级以上干部直到总司令每月也只有五元钱。总司令老家出现灾荒,生母、养母都已80多岁,在家中无饭吃,急需用钱度过难关。家乡亲人找到总司令。总司令虽然号令全军几十万人马,但是却拿不出钱来救济老母,无奈只好给原在北伐军中的好友写信,募借到200元钱,并告诉好友,自己虽在八路军中任总司令,却还不起那200元钱,因为“十数年实无一钱,将来亦是如此”。所以就只有借没有还了。

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常给抗大讲话作报告,如周恩来副主席、董必武、徐特立、陈云等同志。周恩来当时是我党我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总代表,常住重庆,有时回延安开会或汇报工作。每当听说周副主席回来,校领导就请他来给我们作报告。周副主席讲的内容多是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的关系以及他领导的同志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如何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



式方法，举出例子说明我方怎样坚持党的原则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的斗争等等。有一次，恩来同志一气讲了近四个小时，我们既忙着听，又忙着记录。他的报告对我们了解国内外形势帮助很大。

## 五、我的三位老师

在延安近四年的学习中，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很多，给我们讲课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王若飞、和培元、王学文三位老师。

王若飞是位老革命家，是我们的老长辈。他对人和善，讲课话语快慢适度，条理清晰，逢到重点处就讲得格外详细，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每次来讲课都先问一问对上一次讲的内容有什么疑问，我就简单汇报一下。每次讲课前大家都要求他给我们先讲些抗战的形势。他总是微笑着接受我们的要求，先讲十几分钟国内外的形势，然后再开始讲课。1946年王若飞同志因飞机失事牺牲，我们知道后非常难过，很怀念他。1949年绥远省在“九一九起义”后获得和平解放，当时我任包头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1950年镇反时公安局的同志抓到一名特务。经调查，1931年10月21日王若飞同志在包头市“泰安客栈”就是被这名特务带队抓捕的。我和市长郑天翔同志商量后令市法院迅速审判，依法判处该犯死刑。在尚未行刑前，我给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同志写了信，将此情况告诉她，并将判决书寄给她一份，

征求她的意见。培之同志很快回了信，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1992年我到北京，王若飞的儿子王兴到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看望我。他告诉我，他母亲已病重在床，她把我们给她写的信和判决书放在她使用几十年的箱子的底层，一直珍藏着。

和培元老师给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受学员欢迎。和老师原是

保定市高中语文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到延安后给毛主席当秘书。他来上课也是每次讲三个小时，共讲过70多课次，讲课地点多数在军政学院礼堂，有时在宝塔山上讲。他的哲学课讲得很有系统，讲课列有大纲，每节课有一个中心内容，有理有据，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我们听得明白，理解深刻。和老师讲哲学时，经常举例子说明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比如他说：“学游泳，你在岸上明白游泳的道理，两只手、腿、脚知道怎样去蹬水、划水，但是到了水里，还是得喝上几口水才能学会。”还有使我受益终身、印象最深的是，他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纳成五句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

和培元老师逝世于1941年夏天，在他结婚的第三天到延河游泳时被淹死了。两天后，《解放日报》登载：“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同志被淹身亡。”我们才知道敬爱的和老师离开了我们。他当时只有30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我们都非常难过。一位青年哲学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王学文老师是位学者，给我们讲课也是每次三个小时，讲课达70多课次。他讲政治经济学，讲得很深刻，我们需要经常讨论后才能理解，课后还要再精读马恩原著帮助消化。政治经济学在当时比较难懂，王学文老师为此花费了很大精力，他能针对学员的不同程度，做深入浅出的讲解。



## 六、艰苦与快乐的交织

延安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每个人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自由、幸福。在延安生活虽然有苦有累，但一想起这苦和累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反而感觉吃这些苦受这些累是光荣的，是革命过程中应该的，是对我们革命的精神、勇气和胆量的考验。苦累在身上，甜乐在心里，艰苦中有希望，劳累而舒心。我在抗大劳动时有几次下起了大雨，汗水、泥水，再加上从天而降的雨水，将浑身湿透。我们都不以为苦，却感到特别的高兴和畅快，有的学员反而从山上往山下滚几圈，故意把身上弄满泥巴，再任凭大雨冲浇，享受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在延安我们也加强对身体的锻炼，除去天气寒冷时、下暴雨时，我和一些同志经常到延河中去游泳。延河从宝塔山脚南下，被顶着转弯向东流去，到延长县境内就入了黄河，有些河段，如清凉山西面山下，解放日报社下面那一段，因转弯处地势不明，河水也较深，一般不过去游。当时延安社会风气很纯洁，天热时到延河中游泳的多了，男女会自动分开河段。

我在生产劳动中也是个积极分子，那时还是个青年小伙子，干起活来浑身是劲，不怕苦不怕累，手脚经常磨破受伤，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干下去。有次被锄头碰伤了左嘴角，硬撑着干，没及时治疗化了脓，伤愈后留下伤疤，直到现在 60 多年了还可以看到疤痕。

在军政学院时，有一次全体学员到数十里路外背木柴。回来的时候，我和一位日本学员比赛，各扛一根 50 来斤重的树干，看谁走得快。结果我累得吐了血，那日本学员很过意不去，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我说：“没关系，小毛病，没事。”我俩在路边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赶路，说说笑笑地走着，一块儿回到军政学院，把树干放到规定的地方，都完成了任务。

在延安大家都吃小米饭，但有的同志结婚生子后组织上会给孩子每月配发 25 斤白面。好多同志有时就到有孩子的同志家中吃顿白面饭，以改善一下生活。有一段时间日本鬼子还“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在 1938 年 11 月日本鬼子第一次轰炸延安时，延安稍有损失。后来我们就总结了受损失的原因，采取了措施：一是在挖窑洞时将左右窑洞之间的深层处彼此挖通，如敌人的炸弹落在这个窑洞上，我们可以从里面走到另一个

窑洞里去。二是在延安周围部署高射炮或高射机枪，使敌机不敢低飞。三是大家都有了防空的经验和措施。我在三分校时，一有警报，许光达校长都是亲自出来指挥，延安各单位和各学校都是有步骤有领导地进行防空，所以自 1939 年以后，敌机来轰炸就构不成威胁，反而成了一个特殊的喜讯。日寇飞机轰炸哪个单位和学校，哪个单位和学校就能会餐，改善一下生活。因为敌机投下的炸弹每枚近百斤重，炸弹皮都是好钢制造的，卖到铁匠铺能值一元钱一斤，百十斤左右的炸弹皮卖的钱能买一两头肥猪，把它杀了会餐，一饱口福，真是新鲜有趣，皆大欢喜。我在的学员队就多次捡过炸弹皮，每次都吃红烧肉，包饺子等。那时我们都是青年小伙子，吃饺子每人平均一斤面和一斤肉，这些大礼都是敌人白送的。

延安的娱乐活动也很丰富多彩，到处可以听到抗战的歌声。由冼星海指挥，延安各学校参加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和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谱写的《延安颂》，唱遍了整个边区。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有个业余（京）剧团，多由票友组成，经常自演一些节目，如《三打祝家庄》、《打渔杀家》、《逼上梁山》等剧，很受大家欢迎。

在延安时因条件比较艰苦，许多人身上都生有虱子。夏天对虱子还处理好，到了冬天就困难了，棉衣、衬衣的缝隙里藏满了虱子、虻子，洗不掉，捉不尽。于是就利用中午太阳当头时，脱光膀子，在温暖的阳光下捉虱子，这竟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我估计当时在延安的同志身上没有虱子的是极少数，就连毛主席身上也有虱子。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曾写道在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解开腰带抓寄生虫的事。当时同志们给虱子起了个雅号叫“抗日虫”。在延安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对衣食住行却料理得井井有条。每年发单衣棉衣各一套，但发新不收旧，这样就给我们留有了充分的余地。我们自己动手将旧衣服洗干净平时穿，或者在劳动的时候穿，上课、集会时再穿新衣服，听中央首长作报告时我们都穿得整整齐齐。我们经常将旧衣缝改成内衣，如做成裤头、袜子等。在延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很健全，小组会每周都开，党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谁有缺点都能及时发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到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党内党外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对抗战争的胜利和整个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2004 年 4 月 23 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制度的威力 (读书札记)

● 李 普

邓小平 1980 年关于制度有一段名言 ( 见《邓选》第二卷), 讲建立制度的重要性, 我曾经加以引用。我至今认为他说得很对, 近来觉得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没有认识到。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说过: “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 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 从委员中挑选一个书记, 来负责联络工作, 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陈独秀的意见很好, 可惜没有成为制度。

邓小平说的是我们党没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 没有建立起集体领导的制度。可是相反地, 不民主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 个人专断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

从《刘少奇传》可以看到: 1943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 主要内容一是重新成立政治局, 毛泽东为主席; 二是重新成立书记处, 它隶属政治局, 由政治局主席为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 毛泽东为主席。《决定》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 书记处“会期不固定, 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 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 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的。刘少奇在会上建议: “书记处有一个主席, 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 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

我是几年以前看到《刘传》的, 一直没弄懂刘少奇这个建议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必要性。假定任弼时每件事都反对毛, 你刘少奇每次都站在毛一边, 每次都是二比一, 毛笃定得胜; 然则, 这个建议和这个决定岂不是多此一举。不过话虽如此, 刘少奇这么说想来一定还有他的道理。我糊涂数年之久, 最近总算悟到了一点儿: 这就叫做制度; 把这件事形成制度, 叫做制度化。这才开始

领会, 制度和制度化威力大矣哉!

首先, 毛从此可以百分之百独断而毫无顾忌。他有根据。他手里有这个《决定》, 等于说你们必须听我的, 你们只能服从我。谁反对我的意见, 往轻里说是无组织无纪律, 重一点说就是反党。反对固然不可以, 怀疑都是不行的, 你竟敢怀疑党中央不是绝对正确? 有了这个“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就是党中央, 党中央就是毛泽东; 后来, “中央”两个字也不妨省掉, “文革”时期毛主席就是党, 党就是毛主席。

其次, 省市和下属各级向中央看齐。很长一段时间内, 在中央, 主席说了算; 在各级, 一把手说了算。实践曾经无数次证明, 在基层政治生活中, 批评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这一点可以从这个决定推行出来, 并非毫无根据。

再次, 中央和各级一把手既然拥有这种制度化了权威的权威, 当然也就有了上下之分。然后下面的聪明人自然以揣摩上面的意图为能事, “揣摩”这两个字不大好听, 所以都叫做“领会”。这是门大学问, 不是我说得清的, 其中大概包括必须说假话。林彪有一句名言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这是玩弄权术的意思, 难怪红军老将们都叫他精灵鬼。后来他越发精灵了, 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还有两点我也说不清, 其中想也必有大道理。一是, 刘少奇这个建议是怎么来的? 是他凭空想出来的, 是从苏联学来的, 还是有感于党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 二是, 那一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 怎么能通过这样一个《决定》, 规定什么“最后决定权”呢? 是不是与中国仍然是农业社会有关, 与秦政以来皇权专制的传统有关? 或者, 与革命战争中必须高度集中权力也有关? (2004 年 5 月中)



# 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

● 吴 江

张文达先生,原名孝权,祖籍湖南,定居上海。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时期协助赵朴初居士做救济总会工作。1980年移居香港,为香港各报写专栏文章,有时一日两三篇。常有传神之笔,堪称“随笔艺术”,誉满香港。我在香港仅见他一二面,今已作古。我曾在《随笔》杂志上介绍他的专栏杂文(六篇)。今又在旧剪报堆中拣出他写张爱玲的两篇。张爱玲,旧上海一女作家也,汉奸胡兰成之妻。胡为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在香港)。但张爱玲本人不是汉奸,这一点是应当加以区别的。

但任何作家都是社会的人,都有其时代性。论文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张文达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资格‘评文’。但对于这么多文人对张爱玲作品如醉如痴,捧其作品最优秀,不免有点诧异。”张先生说的是2000年以前港台一带的情况,与此同时,张先生也指出,也正因为如此,港台及海外也有不少人对此现象作出分析,“评”张爱玲文者大有人在。

不知为什么,中国大陆这几年也有人掀起“张爱玲热”来,并也热到“如醉如痴”的程度。甚至北京、上海两地个别出版社,有出版并吹捧胡兰成书者,称其为“奇书”(尤其是胡专写他与张爱玲的关系的那本名为《今生今世》的书),这就大大超过了港台。至于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自应允许有各人的自由,甚至也应有喜爱到“如醉如痴”程度的自由,但从张先生的文章看,即使在香港也有要求那些“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们应当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剖析张爱玲,例如,剖析一下张爱玲“怎么会挑了两个这样子的男人”。我看,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因此种种,我在这里特向读者介绍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问题的两篇文章如下:

## 一、也谈张爱玲

10月27日本报刊蒋芸小姐的大文,写张爱玲《自闭自虐的一生》,写张爱玲的两度婚姻,怎么会挑了两个这样子的男人?蒋小姐以心理分析的手法,剖解张爱玲对婚姻的态度,一语不涉及张爱玲的作品。并世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未有从这一角度剖析张爱玲者,我十分佩服蒋小姐独具只眼。

我对比较文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资格“评文”。但对有这么多文人对张爱玲作品如醉如痴,捧其作品最优秀,不免有点诧异。

文坛前辈陈蝶衣世丈则曰:“对于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无论中篇或长篇,概括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简直是百不得一,绝无仅有。”蝶衣世丈这一篇大作的题目是《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

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1995年为文云:“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

张爱玲爱上了胡兰成,这是她个人的感情问题,蒋芸小姐的分析极其简明扼要。但人们不禁要问,张爱玲

对胡兰成做汉奸——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是怎么看的？对那个汪精卫汉奸卖国组织是怎么看的？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就有文化界朋友告诉我，张爱玲虽没有投敌，却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的公馆。这和胡兰成没有一点关系吗？

（见《信报》2000年10月31日）

## 二、知人和论世

人，不能遗世而独立，因此，“知人”和“论世”是联在一起的。

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的帕尔·拉格维斯特，191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的艺术和绘画的艺术》的年轻人宣言里写道：“作家的任务是要从艺术家的观点来阐明他的时代，并且为我们以及后来者表达、透露出这个时代思想和情感。”

台湾作家杜清玄先生写道：“我们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人格和风格的延伸。”

使我感到讶异的是，如此大阵仗谈“张爱玲与我”，却不涉及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地点和她对这个时代的态度，仿佛她是一位遗世而独立的高人。

张爱玲当年成名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在那抗日战争烽烟四起的时代里，张爱玲住在沦陷在日寇汉奸

之手的上海。那个孤岛就是张爱玲的天堂，她是在那座天堂里成名的。

论一个作家，不能离开那个作家所处的时代，不能只论他的作品而不涉及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为人。知人论世，二者是没法子分开的。数十年间，论张爱玲作品的文章多矣，但很少直指她和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关系。离开了这一点，就不能得其全。

唐德刚教授说：“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

严于斧钺之论。

约在1943年或稍早，张爱玲和胡兰成在上海结婚。胡兰成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在香港），汪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胡兰成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日本投降时，日本宪兵队保护他，他且向日本政府献策，不投降，打下去，还要日本将搜刮的金银秘密保存以谋东山再起。这一段，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有生动的记载。胡兰成逃往浙东，已被通缉。张爱玲赶到温州去看他，而胡兰成却和一个旧识人家的姨太太结为“夫妇之好”。

张爱玲的心里怎么想，蒋芸小姐分析透彻，我不写了。

（见《信报》2000年11月1日）

（上接43页）上写着：“献给敬爱的少奇同志”，“光美率妙秀、爱琴、平平、源源、亭亭、潇潇”；会场内外，还摆放着治丧委员会及河南省党政军各部门敬献的花圈共153个。

骨灰迎送仪式由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主持，河南省委书记兼省长刘杰同志讲话，参加仪式的有河南省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及郑州市、开封市的领导共1500多人。王光美同志即席致辞，她简略回顾了刘少奇同志于民主革命时期两次在河南工作和建国后多次到河南的情况。她说，少奇同志热爱河南人民，河南人民也培育了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和河南人民怀念少奇同志的深厚感情表明，少奇同志活在河南人民和全国人民心中。

骨灰迎送仪式在凄婉低回的哀乐声中结束后，即启运少奇同志的骨灰。刘杰等河南省委的负责人分别将骨灰盒、少奇同志遗像、花圈交给家属。刘源手捧党旗覆盖的骨灰盒，王光美同志

手捧鲜花陪伴，走在队列的最前边，接着是刘爱琴捧护着少奇同志的遗像，然后是刘平平、刘亭亭两人抬着花圈，缓缓步出会场。

王光美同志和子女及陪送骨灰到北京的河南省委书记刘杰、赵文甫登上灵车。这是一辆大轿车，车身披着黑纱，车前悬挂着刘少奇同志的遗像和黑白两色的花球。车内素白洁净，前部安放了一个素纱缠裹的台子供奉骨灰盒。灵车由七辆摩托车护卫，驾车的警察臂缠黑纱，摩托车上也悬挂着白色的花球。从人民会堂至郑州机场的路上，两万多郑州市民肃立默哀，夹道送行。

午后3时，治丧办公室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等家属，护送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飞离郑州，返回北京。彭真、薄一波同志等数百人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并一同将少奇同志的骨灰迎送安放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那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生前办公和会见外宾的主要场所。

（责任编辑 李 晨）

# 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 王辅一 李维民

《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刊出笔者所写《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第4期又刊出甘惜分所写《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甘文》），两文的观点是不同的。《炎黄春秋》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从对比中明辨是非。我们认为，观点可以不同，但史实必须准确。《甘文》中的观点有的缺乏史实根据，有的偏离了史实，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党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

《甘文》说：“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新四军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军部安顿在山明水秀的肥沃之地的皖南泾县云岭，军部从武汉和南昌迁来路过此地住几天可以，但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就太危险了。……如果论项英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赖在云岭不走。”“如果新四军军部早有战略眼光，甩开皖南，不与国民党去挤那尺寸之土，改而向东向北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哪有后来的痛哭之日。”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缺乏史实的根据。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制定了“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将第四支队即高敬亭支队设在皖中，是根据中央的这一部署确定的。

1938年1月15日，长江局致电项英并告中央：“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提出要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其中就有皖南。皖南是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是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哨之一。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一方面指挥各支队进入敌后作战，一方面掩护东南分局（后东南局）领导东南地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皖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9年2月，中央确定的新四军发展方针中，规定“向南巩固”，明确要坚持皖南，而不是甩掉皖南。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任务时，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1941年1月28日，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仅14天，毛泽东等就电令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开展革命斗争，“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说明皖南作为战略支点的重要意义。

《甘文》说：“正在新四军军部在东进、北上反复犹豫难于决断之际，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进入苏南、沪、杭地区，……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新四军威震江南。……新四军一、二支队的举动向新四军军部作了启示。但军部仍以后勤部队太大太多踏步不前，日益陷入蒋军包围之中，虽然这时中央已多次电催叶项应迅速撤出皖南，但项英总是拖拖拉拉动不了。”这种把一、二支队和军部分割、对立起来的表述，是不符合实际的。1938年2月14日，当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准备向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之前，项英和陈毅就联名致电中央，提出：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



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任务,机动的完成;在广大的浙苏皖边境地区自由进退。这是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最早构想。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4月初,项英到达岩寺不久,即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确定派先遣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由粟裕于4月28日率领出发后,根据叶挺、项英的命令,陈毅率第一支队于5月12日出发东进。6月15日,项英又向中央和长江局报告: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与粟裕率领的先遣队已在溧水会合,目前正着手在茅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二支队主力,在当涂以东小丹阳两侧山地为根据地,开展活动;三支队一个营在芜湖至宣城的公路两侧活动,军部及三支队位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由此可见,第一、二、三支队的行动,是项英和军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统一部署的,中央并未提出异议。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

1940年4月23日,项英向中央转报陈毅等21日关于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的建议时,表示军部应向苏南靠拢,集中力量发展苏南。5月3日,中央致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由此可见,中央并无“甩掉皖南”的意思。同年秋,国内政局发生逆转,皖南部队又面临向北或向苏南转移的问题。项英认为如果军部撤走,则皖南就难以坚持。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央说明:“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而不能形成顾此失彼等。应如何?请速示。”11月1日,中央电复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

这个电报距皖南事变只有两个月,这时中央尚未明确项英及皖南部队是否全部北移江北。《甘文》说项英“最大的错误是赖在皖南不走”,

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 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 我军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教训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 对大局的判断失误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八路军、新四军50万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显然是要对10月上旬新四军在苏北黄桥自卫反击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进行报复。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10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中说:“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但此时国民党军已进行了围攻我皖南部队的部署,显然不会接受这一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华中总指挥部准备在苏北实施曹甸战斗,解决韩德勤部。叶、项担心曹甸战斗会给皖南部队北移带来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但叶、项这一建议和提醒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第二天,毛泽东等电复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同一天(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分析当前形势,认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

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苏北我军发起的曹甸战斗,历时 18 天,因屡攻未克,部队伤亡较大,遂于 12 月 16 日撤出战斗。这样,国民党当局不再担心韩德勤部的安全,顾祝同在皖南加强了围攻措施,加剧了皖南部队北移的困难。12 月 13 日,项英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北移已公开,敌顽双方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大部队渡江有困难,同时国民党方面拒发饷弹,请示中央如何行动。12 月 14 日,中央电告叶、项:“(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12 月 25 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仍然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亦很少打的兴趣,……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叶挺曾多次去第三战区找顾祝同、上官云相,交涉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叶挺、项英于 25 日急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看到叶、项电报时,又接到周恩来 26 日报来 25 日会见蒋介石、蒋根本不让步等情况后,看到以皖南部队北移作为谈判的砝码已不可能,局势已非常严重。12 月 26 日给项英等的复电,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

1994 年 9 月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一书讲到:“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转移的主张。”

上述经过说明,当时我党对大局的分析过于乐观,对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 项英与叶挺之间的芥蒂,并非个人之间的矛盾,需要从大局来分析这个问题

《甘文》以很大篇幅谈到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并且不加分析地断定“项英要负主要责任”。笔者以为,叶、项之间并无个人恩怨,许多是是非非是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

首先应当看到,新四军的组建和八路军的改编,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八路军的改编是经过国共双方反复协商达成协议后实现的。而新四军的组建,事先国共双方没有经过协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 1937 年 9 月 28 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在 1927 年 12 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离开了共产党,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1937 年回国参加抗战。当时,蒋介石认为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了,想乘机拉拢叶挺,利用叶挺的声望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编起来,为他所用。8 月中旬,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时,曾希望他出面来改编我南方游击队。但此时中共中央对于南方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有很大疑虑。10 月 3 日,洛(张闻天)、毛(泽东)电报讲:“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对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开始中共中央也没有表态。一个月后的 10 月 30 日,洛、毛致博(古)、叶(剑英)电中提到:“叶挺是否能作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国民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编制南部各游击队,通令有关各省、区,何应钦要叶挺去接洽高敬亭、傅秋涛两部,而中共中央要叶挺去闽赣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10 月 15 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请你

给信与郑位三、高敬亭,重复说明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10月19日,洛、毛电询博、叶:“(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与叶挺交谈后,当日致电周恩来:“甲、叶挺已到延安。据云,在沪你会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乙、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从上述来往电报中,足见事情已够复杂了。蒋介石想利用叶挺,达到他“溶共”的目的;我们愿意叶挺恢复党籍,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党希望叶挺不受国民党干涉,但他是国民党任命的,而且要向国民党要给养、枪弹,完全不受国民党干涉也不可能;叶挺是军长需要有职有权,但他不是共产党员,又不能参加党的会议,特别是此时实行了土地革命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转变,新四军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配置在长江南北地区,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江北第四支队为第五战区)指挥、管辖,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叶挺很不好办,项英也不好办,这是叶、项在工作中出现一些芥蒂的最主要的原因。《甘文》片面指责项英对叶挺不尊重,要负主要责任等等,是很不客观、很不公正的。

新四军在皖南三年间,叶挺为解决新四军的编制、饷弹等问题,在1938年10月下旬至1939年2月23日、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8月,两次长时间去重庆、

广东、香港、澳门,1939年4月下旬至8月去江北巡视部队,再加上他常常去三战区顾祝同处联系工作,叶挺在军部和项英一起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甘文》埋怨“叶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经验未受到重视”,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

从新四军组建时起,项英就意识到新四军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军长不是共产党员,肯定会遇到许多问题。他从有利于新四军的存在和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团结和支持叶挺军长开展工作。他要求机关、部队都要尊重叶军长的领导,服从叶军长的命令;对叶挺的生活保障,项英同副官处作了专门研究。当时项英感到难办的事,就是党内经常过组织生活,或开党的会议,叶挺由于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难免感到尴尬。特别是有些中央来电没有写叶挺的名字,按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即使让他看了也容易引起误会。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时,项英反映了这个问题,此后党中央给新四军来电中有叶挺名字的才多起来。

项英与叶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包括《甘文》在内的外人所说的那样。1940年10月12



晋察冀边区军民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



日,军部在云岭开会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叶挺发表讲演,在叙述新四军成立的战斗历程后讲道:“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这并非违心之言。同年11月,中共中央电令叶挺早日渡江,到江北就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项英也催他快去江北,如果叶挺与项英关系很紧张,按人之常情,叶挺会巴不得早些离开,但他却偏偏留下与项英在一起,直到皖南事变发生。

叶挺几次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之职,原因很复杂,多为编制、经费等问题与国民党交涉有困难,也有回广东拉队伍、打游击的想法,项英总是恳切挽留。叶挺曾给秘书长李一氓信中表示:“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他是党外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这说明叶挺想离开新四军,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

对叶、项关系,李一氓曾专门谈道:“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来说,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军长批注意见;皖南几次反‘扫荡’作战,叶军长只有1940年秋季那一次是他指挥的。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和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在一起吃。”“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军长或师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是非党员身份,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

## 不应抹煞项英在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加强新四军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皖南事变以后,项英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在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加强新四

军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被一笔抹煞了。《甘文》也是这样。须知,如果没有项英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没有后来的新四军。项英11月7日到延安后,党中央为他举行欢迎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对项英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称赞“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甘文》一面说:“新四军军部所在之地全是国民党辖区,新四军已不可能插手进去建立第二政权。”一方面又埋怨“新四军在皖南所占之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成根据地。”互相矛盾。从大局来看,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间,新四军完成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在苏南、皖中、皖东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作战2900余次,歼日伪军和顽军9万余人;新四军自身人数,由1938年4月组建时的一万余人,1940年底发展到八万余人,增长了七倍半;掩护了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1939年2月,就建立起14个县的党组织和3个特委。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军分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项英同志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的贺电中,高度评价了项英和新四军两年奋战的业绩,与几个月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对项英的片面指责,形成鲜明的对照。

《甘文》提及的史实还有多处讹误,例如:周恩来视察云岭新四军军部不是在1939年5月,而是在2月23日至3月14日;解放战争爆发的时间,不是1947年,而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时;说新四军发展“成为后来的华东野战军”也不对,华东野战军是由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两部分部队合编组成的,华东野战军所辖各纵队,有一半是由原山东军区部队编成的。对于史实需要十分严谨,愿大家共勉。

(责任编辑 李晨)

编者按：

本刊今年第6期刊出孙有光同志《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一文后，先后收到钱听涛、柳光辽、李海珉等同志的来信、来稿，对孙文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将李海珉同志的来稿刊发于后，供读者参阅。

# 解析柳亚子的牢骚

——《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读后

● 李海珉

1949年3月28日，柳亚子撰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毛主席于4月29日回复了《和柳亚子先生》一诗，其中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一联，此后，各家各派对柳亚子的“牢骚”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最近，又有好多文章谈及柳的牢骚诗，其中孙有光的文章，2004年在《炎黄春秋》第6期发表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孙有光文章认为，由于中共方面让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于是引起了他的牢骚，在颐和园益寿堂生活期间，柳亚子对那些“土八路”看不顺眼，于是就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打管理员等等，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

笔者认为，孙有光同志的文章，抓住的只是些枝节，不是根本，罗列的只是皮毛，而非本质。

柳亚子一家移居颐和园是在4月25日，而孙有光同志提前到3月29日，因此接下来的孙文叙述的事件几乎都与事实有了误差。

2004年6月21日，那天是柳亚子逝世46周年的忌日，正好柳亚子的一位亲属与笔者等人在柳亚子故居缅怀柳亚子先生，座谈时说到最近好些文章对柳亚子先生作了颇不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孙有光的文章，他说：“柳亚子先生根本不会为了什么新鲜的扁豆和黄瓜大发脾气的，生活上的事都有夫人操办，他从来不管，对手下人，比如书僮、佣人都是很和善的，从来没有骂过他们，更不要说打了。”

## 最大的牢骚为和谈

要说柳亚子牢骚的原因，有必要再来阅读一下柳亚子的牢骚诗。1997年笔者发现了柳亚子先生《感事呈毛主席》的手稿，与发表稿较有出入，所以想把原稿和改定稿一起参互品读，以便更好地探讨柳亚子牢骚的原因。

初稿：

开天辟地君大健，俯仰依违我大难。  
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发表稿：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通过对柳亚子的立身行事的认识，对他全部著作反复阅读，特别是日记和牢骚诗的研读，笔者觉得，初到北平，引发柳亚子牢骚的事件决不是一桩一件，也决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就从引录的牢骚诗谈起吧。“俯仰依违我大难”（初稿）和“说项依刘我大难”（发表稿），二者指的同一回事，这是柳亚子最大的牢骚。

1949年2月，在香港的柳亚子接到毛主席的电召，邀请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新中国。临起程的时候，柳亚子写下了格调欢快的

《二月二十八日启程有作》：“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正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从2月28日到3月18日到达北平这20来天的时间里，柳亚子不止一次地赋诗表明自己的观点，打过长江去，彻底消灭偏安长江一隅的蒋家皇朝。在柳亚子看来，打过长江去是必然之举，蒋介石大势已去。想到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解放东南父老，心中的欣喜常常溢于言表。尽管也听到有关国共再次和谈的传闻，但他深信毛主席不会中此缓兵之计。纵然有人要同国民党和谈，他柳亚子也会纵其张仪苏秦之舌，“一唱纵教万和来”，以回报共产党的礼遇。

3月25日，毛主席抵达北平，柳亚子与众人前往欢迎。欢迎晚宴后柳亚子写了四首七律，力主立即渡江作战：“华、拿陈迹休怀念，希、墨元凶要荡夷。”“长江自昔非天堑，逆豫何曾幸瓦全。”“百万大军渡江好，夫差授首甬东天。”再次观点鲜明地直陈己见，打过长江去。

然而，就在次日，意外的情况突然而来。3月26日早晨，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中共代表团将于4月1日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这大大出乎柳亚子的意料，仅仅过了一天，即3月28日，柳亚子写了这首感事诗。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初稿上，也即“俯仰依违我大难”句，柳亚子认为在对蒋介石和与战的大问题上，要自己俯仰其间随意应付发表些模棱两可无关痛痒的言论那真是太难太难的了。但柳亚子正式定稿时作了改动，改成了“说项依刘我大难”，认为要说服项羽归附刘邦这是天大的难题，对蒋介石没有和谈的可能与必要，柳亚子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不满。初稿的“俯仰依违我大难”，偏重于个人角度来考虑国共和谈；发表稿的“说项依刘我大难”，则从大局上来看待国共和谈。弃个人角度而取大处着眼，这就是柳亚子修改的原因了。

柳亚子对蒋介石的认识是深刻的，而毛主席对蒋介石的认识同样是深刻的，且棋高一筹，毛主席要利用和谈争取更多的中间人士。4月20日，当蒋介石拒绝在和谈方案上签字之后，毛泽东与朱德发布渡江命令，不仅军事上势如破竹，在舆论上也广收仁德。

毛主席接到柳诗，没有立即作答，直到4月29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才回赠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柳二十多年知交，有什么不可以说呢，然而出于对国家大局的考虑，这是国家机密，当时无法作答。毛主席是理解老朋友的，理解老朋友的“牢骚”，希望老朋友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共产党不会中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现在不是打过长江了吗！

现在，孙文虽然也提到“柳亚子先生对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本来就不同意”，但是把柳亚子牢骚的重点放得不当，说“此时为了给国民党代表团腾住地，又让他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六国饭店移居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颐和园居住”，引起了柳亚子不满，因此撰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一诗。

## 第二大牢骚为被“夺席”

柳亚子第二大牢骚，初稿和发表稿提到的是不同的两件事，当以发表稿为是。“醉尉夜行呵李广”（初稿），“夺席谈经非五鹿”（发表稿）。

“夺席谈经”和“非五鹿”这两个典故，相当部分的注释说成柳亚子非常自负，把自己比喻作极有能力极有学问的人，也就是像朱云像戴凭。其实，正好相反，柳亚子引用“夺席谈经”之典，不是说自己是戴凭，相反自己是被戴凭夺了席的人；“非五鹿”，柳亚子说自己是被非难被驳斥的五鹿充宗。

早在1949年2月28日，柳亚子抵北平20天前，李济深主持了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民革的新政协代表，柳亚子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更谈不上代表民革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了。后来，在政协筹备会期间，民革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柳亚子才成为民革政协代表。

大家都还清楚记得，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日，中共中央就邀请各党派代表赴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电示中共上海局：新政协会议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我党拟邀请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所列32



人名单中，柳亚子列名第五。

可是在到达北平之前，民革已经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柳亚子先生竟然不在其内，原先列名第5的柳亚子连作民革代表参加新政协的资格都没有了。意外，大大的出乎意外，柳亚子岂能无动于衷？

更可气的是，当时文化界的主持者，也没有给这位名满天下的文化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安排位置。

新中国成立在即，柳亚子作为文学艺术颇有造诣的活动家，极望发挥特长，有所贡献。1949年3月20日晚，李维汉和周扬召集并主持了学术工作者会议，

讨论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筹委会问题。柳亚子应邀出席，可是发言时意见不同。这在当天柳亚子的《日记》中有：“晚上开学术工作者会议，李维汉、周扬所主持也。李、周招宴，饮酒仅七杯，颇不痛快。”又，3月24日日记：“下午，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址在中南海），被邀讲话，尚未垮台为幸！……又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

柳亚子一生无意仕进未脱书生本色，不过他一生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思想信念不衰，始终想着为黎民百姓贡献才力。可是，至此柳亚子有一种被闲置起来的感觉。

“夺席”句和“醉尉”句都有被人冷落闲置甚或非难呵斥的意思。初稿“醉尉夜行呵李广”，着眼于妄评大作，尽管柳亚子很生气，但毕竟是小事一桩；发表稿“夺席谈经非五鹿”，着眼于被“夺席”，不让参加所擅长的工作，着实受不了，因此，柳亚子在定稿时将“醉尉夜行呵李广”改成了“夺席谈经非五鹿”。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在颐和园会见柳亚子

## 无车也是牢骚

柳亚子第三点牢骚是“无车”，“无车弹铗怨冯驩”。

关于“无车”，柳亚子在《恭谒孙先生灵堂有感》中写道：“余税驾北平之日，馆舍粗定，即思往香山碧云寺恭谒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之灵堂及衣冠冢。乃招待处诸同志恒以道第为言。嗣迁颐和园，相距益近，相思益切，因乘毛主席枉驾之便，面陈衷曲，一诺无辞。……”又1949年4月1日日记：“夜，餐时与任老夫妇及寰老之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

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柳亚子是高度近视，又加那时体弱多病，出门无车无陪同是方向莫辨寸步难行。一个行动不便但社会活动十分频繁的老年人，感到无车的苦恼而提出要车的要求，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

对无车一事，柳亚子是有意见的，但是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柳亚子私心发作的表现。记得在1949年4月25日迁居颐和园前夕，柳亚子写了一诗赠给负责六国饭店接待工作的邓子平同志，题目就是《赠邓子平》：

嘘寒问暖费经营，豪气能消邓子平。

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

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

自是人间美男子，翻疑母性太多情。

其中“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意思是说自己在吴粤等地流亡出了名的人，实在不会为生活上的某些不足而闹意见的。写此诗时，柳亚子还没有接到毛主席的答诗，可见对“无车”一事，柳亚子在诗中仅是顺手一笔，并没

有把它放在心上耿耿于怀。

## 希望进言而没有机会

在北平，柳亚子一直盼望毛主席的接见，他肚里有话，希望一吐为快。孙有光的文章谈到：“黄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而他（柳亚子）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还有李济深和傅作义，他们都到毛主席的双清别墅，就国共和谈问题进行了交谈。可是，等啊等的，就是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

有许多话，柳亚子觉得只有向毛主席才能说，只有向毛主席说才有效。

比如与国民党会谈问题，在柳亚子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和谈只会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带来喘息的机会。

比如民革代表问题。1948年元旦民革组建时柳亚子是核心人物，被公推为秘书长，目前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如今怎么连个民革代表都当不上？李济深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现在当上了民革主席，而1927年柳亚子因为反蒋而遭到蒋的通缉，现在竟把柳亚子排挤在外了。

比如北平的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柳亚子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柳亚子的位置。

比如“醉尉夜行”问题。在诗词创作方面，柳亚子自认与毛主席有着相当多的共同语言，毛主席一直非常赞赏柳亚子的诗词。早在1945年10月4日，毛主席就在信中高度评价了柳亚子的诗：“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可是，柳亚子刚到北平，就有某同志对柳的诗文妄加诋訾，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对此，柳亚子非常愤怒，大有被醉尉呵斥的耻辱。

比如出无车的问题。等等。

希望毛主席接见，柳亚子在《感事呈毛主席》颌联之中也有所表露：“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初稿）。“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发表稿）。

柳亚子是易冲动的诗人性格，他没有城府，崇尚率真，待人接物方面的确不会周旋，更别说掩饰自己喜怒哀乐了。这里的“周旋”，根据上文

来分析，包括两类内容。一是“俯仰依违我大难”、“说项依刘我大难”的周旋，二是“醉尉夜行呵李广”、“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的周旋。前者属敌我，后者属内部。共产党马上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重开和谈，作为长期与蒋介石斗争且为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的柳亚子，别说是和谈成功，就是和谈期间，他都是拙于周旋的。柳亚子满怀希望来到北平，却不料被晾在了一边，民革代表当不上，文坛上居然也沾不了边，就是自己引以自傲的诗作都被人妄加评论。同住六国饭店的人中有的出入有车，而柳亚子从资望、地位、年龄、视力来看都应安排车子却没有安排。见不到毛主席，也见不到周副主席，对谁说都不管用。

在这里，柳亚子向毛主席作了拙于周旋的表白，希望生死之交能够让他一诉衷肠。可是，因为建国在即，毛主席日理万机，一时安排不过来。

## 孙文回忆有误

柳亚子搬进颐和园益寿堂，应当是在4月25日，有柳亚子《日记》《柳亚子年谱》等材料可证。即使是3月29日，那么“土八路”之类的事情也写不进牢骚诗里去。柳亚子《光明集卷九（万寿乾集）》有一段序言：“1949年4月22日，齐燕铭同志访余六国饭店，谓将迓余夫妇赴西郊万寿山之颐和园益寿堂休养，盖奉毛主席之命而来者也。翌日，余偕佩妹、超弟乘汽车诣园中相宅。其圆满超出意外……”柳亚子一家23日去相宅，24日准备，25日移居。事隔50多年，孙有光同志记忆有误是情有可原的。

由于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的益寿堂，孙文提前了27天，所以对事情的产生与分析就大相径庭了。

4月25日移居，那时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任务已经结束，不存在让柳亚子腾让住地的问题了。移居颐和园益寿堂，是毛主席让柳亚子去那里休养，柳亚子相宅之时觉得“圆满超出意外”，移居之后，柳亚子在写给美国的儿子柳无忌信中说：“此地是皇宫，我们居然享受帝王之乐，也算翻身了。”住进颐和园柳亚子是非常兴奋的，根本不存在引发牢骚的问题。



孙有光文章说:1949年4月22日上午,周副主席电话通知高富有说:“我要和邓颖超同志请柳亚子先生夫妇到颐和园听鹂馆吃饭,你和颐和园管理处的另一位同志作陪。”接着写了周副主席批评柳亚子发牢骚,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等情节。

笔者查找了这一时期的有关柳亚子的资料,也搜寻过其他材料,发觉4月22日上午,柳亚子因为要迁居颐和园,正在六国饭店请各房间的友人题名留念。周恩来到听鹂馆宴请柳亚子一事是有的,但是,时间不对,宴请的目的更不对。柳的《北行日记》里明确写的是6月28日,出席者一共13人,有具体名单。设宴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柳亚子,而是为柳亚子补祝寿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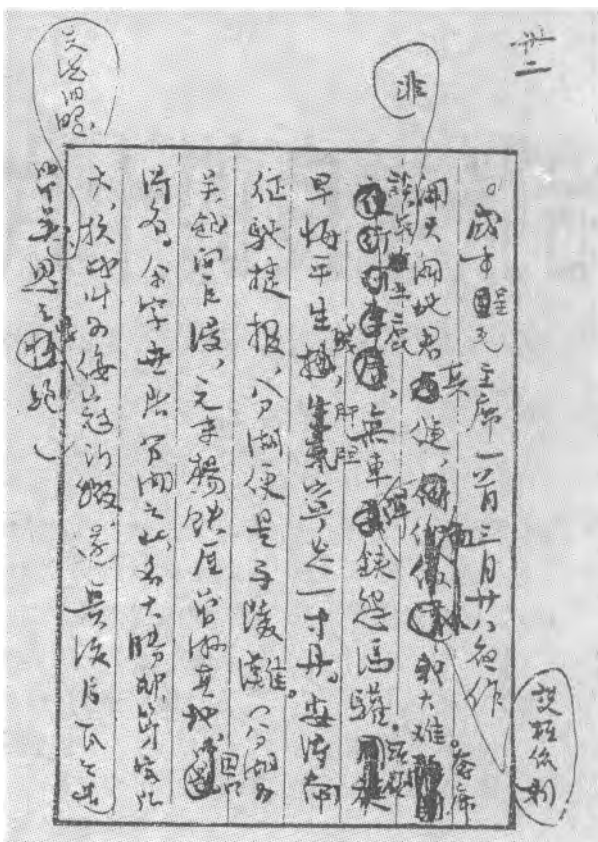
还有一些,列举如下:

孙文:4月5日,柳亚子先生买回一个孙中山先生小型石膏像,门卫以为他是颐和园内的住家户的亲友,就挡住问他:“找谁?”这一下惹他生气了,他说:“我住在这里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说着就举起拐杖打门卫。

据柳亚子《日记》柳亚子买“得孙先生遗像一页”,也不是石膏像,时间在4月10日。不管是4月5日还是10日,柳当时都没有搬进颐和园,怎么会与门卫发生这档子事件呢?

孙文:4月7日,周恩来副主席在听鹂馆宴请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邵力子。柳亚子听说周恩来到颐和园没有去看他,以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忘了他,就更生气了,牢骚也更多了。他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

当时,柳亚子还没有移居颐和园,而且也不知道日后毛主席将让他移居益寿堂,这时怎么会



柳亚子诗词手迹

说出“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的话呢?

孙文:4月12日,柳亚子先生提出,要吃炒青扁豆和顶花带刺的鲜嫩黄瓜。管理员到东宫门外、青龙桥、西苑、海淀等菜市场跑了个遍,都没有这两种菜。……柳亚子本来就有气,一看到管理员回来,没有买回他想要吃的那两种菜,气就上来了,询问间,管理员刚要向他解释,一句还没有说完,柳亚子先生就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说:“你没有尽到职责,还讲什么客观理由!”

当时,柳亚子居住在六国饭店,生活都由饭店安排。

孙文: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等在景福阁召开保卫工作会议,景福阁周围布置了武装警卫哨,不是参加会议的人,不让上景福阁。偏偏这时柳亚子偕夫人要上景福阁,又受到哨兵挡驾,他又大骂哨兵,生气而返。

游颐和园事,柳《日记》写到过两次:第一次在4月27日(柳亚子夫妇刚搬进颐和园益寿堂的第三天),“至乐善堂,以无字不得入,一怒冲锋,看门者亦无如何也。”

关于景福阁事,柳亚子《日记》中作5月17日:“傍晚,吴柳生、陈麟飞夫妇挈小孩持敏同来,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衣而返,不复管客人的事了。”

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某些具体事情和时间不准确难以避免,可进一步考证、核实。像柳亚子先生这样一位感情容易激动的诗人,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岁月,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属正常。我们不应就事论事,应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责任编辑 赵友慈)



# 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十六字密信

● 范丽红

周恩来、张学良在短暂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尤为惹人注目的是,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曾托人给远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捎去一封十六字密信,真切地反映了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关切情感。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亲笔信,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也没有写信人的署名,全文只有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有关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密信最早披露于1990年,10多年过去了,密信的知情人或年事已高,或已作古,或三缄其口,多年来,围绕这封密信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正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十六字密信究竟是通过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传递到张学良手中的呢?近日,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和走访知情人,对十六字密信的相关史实进行了深入考证,对以往种种说法中的舛误之处,进行了一一考订。

## 关于密信传递的时间

关于密信的传递时间,历来说法不一,计有1960年说、1961年说、1962年说等不同的说法,就是1961年说又有1961年春和年底两种说法。

最早向外界公开这封密信的是曾在周恩来身边长期工作的童小鹏,据他回忆:“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张学思以及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东北籍人士。席间,大家很自然地

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张学思激动地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留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回到寓所,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十六字短信……”

由于童小鹏曾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又是第一个披露这一内幕的人,应当说他的回忆还是有很高可信度的,以至很多学者在没有做进一步考证的情况下,将这一说法加以引用。一时间,周恩来在1961年年底或者1962年春通过特殊渠道给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捎去密信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罗青长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报》撰写的《情深意重 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一文中,写道:“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总理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将军……”

罗青长长期从事对台工作,了解许多对台工作的内幕,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在文中特别提到的“当时我在陪”,更是令人毋庸置疑。

那么,传递密信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在中共中央文献档案中找到了直接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时间证明,这份档案全文如下: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这份档案的准确时间为1961年5月31日。从这份档案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它应该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且是总理在得到密信已转交到张学良手中的信息反馈后，向中央做的汇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受总理委托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总理，同样，总理也会将事情的经过及时向中央汇报。由此来看，密信一定是在1961年5月通过安全渠道转到张学良手中的。

### 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

谁是密信的传递人？此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密信是由郭增恺夫人传递的。此说大多依据童小鹏的回忆：“1961年12月12日晚，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十六字短信，决定通过特殊渠道转交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信写好后，周恩来几经思考，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送信人选——郭增恺夫人。此后，郭增恺夫人不负众望将总理的密信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童小鹏此语一出，立即被史学家接纳。因为郭氏夫妇与周恩来及张学良夫妇皆有着很深的交情。郭增恺原为杨虎城17路军参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将当时关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西安救蒋时，郭作为宋子文的随员一同到达西安，协助宋子文做调解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很多工作，郭增恺由此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当时其夫人在香港居住，不仅能自由出入台湾，而且与张学良夫妇也有交情。郭增恺夫人作为双方均信赖的朋友，完成这一使命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与此说相去甚远，童小鹏的回忆至少有两点错误：时间和密信的传递人。关于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考证，而在前面我们提到的1961年5月31日的那份中央档案也明确提到“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

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根本未见郭增恺夫人参与此事的任何依据，这是其一。

其二，据同样作为知情人的罗青长回忆，明确提到张学铭夫妇是密信传递人之一。（见前页右栏第三段引文）

这样说来，至少张学铭夫妇、朱五三人曾参与了密信的传递。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学铭夫妇不具备到台湾送信的可能，是不是朱五将周恩来的密信亲手转交张学良？带着这一疑问，笔者走访了张学铭的儿媳吴量绩女士，却意外地获知，其实参与密信传递的人除了张学铭夫妇、朱五外，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参与了此事，而且就是这个人最终将总理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她就是现居台湾的朱浣筠。

张学铭是张学良同父同母的胞弟，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九一八事变后，张学铭携同妻儿到西欧、美国游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学铭由香港被迫回国，出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室中将主任、行



1999年张学良先生于家中

辍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等职。全国解放前夕，张学铭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学铭回到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深得周恩来的器重和信赖。

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的第六个女儿。朱启钤先生 1964 年病逝于北京，生前颇受周恩来的敬重和关照。朱洛筠不仅是张学良的弟媳，而且和赵一荻是中学时代的同学。

朱洛筠的五姐叫朱湄筠，人称“朱五小姐”。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马君武曾写过一首“赵四风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的打油诗，讽刺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的张学良，诗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湄筠。朱湄筠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张学良遭到幽禁后，朱光沐做了宋子文的秘书，当时住在美国，朱湄筠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在香港。

朱浣筠是朱洛筠、朱湄筠的第十个妹妹，当时住在台湾，她的丈夫卢志德是蒋介石的私人医生。朱浣筠夫妇都信奉基督教，跟蒋介石、张学良同在台北的凯歌堂做礼拜，朱浣筠有和张学良接触最为便利的条件，是能够与张学良直接接触的最佳人选。

据吴量绩女士回忆，1960 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北京宴请张学铭夫妇。席间，周恩来谈到如何花了好多的钱，找了好多的渠道、好多的人，都不能跟张学良接触上的无奈。希望听听张学铭的意见。张学铭略加思索，向总理提议，此事找他的夫人办最合适，并向总理详细地介绍了在台湾、香港的朱家姐妹情况。当时，周恩来听了张学铭的介绍十分高兴，马上拿出纸笔写下“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四句话十六个字。考虑到张学良的安全，行事严谨的总理并没有在上面署名。总理把这封寄托着他对张学良无限思念与关切情感的短信郑重地交给了张学铭，希望张学铭设法尽快将信转到张学良的手中。

此后，张学铭夫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

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在香港的朱湄筠。1961 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信交给妹妹朱浣筠，最后由朱浣筠将信安全送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 密信是通过什么方式传递的？

罗青长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周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他请张学铭夫妇到达香港后，再托台湾的友人将他的信装在口红盒里，到张学良夫妇经常做礼拜的教堂，趁人不备，交给赵四小姐，就说‘大陆方面的朋友有话捎给少帅’。”这一说法似乎跟以前大多数学者引用童小鹏的回忆如出一辙。此说认定郭增恺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总理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的手中。

但是，这一说法却被吴量绩女士否定了。

据吴女士介绍，从总理写信，到信送往台湾，期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张学铭夫妇接受周恩来的重托后，即以探亲为名前往香港和朱湄筠接洽、联络。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为谨慎起见，张学铭夫妇几次往返于大陆和香港之间，每次从香港回到北京，他们夫妇都要当面向总理详细汇报香港、台湾方面的情况，当时朱湄筠在香港因经营不善，生活十分拮据，张学铭夫妇每次到香港都带去很多钱，作为朱湄筠的活动经费。

经过充分的运作和筹备，1961 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妹妹朱浣筠。5 月的一天，朱浣筠将信夹在一本《圣经》里，带到了张学良、赵一荻经常去做礼拜的凯歌堂。在教堂做礼拜时，朱浣筠巧妙地靠近张学良，将事先准备好的《圣经》快速地递给张学良，在圣歌声中，张学良打开《圣经》，周恩来写的“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十六个字立刻映入他的眼帘。熟悉的字



体,关切的话语,加上特有的灵犀相通,使张学良马上意识到这封未署名的短信,一定出自周恩来之笔。张学良与朱浣筠二人均心照不宣。

## 五、关于密信的背后

在周恩来给张学良写密信的前一年,即1959年,蒋介石一方面迫于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自认台湾政局稳定,已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并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交给儿子蒋经国,张学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有限的自由。时刻关注张学良境况的周恩来早已从相关渠道获取了消息,总理认为这一松动是一个迹象和好的征兆,所以在信中有“前途有望,后会可期”之语。字里行间,充满对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期望。

其实,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身陷囹圄后,曾力阻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周恩来,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张学良这位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牺牲的老朋友,从未停止过争取张学良恢复自由的种种努力。

早在1937年1月10日,周恩来就曾致信刚刚幽禁中的张学良,表达了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极大愤慨:“自兄伴随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成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并嘱张学良“为国珍摄万岁!”

就在上面一封信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又致函蒋介石:“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未承召谈,只因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以俟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已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周恩来在做正面努力的同时,也不断通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等民间组织积极营救张学良,甚至每次与国民党谈判时,周恩来都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但始终未有结果。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

周恩来当面质问国民党当局:“现在强调国内团结,这使我想起一位对国内团结贡献最大的人,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张汉卿将军。他至今还没有获得自由。”同年,在延安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再次呼吁:“现在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予正当地裁决。在纪念‘双十二’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牵挂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情况。周恩来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张学良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6年,正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到张学良,他说:“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过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可见,周恩来无时无刻不把张学良的自由挂在心上。但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影响,周恩来为争取张学良自由所做的努力,始终未能如愿。

周恩来在他弥留之际,还不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躺在病床上批示的最后一份文件后面,接连写下“托!托!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萦绕在周恩来心头的仍然是对张学良无限的关切

我们知道,关于十六字密信,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张学良,他们在生前都未曾向外界透露过,我们当然无从了解张学良见信后的心情。但是近年来,随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不断披露,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和思念,溢于言表。张学良在晚年从不讳言,周恩来是他一生最敬佩的人。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建立的这份特殊友情,虽历经岁月流逝、云天阻隔,始终难以割断,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责任编辑 萧 徐)

# 清朝北洋舰队 两次访日

● 史春林

广大读者对中日甲午海战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对此前北洋舰队两次访问日本并不是十分了解,实际上北洋舰队这两次访日无论是对清朝海军还是对日本海军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政府认为“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因此对日本十分关注和警惕。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北洋大臣李鸿章也认为:“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为此北洋舰队在筹建过程中以及成军之后曾有过两次引人注目的访日活动。

## 一、第一次偶然造访

19世纪80年代朝鲜半岛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国际纠纷,日本、英国、俄国都有占领或控制朝鲜的企图。1884年12月日本策动所谓的“甲申事变”,试图推翻当时亲清的朝鲜政府,替代清政府而成为朝鲜的保护国。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南下威胁其在华利益于1885年4月占领了朝鲜南端的巨文岛,结果遭到俄国和日本的反对而作罢。1886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说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在觊觎元山口外的永兴湾。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鲜落入它国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借以展示清政府强大的海军实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力,制止敌国可能的侵略企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又奉命前往海参崴接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澂。北洋舰队将吴大澂送至摩阔崴,留下“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铁甲舰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4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不料竟酿成一场骚乱,被称为“长崎事件”。

1886年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目睹,因此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夹杂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个别水兵则跑到妓院嫖娼而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造成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受轻伤。当时《长崎快报》报道说:“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

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1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英国驻长崎领事在一份报告中则称:“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李鸿章后来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水兵的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容。在李鸿章看来,在当时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15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丁汝昌鉴于前日的冲突严防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水兵遭到日本警察有预谋的袭击又发生大规模冲突,结果双方死伤80余人,其中中方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本。当时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事后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的途径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开始日方态度强硬,中方也不甘示弱,甚至在中方谈判者中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谈判最后延至1887年2月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彼此让步才算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抚恤: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此核算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在交涉中李鸿章深信此事错在日本:“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

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是非曲直显然,中国“断无不坚持到底之理”,而“日人自知理短,断不敢再生事端,贻人口实”,通过据理力争总算为国人挽回了一点面子。

“长崎事件”虽然得以和平了结,但在日本当局的挑动下其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的情绪却因此被煽动起来。日本朝野的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浓厚,当时深受刺激的日本海军由此出现一句流行话:“一定要打胜‘定远’。”在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之下,甚至连天真幼稚的小学儿童也开始玩起了打击中国军舰的游戏:即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李鸿章把北洋军舰送到日本修理本来就含有威慑的意图,却没想到竟如此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日本朝野拼命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也由此被煽动起来。日方鉴于清朝军舰“定远”号、“镇远”号外观新颖,威力强大,深感力不从心,从此之后不断增加对海军的投入,加强舰队建设,务期超过中国。1887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的贵族和富豪无不为天皇资助海军建设的行为而感动也都竞相为海防捐款,至9月底捐款数就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88年和1890年日本又提出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这两次扩张案共购买或建造了“千代田”号(2439吨)、“吉野”号(4160吨)、“秋津洲”号(3172吨)巡洋舰、“八重山”号(1584吨)通报舰。其中“吉野”号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由于日本军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了北洋舰队。对此情况,清廷官员也曾电告北洋水师注意,但李鸿章认为,“倭人治海军,筑台垒,或以欧西将有变局,预为巡防”而已,对日本海军发展的这一新动向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致在北洋水师建成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墨守成规,没有太大的发展。

## 二、第二次正式访问

1891年俄国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之后把触角进一步伸向远东,图谋把势力范围扩大到朝



鲜,以获得防御英国北上的前沿阵地,此举使俄、日矛盾进一步加深,因为日本也是首先确立了侵略朝鲜作为日后扩张的跳板,故而对俄国的做法极为不满。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对俄、日的这种企图与矛盾尽收眼底,为使清政府的传统保护国朝鲜不落入日本人的手里,遏止日本人的扩张,他们提出“联络外交,整顿海防”,实行外交与军事互为表里的国策:即在外交上继续坚持对朝鲜的保护权,在军事上通过展现清政府强大的海军力量来显示其在该地区和海域的影响以树立其威信,威慑日本以消除其染指朝鲜的野心和制止其可能的侵略企图,也就是所谓的“建威销萌”之策。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在国内制造积极扩充海军战备的舆论,并对中国舰队作战能力进行摸底,在1891年特别邀请北洋舰队正式访日。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大臣李鸿章得意洋洋,在他的亲自安排下,1891年4月21日北洋舰队在完成了给俄太子护航的任务后,稍作休整便应日本邀请按计划于6月26日由丁汝昌提督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卫出发起程正式访问日本。舰队在出发前,李鸿章鉴于上次“长崎事件”,曾电饬丁汝昌要严加管束。6月28日北洋水师编队到达日本马关,次日开赴神户。7月1日抵达神户,舰队在此加煤添水后按

预定计划直驶横滨。7月5日下午3时抵达横滨港,北洋舰队随着旗舰“定远”发出的旗号变换队形驶进港口,“定远”舰鸣21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方面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也鸣21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丁汝昌和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观看北洋舰队的感受:“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日本记者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不久有经验的日本军官则看出了北洋舰队的缺陷:大炮没有擦干净,并且像洗衣坊一样晾晒衣服,这说明北洋舰队在军械保养以及军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日本方面对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到来竭尽礼

仪之能事,所到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迎接,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得“礼意其隆”,希图以此表达对华的“亲善”之意。7月9日日本方面还特地安排了天皇在东京接见了丁汝昌和北洋各舰管带,礼仪非常隆重。7月10日日本外相夏本武扬在东京小石川的后花园举办游园会,招待北洋舰队将领。日本海军方面也以招待会的形式招待北洋官兵,特别是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专门举行了欢迎宴



停泊在威海卫港的北洋舰队

会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而清政府也表现出一个传统礼仪之邦的风范作出了必要的答谢,力表“两国同文共域之邦交谊日亲”,并对两国日增之友谊感到十分“欣悦”。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旗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通过这一活动,北洋舰队在礼貌地答谢日方接待的同时,再次向日本人炫耀了它的威容,但对日本来说又是一次很深的刺激。当日本朝野人士参观完日本暂缺的7000吨级“定远”、“镇远”舰后普遍感到羞惭,这两艘军舰铁甲之厚、炮火之强极大震慑了日本人,诱发了日本国内的惊恐情绪。曾登上“定远”舰参观的日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事后记述道:“‘定远’号放出小艇迎接,先登‘定远’号。丁(汝昌)、李(经方)两人在舰门迎接来宾,一一握手。随即由向导带领巡视舰内上下各室。巨炮4门,直径1尺,长25尺,当时我国所未有。……舰内清洁,不亚于欧洲。中午12时进午餐,下午1时半离舰辞别。此时,鸣礼炮21响送行登陆。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看来这件事对日本当局刺激不小。日本舆论也大力渲染日本国内“对强大的中国的舰队的威力感到恐怖”的社会心态,如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感叹道:“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北洋舰队在横滨港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后,丁汝昌率舰队前往长崎访问。8月4日离开日本回国,8月11日返抵威海,至此历时40余天的北洋舰队访日计划全部完成。

此次出访与上次不同的是出访者对日本近年来海军的快速发展深感吃惊,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力陈中国海军战斗力不如日本海军完善,因此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已刻不容缓,而丁汝昌则认为中国海军规模相比日本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是以前所购置的舰船经历多年已有不少落伍,机器也有运转不灵者,同日本新式快船相比相距已为遥远,且快炮未备,一旦有事恐难支撑,为此请示增购舰炮船只以备防御。但在日本风光一时的北洋舰队出访归来却迎

来了当头一棒,清政府户部以经费短缺为由压缩海军经费,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和械器,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拨给,北洋水师官兵听到消息后纷纷向提督丁汝昌建议请清政府收回成命,丁汝昌虽然把官兵意见汇报给李鸿章,但也无济于事,至此北洋舰队的东洋之行完全演变成了一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悲剧。在后来的若干年北洋水师并没有多大改观,中国海军发展进入了停滞状态,以至于在力量上与初建时并无多大变化。

相比之下日本则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对日本朝野产生了巨大震动。北洋舰队的规模巨大、整齐划一和“强壮武勇”的外观给日本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使日本看到了北洋水师的实力。另一方面北洋舰队访日本身又给已把中国作为头号假想敌国的日本政坛和军界以极大的刺激,认为必须加速日本的海军投入,把建设一支足以对付北洋水师的海军作为其“最高命令”。深受刺激的日本随之掀起了超常加速扩充其海军军备的高潮。就在日本天皇接见北洋海军管带的前一天,日本松方内阁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支出方案,计划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892年日本新上台的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该计划在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1893年日本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尔后6年中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到这一年,知耻后勇的日本海军已初具规模,共有各种军舰55艘,弹药储备超出了一次对华战争的可能消耗掉的数量,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以和北洋水师相抗衡的远东海军力量。

在激烈的海军竞争中,一边是装备一流的舰队但却如强弩之末,而另一边虽为二流舰队却是日趋强盛之势,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在前些年里所积成的海军发展优势,基本上被从后边穷追不舍的日本海军拉平了。1894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正面较量中首败于丰岛海战,再败于黄海海战,三败于威海卫而全军覆没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

(责任编辑 李 晨)



# 毛泽东与秦腔艺术

● 杨步均



毛泽东接见陕西省地方戏演员

陕甘宁边区很有名的云南籍诗人柯仲平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并展开了细致而深入的工作。在寻觅人才的过程中，他获知延安师范学校有一位老师叫马健翎。此人能编会唱，酷爱秦腔和眉户艺术，同时还领导着一个以学生为主的“乡土剧团”，经常编写一些秧歌剧或秦腔折子戏，在不同场合下演出。柯仲平如获至宝，很快约见了马健翎。当柯仲平谈起想组建一个新型秦腔剧团时，马健翎十分激动，他说早有此愿，特别是当得知这是毛泽东指示时，更加坚定了实现此愿望的决心。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剧的演出，在场观众情绪很高，掌声不断。毛泽东向坐在身边的工会负责人毛其华说：“你看，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欢迎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毛其华指着坐在毛泽东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的老柯，他是专门搞文化工作的……”毛泽东转身亲切地问柯仲平：“是不是应该搞啊？”柯仲平（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席）肯定地回答说：“应该，应该。”并坚定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

从第二天起，柯仲平就四处奔走，招人筹资，决心创造一个以古老秦腔艺术形式，反映红军将士和劳苦大众生活的艺术团体。

20世纪3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十分艰难，要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困难是很大的。但是，在

在组建剧团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派人送来了300块银元，极大地解决了建团的燃眉之急。经柯仲平、马健翎和另外几位同志反复研究后决定，剧团的字定名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显示永远为民服务的决心。剧团建立了必要的机构和章程，柯仲平任团长，马健翎任副团长兼剧务主任。

1938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第二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决心把强盗赶出中国去。抗战！抗战！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华民族！这是时代的呼声。民众剧团结合这一形势，在很短的时间里，赶排出了一批秦腔现代短戏《好男儿》《一条路》《回关东》等。这恐怕算最早用秦腔艺术，讴歌人民战斗、生活的剧目了，也是自毛泽东指示后第一批秦腔现代戏的处女作。

《好男儿》描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郑二虎被日军俘虏后，遭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后来抗



日联军打进县城救出了郑二虎，全歼了县城的日伪军。此剧主题鲜明，短小精悍，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和唤起人们奋斗感染力。《一条路》和《回关东》同样是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抗击日寇侵略的故事。1938年7月4日，在延安天主教堂公演时，极大地轰动了延安县城，秦腔艺术经更新内容后，得到了观众的真心喜爱！1938年秋，马健翎编了一个话剧叫《国魂》，此剧是反映党的统战政策的：共产党号召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冬天，此剧首次在抗日军政大学演出，毛泽东也亲临现场观看。戏演完后观众普遍反映说，故事曲折，情节动人。毛泽东当晚就接见了马健翎，说：“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你能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马健翎很快把话剧《国魂》改成了秦腔。当此剧再次以秦腔形式演出时，毛泽东又一次观看了演出，非常高兴，并拍手叫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写信给柯仲平，信里说：“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让他把秦腔《国魂》改名为《中国魂》。”从此，《中国魂》以秦腔形式在延安演出，很受人们欢迎。

1939年2月，民众剧团离开延安，深入陕北边远山镇作巡回演出，除了秦腔外，还有少量眉户和秧歌剧。陕北当时虽为老解放区，但人们能以秦腔艺术接受抗日救国理论，这还是首次。这次巡回演出，行程约1200公里，所到城乡三十余处，在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

1943年秋，张闻天通知民众剧团，毛泽东要接见柯仲平和马健翎，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抗战剧团的负责人杨醉乡。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毛泽东会见三贤”。毛泽东说：“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很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民众剧团是在物质和创作极困难的条件下诞生的。你们编演的秦腔《好男儿》、《一条路》等剧，既是大众性的，也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的作风和气魄，体现了中国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和对戏曲界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的接见，极大地鼓舞了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一批优秀的音乐、诗歌、戏曲及文学作品相继诞生。1943年及随后几年里，马健翎和他的战友们先后编导了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穷人恨》《一家人》（又名《保卫和平》）和秦腔古装戏《鱼腹山》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6年10月，中共中央为欢迎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战员从中原解放区回到延安，周恩来副主席特指定民众剧团在欢迎晚会上演出《一家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陪同王震一起观看了演出。第二天毛泽东写了一封表扬信，让宣传部转交柯仲平，向民众剧团全体人员宣读。

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彭德怀和王震曾多次观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穷人恨》《一家人》等，并亲笔写信给民众剧团全体人员，表示赞扬和提出希望。解放军不少指挥员在战前动员会上，经常组织官兵观看《血泪仇》《穷人恨》等戏，为启发革命斗志，英勇杀敌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毛泽东说：“秦腔是对革命有功的。”

从1938年毛泽东提议改进秦腔艺术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深受西北人民热爱的秦腔艺术，经多年的不断改进完善，已经开辟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已有了正规的学院和学校，还有不少学者从理论到未来的改进与发展作深层次的研究。毛泽东早期对秦腔艺术的关怀与支持，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责任编辑 李 晨）



秦腔现代戏《血泪仇》剧照

# 印尼华裔音乐家黄武殿

● 苏 明

2003年3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大丛山佛堂。这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寿筵，祝贺华裔音乐家黄武殿先生的80大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陈怀之先生到会祝贺。会上宣读了卢树民大使(陕西三原人)的贺信，称颂武殿先生为繁荣印尼的音乐事业、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祝愿武殿先生健康长寿！

大丛山佛堂是印尼华裔所建的号称全国最具规模的佛教寺庙，该寺庙的慧雄法师颇晓音律，精通印尼文、中文，是黄武殿的知音。这天到会的音乐界、政界人士、学生和合唱团成员等约千人，由慧雄法师安排合唱团演唱黄武殿先生创作的歌曲。祝愿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004年3月11日。距前一年的祝寿活动仅差3天就满一年，在雅加达的阿默渣雅殡仪馆，参加者有20多个合唱团和文艺界、宗教界人士，很多是前一年参加祝寿的“原班人马”，但举行的是肃穆庄严的黄武殿先生追悼大会，令人感叹世事难料，人生无常。追悼会上演唱了黄武殿作曲、李焕清作词的《印中友好万岁颂》。

2004年3月8日，我在西安家中先后接到两个印尼电话，同一内容：老友黄武殿先生当天上午病逝于雅加达。噩耗传来，为之怅惘良久。随后远在温哥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林祥园也打来电话，谈了近一个小时的黄武殿。过几天香港也转发来由印尼李焕清先生写的追悼文。

我认识黄武殿始于1948年。其实我们都是印尼棉兰市苏东中学毕业的，是校友。可他是二战前毕业，我是二战后毕业，他算是我的“学长”。1948年我们都在苏东中学附属第一高级小学教书。在教务室里我俩桌对桌，面对面，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后来又在棉兰市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艺歌咏队

共事，为这个歌咏队的“向左转”走向新生而努力。1951年底，我准备背家私逃，回国到北京上大学。他知道我经济困难，曾和林祥园一起，帮我筹集了部分经费。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是在2003年9月21日，我们是参加印尼苏岛华侨抗日“九·二〇”事件60周年纪念会而聚集在香港的。那天晚上，他和甄绿荷女士到酒店话别，恰巧崔前礪、周芸夫妇也来，挤坐在我那非常狭小、灯光黯淡的房间里，追忆往事，很有“昏昏灯火话平生”的意境。我们酝酿着由武殿口述录音，周芸执笔协助他写传记之事。武殿是印尼华裔音乐界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大名鼎鼎，他刻苦自学音乐，最后取得成功的经历值得传世。那天我们谈到午夜才惜别。可惜此一有意义的工作还未开始，武殿遽尔仙逝。

这几天，我整理多年来武殿给我的信件、照片、歌曲集、歌曲磁带、节目单、报刊等等，一大堆。想一想我总该写点东西吧，不只是为了纪念他，为老友保留一点资料，也许还有为印尼华侨华人史积累点材料的意义。于是乎命笔。

黄武殿于1925年阴历2月12日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棉兰市，祖籍福建南安。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称“荷属东印度”。黄武殿自幼聪明，但家境不佳。小时曾清早沿街叫卖糕点，贴补家用，再上学校读书。自述从8岁起就很喜欢唱歌，把当时流行在海外的黎锦晖歌曲如《可怜的秋香》、《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等全唱完了。上高小时曾因撬开琴锁，偷弹全校唯一的凤凰牌脚踏风琴而被记大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几个回国升学的小伙子黄源尹、黄生通、洪云龙回到棉兰。他们三位长于歌唱，当年的中国驻棉兰领事馆在本馆礼堂为他们举行演唱会。垂髫少年黄武殿从礼堂后的小巷偷偷爬上窗子，听了两个小时。他还记得印象最



深的两首歌曲是聂耳的《打长江》和任光的《渔光曲》。

他在苏东中学上初中时更沉迷于音乐, 音感很敏锐, 颇有“入耳不忘, 出口成曲”的本事, 成天满脑子里都是飘来飘去的音符旋律的排列组合。但其它功课不好, 又以顽皮爱打架闻名全校, 是个“问题学生”。初中毕业后因家里困难, 无力继续升学。随后参加了由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波德威夫人在棉兰组织的“中华合唱团”, 对他来说不啻进入了音乐殿堂, 几年时间, 他大大开阔了音乐视野, 不但受到了初步的声乐训练, 甚至可以说对他一辈子音乐生涯起了良好的奠基作用。当年“中华合唱团”的台柱人物有在抗日战争中回国, 在国内颇享盛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黄源尹, 有在 50 年代享“棉兰歌王”之称的黄文湘, 有著名的女中音王御凤等等。日本南侵占领印尼时期(1942—1945), 这些文艺活动全都停止了, 我们听到的只有连唱带吼的日本国歌和日本军歌。

战后印尼独立, 华侨社团又纷纷成立。黄武殿和一些热爱歌咏活动的朋友(好些是原来“中华合唱团”的成员)组织了“学艺歌咏队”。它和先后成立的新中国剧艺社、昆仑歌咏团、海风社等等都是当时棉兰市的著名文艺团体。尽管这些团体刚成立时各有不同立场, 但到 50 年代初都汇聚到爱国的棉兰华侨总会旗帜之下, 它们为棉兰市华社培养出大批堪称后起之秀的文艺骨干。

50 年代的黄武殿既是华侨总会的文娱主任, 又负责印中友协的文娱部。他曾参加接待以郑振铎为团长到印尼演出的中国文化代表团。1959 年他作为合唱指挥和男中音独唱演员参加印中友协文化艺术团到中国、朝鲜、越南作为期 40 天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回到祖国。这时的武殿工作

十分带劲, 意气风发。可是他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当推 60 年代前半期。1960 年他组织并任指挥的“英勇前进合唱团”在印尼颇有名气, 有人称之为“总统府合唱团”。由于水平高, 自 1962 年至 1965 年, 印尼节庆日及招待国宾(如刘少奇、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米高扬等)的演出, 大多有该合唱团的节目, 有时还派专机接送。黄武殿也得到爱好音乐、美术的苏加诺总统的器重。据他说, 他的印尼文名字“Uddin Wijaya”中的“Uddin”就是苏加诺总统给他起的, 音近“武殿”; 而“wijaya”是梵语、古马来语, 意为得胜、凯旋。其第一音节“wi—”音近闽南语“黄”的发音, 姓黄的华裔多采用“wijaya”为其印尼姓。1965 年 4 月, 他获得由苏加诺总统亲笔签名的印尼文化艺术一等奖勋章(WIJAYA KESUMA), 以表彰他为印尼民族事业特别是音乐艺术事业做出的贡献。据说自印尼独立以来获此殊荣的只有 6 人, 黄武殿是唯一的华裔人士。此次获奖为印尼华裔争得了荣誉, 也为他自己的音乐生涯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5 年 8 月, 他随印尼歌舞团出访, 预定到非洲、东欧作为期 40 天的访问演出。在肯尼亚, 他曾登上非洲最高峰, 海拔 5895 米的乞力马扎罗火山群。这似乎也象征着他音乐生涯获得的荣誉已登峰造极。好景不长, 接下去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 政权更迭, 苏哈托总统上台, 歌舞团原定赴东欧演出也临时取消了。印尼国内取消华校和华



黄武殿(前面穿黑色西服者)和他的印尼华裔合唱团



裔社团,社会生活中不许用华文华语。此后一段时间黄武殿浪迹海外,从事商贸谋生。音乐方面的活动似乎慢慢转向作曲。风波过去后他定居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写歌曲必须有歌词。除印尼文歌词外,黄武殿也需要中文歌词。那个时期印尼严禁中文书刊入境,但通过第三国转寄普通书信还是可以收到的。1985年他写来一封信,建议我们合作,我写歌词,他配曲。我已久疏此道,敬谢不敏。但先后引荐了陕西几位优秀的歌词作者如郎太根、党永庵、王军道给武殿提供歌词,武殿据此谱写了几十首中文歌曲。这些歌曲中有好些题材和陕西有关,如《我漫步在黄帝陵前》《游子归国看秦俑》《华山含笑迎客来》等等,此后黄武殿来陕西的次数就多了。老归侨、他的当年棉兰市苏东中学的“老学妹”苏文女士(原名郭攀凤)时任陕西省古典乐团团长,又是著名的《仿唐乐舞》最早的创意者和总编导,这就为黄武殿歌曲的配器、试唱创造了很方便的条件。我记得有一次我陪武殿在省歌舞剧院内,由武殿自弹钢琴伴奏,女高音歌唱家于淑荣(以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闻名)试唱黄武殿曲、郎太根词的新作《妈妈就在你身旁》。唱了一段,武殿忽然把头伏在钢琴上放声大哭。我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把他拉起来。他定了定神,为他的失态道歉,对于淑荣说“我没有想到你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好”。这首歌曲1988年荣获上海《华声曲》金龙奖。

1997年元旦,在北京21世纪大剧院,他和党永庵合作的《长江黄河拥抱香江》,和王军道合作的《妈妈窗前的丁香》荣获迎接1997香港回归作曲奖。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材选用了他的作品《故乡常在我心上》《但愿不是在梦里》和《我爱你妈妈》。90年代,中央广播电台的“海外”和“九州彩虹”节目中,曾多次播放他的歌曲。陕西出版的《音乐天地》也选刊过他的代表作。

黄武殿还创作了大约40首佛教歌曲,印尼文、中文歌词都有。一些歌曲是和印尼慧雄法师合作的。其中《炉香礼佛》和《回向偈》经印尼宗教部佛教司认可,作为印尼佛教徒举行仪式时的规定佛曲。他曾应印尼体育及青年部要求为晨运体操配曲(包括太极18式及24式等),广播全国,于1987年获该部奖励。

印尼李焕清先生对黄武殿的歌曲作了很全面的总结:他的歌曲“宣扬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赞颂它繁荣富强,体现了对祖籍国的情怀”。“号召增进印中人民友谊,促进世界和平,表明了他的国际主义崇高思想”。“教导世人做人的哲理,莫作恶行,显示了他的高尚情操”。

黄武殿究竟创作了多少歌曲,恐无确切统计,应当超过200首。他给我的一封信上曾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他的作品中能有,哪怕只有一首歌曲,能像贺绿汀的《嘉陵江上》那样传世不朽。我想他的这一美好心愿,只能靠时间的流逝去检验和实现了。

1987年清明节,黄武殿应陕西省侨务办公室邀请参加公祭黄帝陵大典,和其他海外前来祭陵的贵宾们住在西安协和酒店。祭陵前一天下午,前棉兰苏东中学校长、后定居澳门的梁披云老先生在大堂喝咖啡。突然武殿走到梁老跟前,深深一个九十度鞠躬:“梁校长,您还认得我吗?”梁老略一端详,语出惊人:“你是黄武殿。”我们在座的都乐了。相隔半个世纪没有联系,黄武殿从垂髫之龄到年过花甲,梁老为什么还能认出武殿?他说:“最好的学生和最差的学生我都印象深刻,黄武殿差点被开除。”

祭陵后,作为著名诗人、书法家的梁老挥毫写下了一首七绝《桥山瞻拜》,黄武殿连夜谱曲,师生合作愉快。

1996年12月28日,在西安音乐学院的演出厅举行了一场“印尼华人作曲家黄武殿先生声乐作品音乐会”。黄武殿率雅加达绿鸽子合唱团远道赶来参加。演出上半时为男女声独唱,由陕西几位著名歌唱家丁毅、安金玉等演出;下半时为合唱,特邀陕西省师范大学艺术系合唱队担任。管弦乐指挥及音乐总监为原西安音乐学院院长刘大冬教授。棉兰苏东中学校友(也是黄武殿的学生),曾在意大利学习声乐,现居美国的蒋金花女士也不远万里,专程前来参加盛会,并登台演唱了两首恩师的作品。武殿那晚非常激动,演出结束他登台和听众见面,并用他那不太标准,有点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即兴朗诵了一首歌词(有人称之为《归侨之歌》):别说我是离枝的落叶/那样我会心里难过/祖国,我是归来的星光/悄悄地悄悄走进你的夜色/如果你的夜空/多了一颗小星/那就是默默

的我 / 那就是默默的我 / 我将挽起满天的星斗 / 把黎明迎进我的祖国。

尽管自学成材,黄武殿始终以自己未能接受正规音乐教育为憾,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除长子务商,幼子在德国学工程外,次子黄胤灵毕业于德国柏林音乐学院,专业是指令和钢琴;长女是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次女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钢琴系。黄胤灵和小泽征尔、汤沐海被誉为在欧洲的亚裔三大名指挥,1991年曾应邀到中国 and 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1992年应邀到

北京和中央交响乐团合作,为纪念莫扎特逝世200周年演出;1993年应邀到台北指挥大型古装歌剧《万里长城》。黄胤灵在音乐上的成就或许青胜于蓝(我相信这是令武殿含笑九泉的),但对华社的影响和贡献,要赶上老爷子,还需继续努力。中国名指挥李德伦曾题写大幅扇面赠黄胤灵:“双臂挥出大千世界,音符抒尽万种情怀”。此一题词对父子俩都合适。

愿武殿安息。

(责任编辑 李 晨)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历史转折的前奏》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决策揭开了回春的历程。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其从复苏趋向繁荣的历程,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作者披露了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件的内幕,及新时期文坛从队伍建设到方针调整等诸方面的来龙去脉。作者致力于收藏未曾刊布的文坛名家书札和档案材料,及对诸多文坛老前辈的采访,因而使本书材料鲜为人知,丰富可信。

《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的英豪们,他们与第一条战线上人民解放军英雄一起,怀着对真理、对理想、对光明未来的真诚追求,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壮丽诗篇,他们托起地狱的闸门、帮助万千受难者逃出地狱,而他们的许多人却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 价    | 邮 费  |
|----------------------|-------------|--------|------|
|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 冯建辉         | 16.50  | 5.00 |
| 历史转折的前奏              | 程中原 夏杏珍     | 38.00  | 6.00 |
| 苏共亡党十年祭              | 黄苇町         | 22.00  | 5.00 |
| 刘少奇蒙难始末              | 图 们 祝东力     | 17.00  | 5.00 |
| 人民公社兴亡录              | 宋海庆         | 36.00  | 6.00 |
|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 邓 野         | 29.80  | 5.00 |
|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 吴 思         | 23.80  | 5.00 |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 戴 煌         | 28.80  | 5.00 |
| 斯大林(上中下册)            | 德安沃科戈诺夫     | 78.00  | 8.00 |
| 动荡岁月秘闻               | 温乐群等        | 72.00  | 9.00 |
| 扛起地狱的闸门              | 丁 群         | 21.00  | 5.00 |
| 张闻天年谱                | 张培森         | 65.00  | 8.00 |
|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 郭汝瑰 黄玉章     | 68.00  | 8.00 |
| 第二次宣言                | 王小平         | 28.00  | 5.00 |
|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 徐庆全         | 24.00  | 5.00 |
|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             | 徐庆全         | 24.00  | 5.00 |
| 再生中国——               |             |        |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 李 艳 熊志勇     | 44.80  | 7.00 |
|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 范 硕         | 36.00  | 6.00 |
| 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 丁兆甲         | 26.00  | 5.00 |
|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             |        |      |
|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 图 们 肖思科     | 28.00  | 5.00 |
| 李锐其人                 | 宋晓梦         | 28.00  | 5.00 |
|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             |        |      |
|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 王 安         | 26.80  | 5.00 |
| 我向总理说实话              | 李昌平         | 23.00  | 5.00 |
| 我向百姓说实话              | 李昌平         | 20.00  | 5.00 |
|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 林 希         | 25.00  | 5.00 |
| 中国人物年鉴 2003          |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 168.00 | 7.00 |
|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 戎向东         | 29.80  | 5.00 |
|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 张国华         | 28.00  | 5.00 |
| 中国改革开放史              | 朵生春         | 66.00  | 8.00 |
| 陋室漫笔——不该忘记的人和事       | 靳树鹏         | 21.80  | 5.00 |
| 庐山会议实录               | 李 锐         | 18.00  | 5.00 |

# 我收藏的《共产党宣言》

● 张贻贝

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说：“古今中外都有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我藏书不多，读书更少，但我爱书，尚未进入“如命”之境。由于陈望道先生于1920年翻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激发了我收藏《宣言》版本的热情。从首译本至1998年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纪念版本，现共有12种不同的版本。

每一个版本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故事。首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灰蓝色印刷，正中印有马克思半身像，上边从右到左，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像下边，还印有“马格斯”字样，共56页，内文用5号繁体铅字竖排印刷，版权页从右到左为“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经考证，初版是同年8月，封面将“产党”二字颠倒，错版封面赭石色，估计发行量有限。错版《共产党宣言》较完整的一本珍藏在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现已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并作专门技术保护处理。

翻译《共产党宣言》，“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文修养兼得之士才能承担”。在邵力子先生的举荐下，陈望道先生担当此重任。陈先生以“唯准确为本，唯流畅为要”，“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将这部伟大的著作译成中文”。《宣言》译

稿经过“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校阅”，又送到“既懂英、日文，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研究的陈独秀手中，请陈独秀再行校看”，而后出版发行的。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陈望道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20年，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就便寄给鲁迅先生。”鲁迅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倍加赞扬，读过之后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时经八十春秋，社会动荡，战乱连绵，革命战争年代的“禁书”保存至今也非一件易事，我有幸收藏了它。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全译本，据有关资料，便是1930年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华岗先生的译本。我案头由华岗译、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印行的《宣言》是1932年第三版。这是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赠我的重印本。我能读到这个版本，非常感谢史若平、周忠雅、曲凤官诸位老先生。华岗先生是我们敬重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一生为革命和学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不幸的是，“华岗一生两次入狱，第一次5年，第二次达17年，共22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华岗在由上海去东北赴任中共满洲特委书记途中，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狱中关押5年之久，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党营救出狱。“1955年秋，华岗校长在



反胡风集团和肃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1972年,华岗病死狱中,终年69岁,1980年得以平反昭雪”。我读史若平先生这篇文章为之动容,每想起华岗先生一生22年的监狱生活,心情无法平静。华译本《宣言》尘封半个世纪,很少有人知晓,同样是悲哀。我怀着对华先生的崇敬,收集他的著作,已见成效。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收藏到他译《宣言》的原版本。华先生的译本比陈先生的译本多了三个序言,即1872年、1883年、1890年三个德文版序言,是首次同我国读者见面。译本的结尾句,华译“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陈译“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即有明显的区别。

我还藏有博古先生署名《共产党宣言》的三个不同版本,其中两个版本署“博古译”,一个版本署“博古校译”,都是建国前的版本。译文无差异,应视为一个版本,而在《宣言》出版史上则是第三个中文全译本。有文章介绍早于博古译本的是1938年成仿吾、徐冰二人合译的《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成仿吾先生在1978年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译后记中写道:“1938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我与徐冰把它撕成两部分,我拿了前半部,徐拿了后半部……译出来后,我把全部译文通读了一遍就交了卷。约一年后,我在前方看到《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

我很不满意。”看来,成、徐二人的译稿是经人校改过了。成老说的这个版本是否就是署名“博古校译”的版本呢?有待于专家考证了。博古“或者把既有的译本重新加以校改”,确有其事。博古先生“精通俄文、英文。历年以来,于工余之暇,从事翻译”。博古夫人张越霞女士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博古“不仅能够翻译马列主义一般著作,而且还能翻译列宁同志的古典作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博古先生的译本有四个序言,比华译本增加了“一八九〇德文版序言摘要”。封面有的红色,有的草绿色,有套有马克思、恩格斯木刻侧面头像的,有镰刀、斧头镶嵌红五星图案的,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设计印刷做到如此精美,让人赞叹!

《宣言》第四版本,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我收藏的这个版本,道林纸封面,四边粗细双线作框,上方是马克思、恩格斯铜版雕刻侧面头像,中部套红印红五星和“共产党宣言”字样,下边印“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没有版权页,内页有一幅马克思半身像,一幅恩格斯半身像,还有一幅“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版本封面”影印,扉页有出版局声明,序言增至七篇。为什么要这么多序言呢?彭真委员长有段精辟的论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序,里边有很多重



本文作者珍藏的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要的思想,那是因为《宣言》是历史文件,不能改,只能通过写序补充”,“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译文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

以上四个版本都是解放前翻译的版本。

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于北平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莫斯科版本,以后多次出版、重印,也是根据这个版本,直到1958年。这是第五版本。版本内页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幅像,增加一幅“共产党宣言,草稿这一页”影印。这期间,我收藏了两个版本。

尔后,中共中央编译局分别于1958年8月和1964年9月两次对《宣言》重新校译、校订,即是第六、第七版本。1978年,成仿吾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5万册,已是第八版本了。在此,值得称赞的是成老的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据成老回忆:1929年,在柏林的翻译稿,因种种原因“石沉大海了”;1938年和徐冰二人的翻译稿有人修改了,“很不满意”;1945年对《宣言》作较大的修改,但完稿后交给了解放社,“译稿也没下落了”。近半个世纪,成老先后四次翻译《宣言》,直到满意为止。

《宣言》第九版本,也是我国迄今出版的最新译本,由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8年为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出版的纪念版本。这个版本直到2003年春我托友人从北京购来,欣喜不已。这个版本装帧设计精美,枣红色封面,硬书套;封面书脊烫金,内容编排独特,如文本前选用国画艺术大师蒋兆和先生于1954年绘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幅肖像,使版本大为增辉。蒋先生是位善于把西画素描手法引入中国画的高手,并能汲取光影法刻画人物面部,但又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使得画像惟妙惟肖,生动感人。还有,让读者目睹《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德文第一版影印全貌和马克思手迹两幅,确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深沉。书后部分影印了各国《共产党宣

言》版本封面25幅,异彩纷呈。其中,中文首译本初版和再版两个封面,饱含着编者的匠心和情怀。纪念版,是难能可贵的版本。

《宣言》经历了150年的历史,共有多少版本,发行量有多少?我手头缺资料。仅见“从1848年2月《宣言》发表,到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宣言》的译本共达30多种,再版达300多次。可以说是那时世界上译本最多、再版最多的一部著作。”这是对前70年的小结,后80年呢?我国的版本之多,发行量之大,也会让世人吃惊。足以证明,《宣言》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无与伦比的。《宣言》的出版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以及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七篇序言最能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第八篇序言应由中国共产党人撰写,这是责无旁贷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我国正处改革开放的盛世,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伟大的精神。

(责任编辑 李 晨)

## 名人传记(上半月)

### 一册在手 览今昔名人风采

- 百强**——蝉联两届国家新闻出版署评选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 十佳**——全国民间文摘研究会评为“全国被转载率最高的十佳杂志”
- 优秀**——荣获河南省1-5届优秀期刊奖
- 量大**——全国同类期刊发行量居前列

全国各邮局均可订阅 代号 36-80

月刊·大16开本·96页  
定价6元·半年36元·全年72元

出版: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市鑫苑路  
18号鑫苑名家11号楼)

邮编:450011

电话:(0371)5379196

您想知道在云谲波诡的历史关头,名人是如何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的吗?  
您想了解名人是怎样把握生命之舵驶向成功彼岸的吗?  
名人的失定会给您一份人生的启迪。



# 笑 话

##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八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幽默是外国货,笑话才是土产。不管笑话还是幽默,都是一种精神现象。

笑话,在古代亦称谐语,又叫谐谑。不管叫什么,说出来总要令人发笑。

怎么才能叫人笑?生理学家的回答是:血液从右心室经动脉血管流出,造成肺部突然膨胀,反复多次地迫使血液中的空气猛烈地从肺部呼出,由此产生一种响亮而含糊不清的噪音;同时,膨胀的肺部一边排出空气,一边运动了横膈膜、胸部和喉部的全体肌肉,并由此再使与之相连的脸部肌肉发生运动。这种脸部的动作再加上前述的响亮而含混的噪音,便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笑。这样的研究,或许说明了笑的生理机制,但并未对作为精神现象的笑,给予任何说明。

也有这样的研究:区分各种不同的笑。比如,孩子的笑、白痴的笑以及其他种种的笑。又比如,不同的人种在笑的时候,脸的宽度与颧骨直径之比有如何的不同。这样的研究或许也有某种学术的(比如人类学的或病理学的)价值,但也同样与精神现象关系不大。作为精神现象的笑的关注者,看到这样的研究,恐怕忍不住也会发笑。好在人各有志,正不必要求笑之研究舆论一律。

笑话是引发笑的媒介之一。研究笑话何以会引人发笑,或许是进入这一精神现象领域的通道之一。

作为笑话的接受者,我觉得笑话是内容与形式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一个人因感冒而打喷嚏不可笑,一个正在命令众人保持庄严肃静的人突然打了个喷嚏便会引起哄堂大笑。清正廉明的官吏在台上讲反腐败,不会令人觉得可笑;贪污受贿的行家在台上大讲反腐败或一人得道、鸡犬飞

升的人大讲用人惟贤,便产生了叫人发笑的效果。笑话就是揭示这种矛盾的一种文艺形式。揭示的矛盾愈深刻、愈普遍,它的效果便愈大。

揭示这种矛盾,需要勇气。如果不让人讲话,没有正常讲话的渠道,人们便以笑话出之。中国自古独多笑话,其因在此。王国维辑《优语录》,收唐宋两代优语五十条;任半塘作《优语集》,自先秦迄于民国,得三百五十余条,不少是出于优伶之口的笑话。帝王圣贤,达官贵人,种种可笑之事、可笑之人,均难脱其烛照。敢以笑话作武器,也是有大勇者。如果记载详尽,因为笑话掉了脑袋的,恐怕不会比直言强谏者少。

说笑话也要有智慧。高明的笑话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必有洞悉世态的智慧,才能一针见血。笑话引发的笑声,是对可笑事物的否定,其锐利有时更胜于正论。

有自信的领导者不禁笑话,而且有意从笑话中了解世情、观察民心。无自信的领导者视笑话如水火,必欲禁绝而心安。其实,消灭了笑话,并不等于就消灭了可笑之人与可笑之事。何况只要有这样的人和事,笑话就无法消灭。

中国的相声,是要说笑话的。笑话止于令人笑,不免流于浅薄。必也令人笑过之后要想,想过之后要哭、要叹息、要扼腕,方称高明。否则,笑话不过仅仅是个笑话而已。侯宝林先生到历代优语中寻找相声的源头,极有见地。丢失了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深刻内涵,欲求相声繁荣,得到的不过是空洞的回响。诗曰:

我本无心作笑谈,奈何世事总难堪。

古今优语知多少,留与后人仔细参。



# 登 摘 信 来 者 读

浙江省宁波市郑元良：每收到贵刊犹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一次精神美餐。为《炎黄春秋》年年有新进步，提个建议供参考：题材重复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只用其新意的部分，其余全部砍掉。要提高稿件录用的门槛，不管是谁，稿件只求新，不追求全面，为老话、废话、可有可无的话亮红灯。刊物有了质量便有了权威。届时作者将按照刊物的要求去写作，而不是刊物去迁就作者。至于内容基本是新的，但有些重复、有些无关紧要的话，编辑应该作必要的文字处理、删节，作者应该欢迎、忍痛割爱。

新疆乌鲁木齐市李景强《炎黄春秋》有炎黄子孙深厚的情感，用春秋笔法，讲述历史与现实。意气勃发，后人深思，臧否人物，切中肯綮。编创人员阅历深，有学识，思想新，扬正气，关注社会，自揽责任。《炎黄春秋》为人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宣扬了爱国主义思想，直面现实，与时俱进。

北京市潘德千：我是贵刊的老订户。近年来贵刊的分量越来越重，不仅在直面历史上有所建树，对当代问题也有相当深刻的反映。我离休多年，见闻不如在职时宽广，但我认为并相信贵刊在“反对封建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会作出贡献。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文章编印出版，因为这些文章实在是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学习和思考的。

山东省东营市丁贵春：编辑人员对书稿中的引文往往失之大意，以为既是括号中的字，是从别人那里引用来的，一般不会出错，因而在编校中失之疏漏，2004年（下同）第5期中就有二例：1.《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一文第61页右栏所引《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为该文所作的编者按，其中“吟音他激励人的……一类诗句”中的“吟音”二字应改做“吟咏”。2.《张闻天在五四时期的先见》一文第13页右栏所引河海大学的校歌歌词最后一句“毋负帮人期”，应是“邦

人”，邦人者，国人也。

广东省梅州市李义辉：第6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中“第一要闻”第一句话：“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个日期是错误的。历史事实是：美国人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是1945年8月6日投到日本广岛的，造成了几十万平民的伤亡。接着，美国人的第二颗原子弹，1945年8月9日投到日本的长崎，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北京市力平：第7期41页上载：“1954年，当时的燃料工业部派了一个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考察，刘澜涛副部长任团长。”据我所知，刘澜涛同志并未担任过燃料工业部副部长之职，应是“刘澜波”之误。

甘肃省兰州市牛兆奇：第8期第4页《怀念小平同志》中“当时筹建海南省的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之句，我认为当时海南省还未成立，不可能有省委书记和省长。这句话如果改为“当时负责筹建海南省的许士杰、梁湘（海南建省后分别任省委书记、省长）”，就符合实际了。第23页《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中的淤积量有误。应为：净总淤积量为55.66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6%，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4%。

更正错别字：第5期72页左栏第12行“人不知而不温”、13行“能无温人之心”，这两个“温”应为“愠”。第6期3页右栏3行“食不裹腹”应为“食不果腹”；18页右栏11行“陡黠”应为“陟黠”；54页右栏倒数6行“晒而教之”应为“哂而教之”。第8期35页右栏倒数10行“书于济南，书于北京”应为“写于济南，书于北京”；41页右栏倒11行“无庸置疑”应为“毋庸置疑”；50页右栏15行“陈继淹”应为“陈继庵”。

# 欢迎继续订阅

## 《炎黄春秋》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以弘扬中华文化、增进爱国大团结为办刊宗旨。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溢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老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的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2004年以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下半年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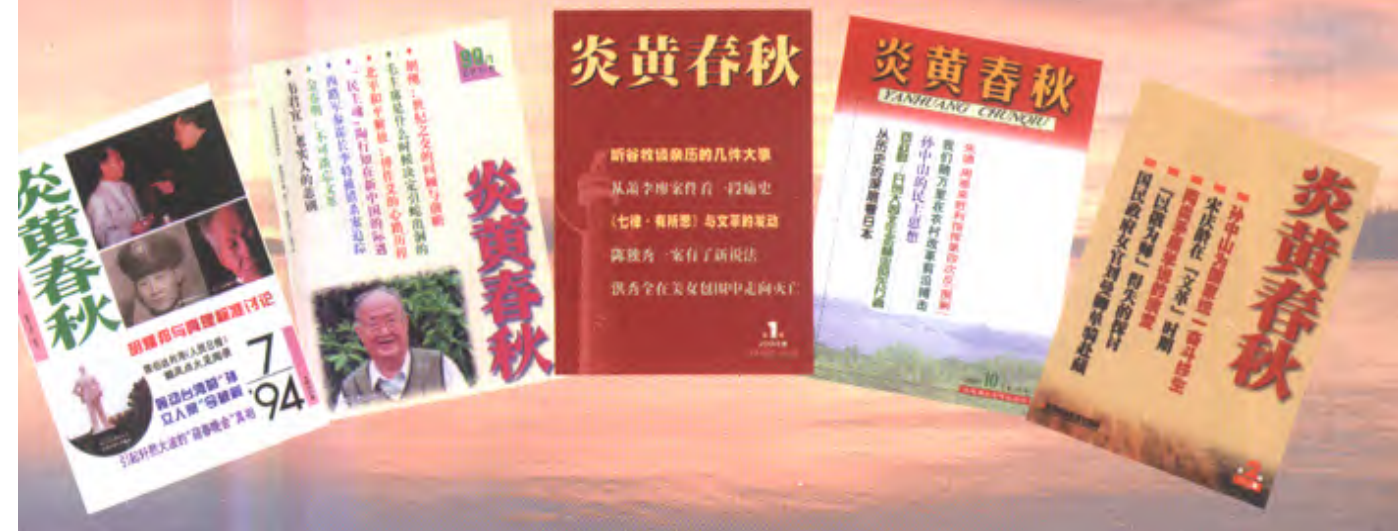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68532569

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李立三在自我批评中度过后半生**
-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 **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十六字密信**
- **毛泽东与秦腔艺术**
- **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日子**
- **舒芜忆报界元老张友鸾**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



# 炎黄春秋

2004/9(总第 150 期)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常务副社长:徐孔

执行主编: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郝爱存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渊

秘书长: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 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真:(010)68532569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